

SHISHI YU SHIJI
SUNSONGKONGJIANG JIAZU ZAISHANGHAI

史事 与 史迹

孙宋孔蒋家族在上海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

赵永峰

副主任

秦量 赵福祥 马玉成 匡成鸣 李竞业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鲜（常务）

朱玖琳 任冉冉 邹 镭 宋时娟

陈 娟 秦 刚 陶 竦 黄亚平

学术顾问

王 健 周 武

策 划

王志鲜

执 笔

房芸芳 段 炼



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

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

浦东川沙倪家，祖籍安徽桐城。先祖倪山堂，是清朝初年一位著名的学者，系桐城派开山鼻祖戴名世的得意门生。戴名世因编写《南山集》一书，刊载南明抗清之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大逆罪”被处以极刑。其门下学生三百余人均遭受株连，连倪山堂的后人亦被充军发配到福建、浙江沿海，以打鱼为生。

几十年后，倪家已在浙江省宁波鄞县（今鄞州区）落户生根，生息繁衍，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没想到，当年“文字狱”的影响并没有消退，倪家仍深受官府的欺压，常常被抓去充作苦役。为了子孙后代不受奴役，倪山堂嗣孙倪继山决定带领全家出逃。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终于来到了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白龙港一带。从此，安徽桐城倪家就在浦东沿海的滩涂上住了下来。到了孙辈倪念祖，倪家又迁至川沙城郊。多年以后，川沙城东北

浦东川沙倪家宅
（摄于20世纪80年代）



角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倪家宅。

清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837年1月14日），迁居浦东的倪家第四代倪兆堂生下长子，取名倪嘉珍，后改名倪蕴山。因二哥倪日堂没有子嗣，根据浦东当地风俗，倪兆堂将倪蕴山过继给了倪日堂。作为“两房合一子”的倪蕴山，两家都对其寄予了厚望，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倪蕴山读书勤奋刻苦，成绩也不错，但运气似乎差了一些，几次秀才考试均名落孙山。弃学举业之后，倪蕴山开始跟随川沙镇中市街“徐记鞋铺”的徐承志师傅学习制鞋手艺。徐承志十分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学徒，不仅将全部手艺倾囊相授，还把自己的女儿徐玉花许配给了倪蕴山为妻。相传，川沙徐家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文定公徐光启的后代。当年曾有一位徐姓将军，是徐光启的子孙，驻防东海之滨高桥一带，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于是，徐氏家族就留在了浦东，长期居住在川沙和高桥。另有一说，川沙徐姓原籍南京，是明初中山王徐达的后代。那位徐姓将军，就是徐达的第十六世孙徐光发，在抗击太平军的战斗中阵亡。总而言之，到了清代中期，川沙徐家已经十分没落了，与倪家倒也算是门当户对。

学成之后，倪蕴山自己在川沙城内开了一家鞋店。但川沙偏于浦东一隅，天地太小，倪蕴山决定前往黄浦江对岸的上海浦西谋生。当时的上海，已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英、美、法列强相继在洋泾浜和苏州河两岸设立租界。作为不受清政府管辖的区域，上海的租界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城乡完全不同的景象。宽阔的马路、林立的楼房、飞奔而过的马车、琳琅满目的日用百货……这一切让这位来自川沙的小鞋匠感到新鲜和兴奋。一开始，倪蕴山在公共租界盆汤弄（今南京东路以北的山西南路）为人修鞋制鞋，后经亲友介绍来到耶稣会传教士家中帮厨。1858年，在英国伦敦会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主持下，倪蕴山正式受洗入教，成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华籍传教士。此后，倪蕴山常年往



位于浦东川沙镇的倪氏老宅（今中市街36—38号）

来于上海、南汇、宝山、川沙等处，向普通民众传播上帝福音，因成绩显著，不久即升任天安堂牧师。

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倪蕴山逐渐接受了一些民主进步思想。他不仅给已缠足的长女倪桂金放足，也不再让年幼的倪桂珍、倪秀珍缠足，并把两子三女相继送入上海的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这在当时的华人中是不多见的。倪蕴山的长子倪锡令，教会学校毕业后子承父业，继任天安堂牧师，在川沙、宝山、上海、南汇、崇明一带传教。1896年，倪锡令前往崇明布道，经蕴藻浜出吴淞口，因遭遇风浪，不幸沉船遇难。留下寡妻沈氏，独自抚养女儿倪爱珍和幼子倪吉人长大成人。倪蕴山的次子倪锡纯，中学就读麦伦书院，后考进圣约翰大学。1907年，与宋庆龄、宋美龄一起赴美留学，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科，复又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铁道管理科、锡拉丘兹大学桥梁建筑科，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为汉冶萍煤矿上海商务所所长，后任职于汇丰银

行。娶妻曹惠英，系首批留美幼童曹吉福之四女。倪锡纯有子女四人，依次为倪吉士、倪吉贞（女）、倪吉明和倪吉文。

二

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1861年10月17日），差不多就在倪蕴山奔波于浦江两岸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海南岛文昌县昌洒墟古路园村，农民韩鸿翼的妻子王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韩教准。这位出身赤贫的海岛之子，就是日后被誉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传奇人物——宋耀如。

与一向循规的村民不同，韩教准从小就憧憬着岛外的世界，时时刻刻都渴望着能到外面去闯荡一番。1875年韩教准随长兄韩政准前往印尼爪哇谋生，1878年又跟着堂舅前往美国波士顿，在他的丝茶店当学徒。但没过多久，他又偷偷爬上了一条海岸警卫队的缉私船，因为堂舅不同意他想上学的请求。在船上，韩教准成了一名受人喜爱的杂役，跑上跑下，风风火火，干脆利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soon”。于是，他干脆在soon后面加了个“g”，以此作为他的姓氏。1880年，韩教准离开了缉私船，并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受洗皈依，教名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次年，在富商朱利安·卡尔将军（Julian S. Carr）的资助下，他进入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后改为杜克大学）学习，不久转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专修神学。毕业后，原来的海南农家子弟韩教准成了美国监理公会的传教士宋耀如，奉命前往上海，在林乐知博士（Young John Allen）手下担任试用传道员。

虽然宋耀如是监理公会在华年议会的第一位华人会员，但长期在美国学习生活，他的言谈举止已非常洋化了，在上海普通民众的眼里，他

就是一位穿着洋装说着谁也听不懂的海南土话的“假洋鬼子”。况且，离开祖国那么多年，宋耀如急切盼望能早日回故乡探望父母，因此与顶头上司林乐知产生了矛盾。在这么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传教事业又毫无进展，宋耀如内心非常苦闷。某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牛尚周和温秉忠两位老朋友。牛尚周，江苏嘉定人，为清政府派遣的首批留美幼童之一。温秉忠，广东新宁（今台山）人，第二批留美幼童。当年在波士顿，两位留美学生偶然结识了丝茶店的小伙计韩教准，三位同龄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就是在牛、温的鼓励下，宋耀如产生了求学的念头，踏上了乘船外逃之路。没想到能在大洋彼岸的上海遇到故知，宋耀如非常高兴。而此时，牛尚周已经与倪蕴山的大女儿倪桂金成婚，温秉忠与倪家也非常熟悉，后来娶了倪家的小女儿倪秀珍为妻。



左图：青年时代的倪桂珍
右图：青年时代的宋耀如



左图：牛尚周
右图：温秉忠

1887年，在牛尚周、温秉忠两位好友的撮合下，宋耀如迎娶川沙倪家二女儿倪桂珍为妻，婚后即赴昆山、七宝、太仓巡回传道。1889年，长女宋蔼龄出生，仅靠布道员微薄的薪资已无法养活一家三口。1890年，宋耀如宣布退出布道团，开始投身实业界。在此之前，宋就是美华圣经协会的代理人，不久他又开办了一所小型印刷厂，依靠印刷和销售宗教书籍赚到了不少钱。宋耀如有了稳定的收入，斥资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桥东有恒路628C号（今东余杭路526弄至530号）建造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宋家的隔壁就是牛尚周的房子，此时牛尚周在上海电报局工作，后来又成了上海制造局帮办，属于华人中的上层人士。宋耀如跟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后，牛尚周曾一度要求子女远离宋家，以免遭受政治牵连，但牛、宋两家的后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情谊。

宋耀如的另一位连襟温秉忠，先后担任镇江美国领事馆通译、两江总督署通译兼秘书、镇江及天津洋务局总办，还是深受慈禧太后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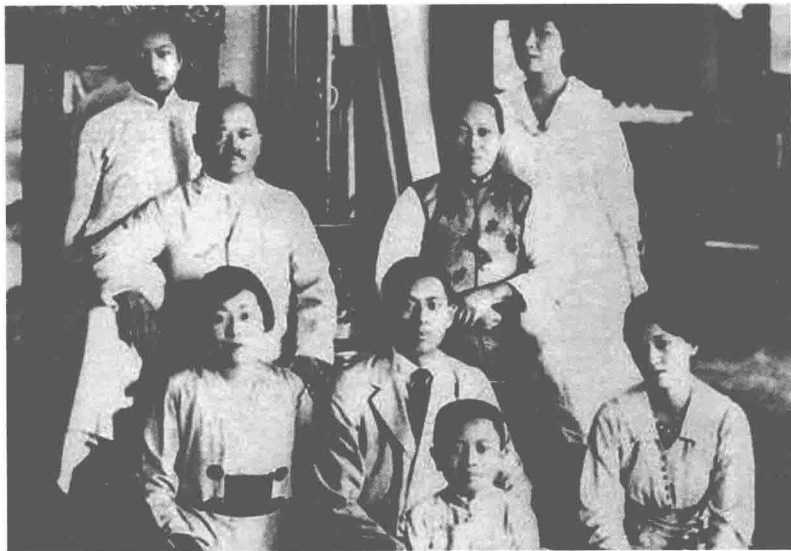
的清政府教育顾问，曾数次率团考察欧美等国教育。1907年夏天，他再度率领教育考察团赴美，并以“护送官员”的身份带领宋庆龄、宋美龄两姊妹，牛尚周的女儿牛惠珠，以及倪锡纯等公费生前往美国留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温秉忠与宋耀如一起跟随孙中山筹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驻苏州交涉员、财政部苏州海关监督等职。

三

19世纪末，安徽寿州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准备在上海苏州河畔投资建造面粉厂。尽管孙氏兄弟的祖老太爷是状元帝师孙家鼐，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但兄弟俩并不熟谙洋务。他们与美商之间的交易往来，均由宋耀如从中牵线搭桥，因此宋以技术入股，自



位于虹口朱家木桥
的宋氏老宅（今东
余杭路530号）



宋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1917年拍摄于宝昌路宅邸

1900年起担任阜丰面粉厂技术经理。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涉足棉纺业和烟草业，甚至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拥有不少股份。依靠印刷业和面粉业起家，宋耀如的财富越积越多，又先后买下了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和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0号两栋豪宅。大

约在1912年2月至4月间，宋家入住宝昌路，真正跨入了上海滩顶级富豪的行列。

1894年，孙中山携《上李鸿章书》北上天津，途经上海。经友人介绍，他认识了宋耀如，两人一见倾心并结为同志。此后，当革命活动需要资金，宋耀如总是倾其所有予以最大的援助。而孙中山每次来上海，也必定要与宋耀如相见，或者干脆就住在宋家，竟夕商谈革命事宜。宋耀如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家里印刷革命宣传品，虹口宋宅成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宋耀如几乎奉献了全部的家产和毕生的心血，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隐君子”。

民国成立后，宋耀如积极参加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活动，还把留学归国的大女儿宋蔼龄举荐给孙中山担任英文秘书。1914年9月，宋蔼龄与孙中山的支持者、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结婚。宋耀如不但亲自帮助孙中山处理日常文件书信，还电召二女儿宋庆龄速来日本，继任秘书一职。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宋庆龄毅然放弃了赴美进修新闻学专业的计划。早在童年时代，宋庆龄就已认识了父亲

的朋友“孙叔叔”，后来在长期的工作中，两人从相知到相爱，开启了一段跨越年龄的恋情。对此，宋耀如、倪桂珍夫妇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为了阻止宋庆龄与孙中山继续往来，他们把女儿带回了上海。1915年10月，宋庆龄偷偷前往日本东京，在友人的见证下与孙中山结为革命伴侣。宋耀如非常伤心，他曾向好友步惠廉（William Burke）抱怨：“我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的打击，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两位老人最终还是原谅了他们，接受了这桩婚事，还补送了一套家具、一件锦缎长袍和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作为女儿的嫁妆。1917年，孙中山与宋庆龄从日本东京秘密回国，定居上海。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因胃癌在上海逝世，宋家兄弟姐妹六人一直守护在父亲的病榻旁。此时，孙中山正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闻讯后专门委派孙科前往宋府吊唁。



孙中山

1917年，宋美龄从美国威尔斯利大学毕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父亲宋耀如病逝后，宋美龄与二姐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1921年曾两度前往广州探望宋庆龄，见证了孙中山主持的第二次护法运动。1922年6月16日凌晨，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和宋庆龄被迫返回上海。此时，宋家人成了孙中山强有力的支持者，宋美龄常常前往莫利爱路（今香山路）29号孙宅，照顾流产后身体虚弱的宋庆龄。就在这里，宋美龄认识了深受孙中山器重的青年军官蒋介石。尽管对年轻漂亮的宋家三小姐一见倾心，但当时的蒋介石还只是国民党内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并没有过于耀眼的光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国民党内派系势力开始分裂，手握兵权的蒋介石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随着地位和权势的与日俱增，这位黄埔军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对宋美龄展开了强大的感情攻

势。出于对英雄的仰慕和对权力的渴望，宋美龄当然不会毫无所动。不过，蒋介石有过两任妻子，身边又有侍妾陪伴，这不符合基督教教义，更是让宋氏家族蒙羞的事情。对于这件婚事，二姐宋庆龄坚决反对，她认为蒋介石和小妹结婚的政治目的太强，并不是出自真正的爱情。大姐宋蔼龄则力促蒋宋联姻，希望两大家族能实现强强联手，主宰中国的政治、经济大权。

1927年，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从恋爱到结婚最重要的一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以退为进，以便将来进一步攫取更高权力。9月28日，蒋介石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在与日方军政要员密谈的同时，拜会了在此养病的倪太夫人。为了获得倪太夫人的信任和祝福，蒋介石在《申报》发表《启事》：“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并表示将潜心研究《圣经》，尝试接受基督教信仰。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令世人瞩目的盛大婚礼。平心而论，蒋宋联姻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婚姻，反而更符合“佳人配英雄”的传统模式，其中也不乏两心相悦的感情成分。宋美龄以其非凡的智慧与美丽，赢得了蒋介石的珍爱。嫁给蒋介石，是宋美龄无悔的选择，也只有她才成就了“蒋夫人”的盛名与辉煌。

四

1931年7月23日，上海北火车站枪声大作，一名中年男子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秘书唐腴庐乘火车从南京回上海，刚出站台即遭枪击。由于两人均着白色西服，个头相似，刺客误唐为宋。可怜秘书唐腴庐，不幸成为枪下冤魂。事后侦知，中原大战之后又逢宁粤分裂，广东方面出资聘请暗杀大王王亚樵刺杀宋子文，以动摇蒋介石的财政根基。宋子文侥幸脱险，而倪太夫人受

此惊吓，血压顿时升高，在青岛别墅突然亡故，享年63岁。此时宋家儿女均为党国栋梁，因此倪太夫人逝世后备享荣耀，国民政府特赠挽匾“教忠报国”，以褒扬她相夫教子的业绩。从川沙倪家过渡到宋氏家族，倪桂珍是关键人物，她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在宋子文遇刺之前，上海还曾有过一声划破寂静夜空的枪响，策划行刺者则是宋氏家族后来的



蒋介石

小女婿蒋介石。上海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发家之地。1911年，25岁的蒋介石一腔热血投身革命，被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任命为攻占杭州的先锋队指挥官，随后就任沪军第五团团团长。1912年民国成立后，传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即将升任浙江都督，这对于沪军都督陈其美而言是个不利的消息。1月14日晚，正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秘密养病的陶成章被人暗杀，幕后指使者就是蒋介石和陈其美。为避人耳目，蒋介石被迫辞去沪军第五团团团长职务。刺陶成功之后，蒋介石深受陈其美信任，又通过陈其美结识了孙中山，从而踏上了争逐最高权力的道路。

1916年5月16日，陈其美遇刺身亡，随后反袁军事行动失败。蒋介石不胜悲痛，终日郁郁不得志。在陈其美把兄弟张静江的帮助下，他开始进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股票交易先期屡获暴利，但后期亏损日益严重，终至倒闭。因投机失败，蒋介石渐觉商战无情，加之孙中山在广州召他前去，遂决意投身军事。但此次金融场上的历练，对这位后来的统治者当有诸多潜在的影响。此间结交的一批江浙财团大佬，也对他将来的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家第一个来到申浦之滨的应该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曾多次由上海中转前往海外。不过，孙家的根基主要在广东，孙眉的产业又远在檀香山，倒是孙中山的儿女与上海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孽缘。孙中山的次女孙婉，早年在美国与王伯秋相知相爱，生下一双儿女。但王伯秋在国内早已有妻室，而毕生追求平等自由的孙中山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做别人的侍妾，一场爱情悲剧由此拉开序幕。在王母的策划下，年幼的王纘蕙和王弘之姐弟被迫离开了母亲孙婉。1947年王纘蕙离沪去台湾，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联系上了生母孙婉。1969年，母女俩终于在香港见面，此时两人分别已近五十年。1979年6月11日，就在王弘之准备赴澳门探亲的前夕，孙婉猝然病逝，母子还未相见竟成永诀，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公子哥，追求上海滩的社交名媛，孙科和二夫人蓝妮的爱恋更像是一部言情小说。而在认识蓝妮之前，这位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已与上海进德女中学生严嵩娟秘密同居，两人分手之后因经济问题还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蓝妮与女儿孙穗芬出走香港，严嵩娟则带着女儿孙穗芳专程赴港找孙科讨要抚养费。对于孙科而言，这两段孽缘是他自己酿下的苦酒，骨肉亲情在国家政权更迭的特殊时期显得那么脆弱不堪。

至于孔家，长期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战胜利后更是在上海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做投机生意。孔家兄妹的扬子公司、嘉陵公司，以及宋家所掌控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等，实为上海经济金融乱象之源，百姓侧目，敢怒而不敢言。1948年，蒋经国担任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奉旨来上海“打老虎”，即打击日益猖獗的贪腐、投机、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然而，所谓的经济管制，只不过是配合国民党政权推行金圆券、进一步掠夺民脂民膏的手段罢了。苍蝇没打死几只，老虎屁股更是摸不得。尽管蒋经国一度查封了孔令侃的公司，但他不得不面对来自蒋

介石和宋美龄的压力。最后，孔、宋家族企业都轻轻松松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太子爷信心满满而来，却灰心失望而去。有学者说，国民党之败实败于家族，民国之亡实亡于上海，此言不虚，诚哉斯语！

1945年，孔祥熙遭到弹劾，辞去本兼各职，从此结束政治生涯。1947年，夫妇俩飞往美国，定居纽约。1947年，宋子文因受黄金风潮案波及，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转任广东省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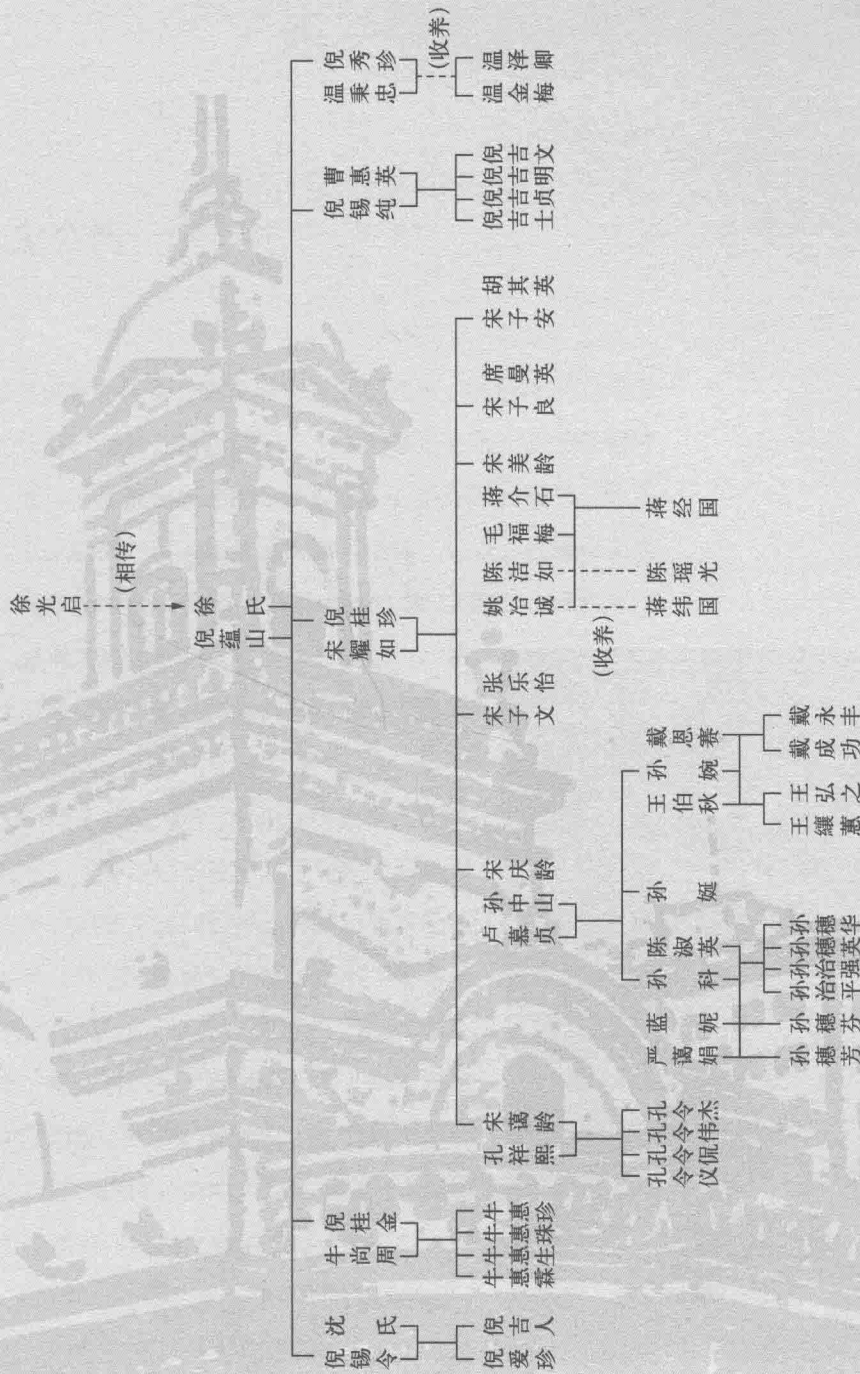
孔祥熙

主席。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继而辞职赴港，后定居美国。1949年3月，孙科向代总统李宗仁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获准后前往香港寓居。1949年5月7日，蒋介石从上海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前往舟山，转赴台湾。自此，孙、宋、孔、蒋四大家族彻底终结了与大陆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宋庆龄一人留在大陆，继续高举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伟大旗帜，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世长辞，按照她的遗愿安葬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的身边。

广义的宋氏家族，是指以宋家为核心，加上通过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孔家、孙家和蒋家，这个家族整整影响了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上海是这个家族崛起的地方。上海也是孙家、蒋家、孔家的主要活动舞台，一幕幕悲喜剧在这里上演。

这就是上海！

孙宋孔蒋家族人物简表



目 录

前言	
1 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	
1 孙宋孔蒋家族人物简表	55 上海浚浦局
1 九间楼与文定公祠	59 松江盐务稽核所
5 阁老坟山	63 虬江码头
9 八仙桥西人公墓	67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
15 阜丰面粉厂	72 裨文女塾
20 商务印书馆	76 中国公学
28 中华书局	82 万竹小学
3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86 浦东中学
37 中央银行	91 复旦公学
42 中国银行	96 沪江大学
47 中国农民银行	101 同济大学
51 中央信托局	106 暨南大学
	111 大夏大学
	115 奉化中学

- 119 沪西礼拜堂
- 123 天安堂与仁济医院
- 128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 132 同仁医院
- 137 霖生医院
- 142 中山医院
- 147 大华饭店
- 152 百乐门舞厅
- 157 孙科别墅与卫乐公寓
- 161 玫瑰别墅
- 165 爱庐
- 170 陈洁如寓所
- 174 逸村
- 179 诺曼底公寓
- 183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 188 虹桥高尔夫球场
- 192 真如火车站
- 196 中央运动场
- 200 江亚轮
- 204 复兴岛
- 附录**
- 209 上海地区的中山公园
- 218 景仰与缅怀——上海市区孙中山纪念
地名考录
- 224 从张虹路到宋园路——宋庆龄陵园门前
一条小路的变迁史
- 230 **参考文献**
- 234 **后记**

九间楼与文定公祠

宋氏三姐妹的外祖母姓徐，据说是明末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后裔。相传，徐氏的一支为躲避倭寇之乱，从上海辗转落户浦东川沙。原川沙城郊倪家宅的小伙倪蕴山，早年读过私塾，曾在川沙镇中市街“徐记鞋铺”跟随徐承志师傅当学徒。后来，倪蕴山在浦西受洗，成为一名华籍牧师。清同治二年（1863年），徐家小姐徐玉花嫁给了倪蕴山。徐承志和徐玉花，就是落户浦东川沙的徐氏后人，因此宋家兄弟姐妹也许就是文定公徐光启的后裔。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城太卿坊徐氏祖宅。太卿坊位于城南，原为纪念明代太常寺少卿沈瑜的牌坊。到了清同治年间，这座牌坊已被毁坏而不复存在了，但“太卿坊”一直沿用成为街巷名称，也就是今天的俞家弄。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致富，在上海城内购地建造了一座宅院。原先的徐氏祖宅，为典型的江南大户住宅，共三进，房屋百余间，有后乐堂、遵训楼等建筑。祖宅大门朝南，设在太卿坊，即今俞家弄。进入大门后，为一条5米长的夹道，过了夹道即前天井。再向北又是厅堂，即前客堂，是主人会客的地方，通过

徐光启像



客堂是中天井。再后面是后天井，中天井和后天井之间有裙房相隔。后天井北面就是联排的楼阁，这里一般是小姐和其他女眷的用房。楼阁北面就是乔家浜（后填没改筑为乔家路），辟有后门。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与其显赫的官位相比，徐家在上海县城的宅邸根本不算豪华，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甚至还不怎么宽敞。但据《明史·徐光启传》记载，他“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一直居住于此，城内住宅从未扩建。徐家在大南门外康衢里另有南北双园，是被徐光启用作种植甘薯的实验田。因此，双园又被称为“桑园”，意为徐光启植桑养蚕的场所。如今，黄浦区小南门街道靠近陆家浜路还有一条桑园街，就是原先徐家南园所在之地。

徐光启去世后，太卿坊祖宅由其孙徐尔爵等居住。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破南京，江南一带大户人家的奴婢乘势暴动，要求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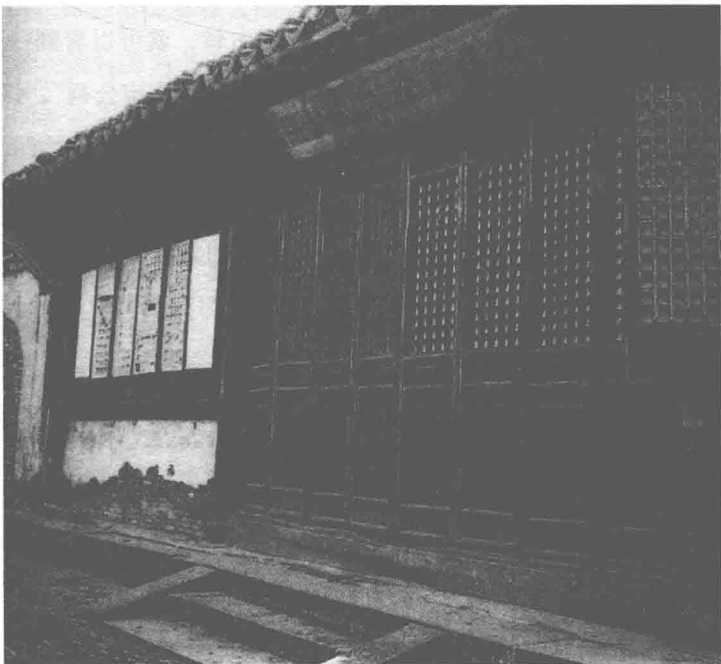
索回卖身契约，解除奴役，甚至还毆杀及火焚主家，占据田产，散发钱粮，史称“江南奴变”。上海徐家也未能幸免，太卿坊宅邸大部被焚毁，仅存最后一进。此后，徐氏家道中落，祖产陆续变卖，后裔相继移居他处。劫后余存的徐宅，为北部毗临乔家浜的联排楼阁，坐南朝北，呈横列长条形，上下两层，九开间门面，俗称“九间楼”。在乔家浜填没前，徐氏祖宅沿浜筑有篱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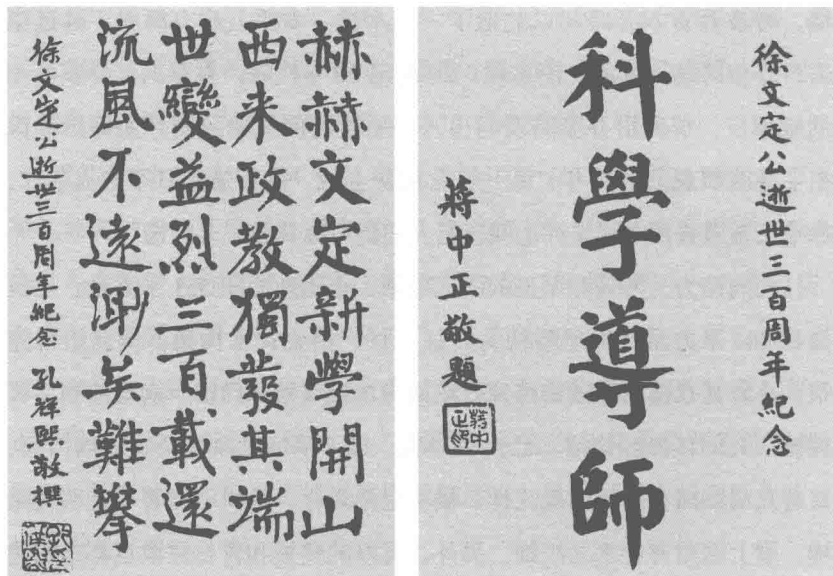
墙，并在西首双开跨间以北造了一座木桥。木桥上建有廊屋，远远望去，好似跨越河浜的一座木屋。20世纪20年代后，乔家浜、薛家浜相继被填没，居民沿乔家路设门出入，原楼阁前筑墙封闭，太卿坊徐氏祖宅遂改旧观。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南市遭到日军炮火轰炸，徐宅又被毁去两间，实存七间，但人们仍习称其为“九间楼”。

九间楼为上海现存罕见的明代宅第，今占地面积551平方米，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柱立柱、抬梁式木构架、榫卯组合建筑，小青瓦双披出檐硬山房顶。正面为木板墙壁和门窗，底层前顶后长披檐。九间楼屡经修缮，已失去原貌，楼下榻扇已改为新式玻璃门窗，只有几扇旧门窗仍为明代式样。楼上梁架尚存，斗拱、雀替等是明代结构，梁上镌刻有卷水云纹饰。另外，宽厚的楼板和青石柱墩也都是明代遗物，楼内尚有被填没的三口古井。1959年，徐光启故居九间楼被公布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11月，在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之际，九间楼又重新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宅第前立有“明徐光启故居”的石碑。

九间楼北面不远处的光启南路250弄内，还有一座徐光启纪念祠堂。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逝，朝廷谥号“文定”，归葬上海。为表彰这位朝廷重臣的功绩，上海地方政府奉旨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清光绪四年（1878年），向西扩建三间，原祠堂改为徐氏宗祠，新屋作为“明

文定公祠





蒋介石与孔祥熙的题词

相国徐文定公祠”，祠内设有香樟木徐光启官服雕像。如今，走到光启南路 250 弄底右转，就可以看到一個不大的院落，里面有一幢黑瓦平房，这就是昔日的“文定公祠”。该建筑在“文革”时遭破坏较大，仅剩下三间空房，现已成为某印刷纸品厂的生产车间。

另外，徐光启逝世后，上海地方政府还在县基路口造了一座纪念石坊。额坊阴刻“阁老坊”三个大字，由明代松江籍大书画家董其昌亲笔手书。1931 年，因有倒塌危险，上海市工务局将其全部拆除。所有拆下的石料，均交由徐氏后裔保存。作为对徐光启的纪念，工务局又将县基路更名为光启路，也算是追思地方先贤，保存了一份历史记忆。

阁老坟山

徐光启身居相位，但“通籍四十年，室庐不改”，曾在离城十里郊外今徐家汇处购地建造农庄，作为农作物实验之所和读书著述之处。徐氏农庄别业，又称后乐堂，据民国《法华乡志》记载：“后乐堂，在徐家汇，明徐文定公光启故居，其中堂有御赐‘儒宗人表’，旁筑东皋草堂、灤西草堂，董其昌书额‘春及堂’，其耕读处也。”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崇祯十四年（1641年）归葬上海，即瘞于县城西郊蒲汇塘北徐氏农庄别业。明清之际，世人尊称入阁官员为“阁老”，徐光启身前曾经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因此上海民众习惯把徐光启墓称为“阁老坟山”。

阁老坟山占地面积 18 亩，正中为徐光启和夫人吴氏之墓，孙辈尔觉、尔爵、尔斗、尔默夫妇亦随葬于两侧，从而形成五座高高隆起的坟山。墓前有华表、牌坊等建筑，牌坊之前东为鼓亭，西为衣亭，中间为香炉鼎。再往前，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碑亭，其中之一为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用拉丁文撰写的碑文，译成中文大致意思为：“全耶稣会怀着感恩戴德之心，立石永志中国杰出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保禄，他为信仰基督的圣教会，敬之爱之广扬之，历数十年如一日。”墓前神道两侧置有翁仲、石马、石羊等。徐光启落葬之后，徐氏后裔的一支在此守墓，并世居于此。这里又是蒲汇塘、肇嘉浜、法华泾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因此得名“徐家汇”。



徐光启墓

1842年开埠之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重新回到上海。同时，法国耶稣会看中了地处上海西南的徐家汇地区，这里有徐光启的墓地，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徐家后裔，在耶稣会教士们的心目中徐家汇无疑是一块天主教的圣地。1847年，传教士南格禄在徐家汇建造了一座罗马式教堂，外观壮丽宏伟，因奉耶稣会创始人圣徒依纳爵·罗耀拉为主保，称为圣依纳爵天主教堂。自圣依纳爵堂建成之后，徐家汇逐渐成为上海天主教的传教中心之一，不久主教府、耶稣会驻沪所亦迁移至此。随着天主教事业的日益繁盛，徐家汇周围又陆续修建了神学院、藏书楼、博物馆、育婴堂、孤儿院、手工作坊、印刷所、天文台、徐汇公学等一系列教会附属文化机构，形成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宗教建筑群。徐家汇也逐渐成了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天主教教区，甚至有上海“梵蒂冈”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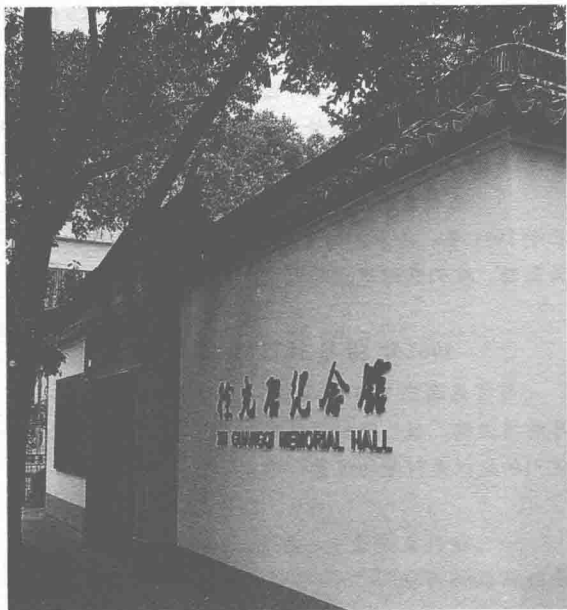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天主教会为纪念徐光启受洗三百周年，重新整修了阁老坟山，并在墓道中央树立大理石十字架一座。底座碑石刻有颂词，由马相伯撰文，松江张秉彝书写。1933年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天主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徐光启墓地做了

一次大礼弥撒。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派来代表，市公安局局长、法驻沪总领事、法租界公董局总办、巡捕房督察长等各界名流出席了纪念活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政要也为之题词纪念。为配合纪念活动，上海科技界发起学术研讨，报纸上也刊登了不少有关徐光启科学研究的文章。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徐光启墓大十字架基座上的铜栏杆被盗，阁老坟山逐渐荒芜。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政府部门对徐光启墓作了整修，将墓区辟为南丹公园。在“文革”动乱之中，阁老坟山被彻底破坏，华表、牌坊、十字架、翁仲、石兽均被砸毁。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出资重修了徐光启墓。但出于当时的条件，十字架、牌坊、翁仲、华表均未能修复。1980年，由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题写了墓碑。1983年，在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之际，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并在墓区东侧修建了碑廊，内置石刻十二块，其中有徐光启的手迹和画家程十发所绘的徐光启像，书法家承名世书写的明查继佐所撰《徐光启传》，以及顾廷龙的题跋。在墓之前还塑立了一座花岗岩雕像，底座之上有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徐光启像”四字。1989年2月，徐光启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为纪念徐光启逝世370周年，文物部门重建了大椭圆形土墓，顶部为五个明显隆起的土山，墓后有月形托山，墓前有一个小小的照池。另外，还恢复了墓前的牌坊、华表、翁仲、石马、石羊等建筑，尤其是备受争议的大十字架，也按原样重修竖了起来。徐光启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遵照原貌予以修复。徐光启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学

位于墓地西南的
徐光启纪念馆





徐光启与利玛竇



《几何原本》序言

家，也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依照原样整修墓地是对历史的尊重。经过这次整修，除了受面积所限，未能恢复大托山、石亭之外，基本再现了一个世纪前阁老坟山的模样。原位于梅陇路5号的南春华堂，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民居建筑之一，因市政建设需要而整体搬迁至光启公园，并改建为徐光启纪念馆。纪念馆名由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题写，院内照壁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题写的“科学先驱”四个大字，高度概括了徐光启的历史功绩和杰出成就。

附

1962年10月11日宋美龄给宋子文的信（节选）

徐光启：明朝上海人，万历年进士。崇祯时，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当时意大利人利玛竇在中国，徐光启从他入天主教，并从他学天文、数学等。精于历，和意大利人修正历法。中国人研究西方学术的人自徐始，著书甚多，以《农政全书》《徐氏厄言》及《几何原本》前六卷最为著明（名）。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他吊死在故宫。清朝自1644年开始，亡于1911年。徐家汇的名称一直没有改变，但纪念我们先祖的庙已经改为商场。我们先祖建立的天文台仍在。

1962年10月31日宋子文给宋美龄的回信（节选）

非常感谢您11日的来函，内附张其昀纪念我们先祖徐光启诞辰400年的演讲稿。我已经把附件分送给每个女儿，让她们和她们孩子知道，她们的先祖是何等的优秀，不同凡响。

——转引自吴景平、郭岱君编著《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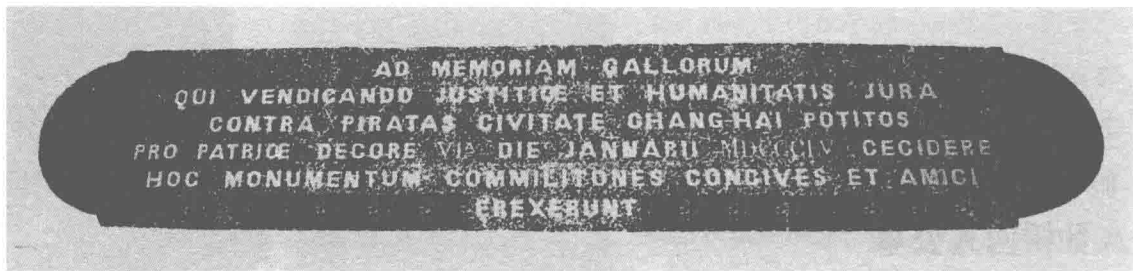
八仙桥西人公墓

1889年，宋庆龄的外祖父倪蕴山病逝，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八仙桥公墓。开埠之前，上海丧葬之俗沿袭古风，掩埋之处只有私坟、义冢或家族墓地，面向普通大众的经营性公墓还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

1843年，上海开埠，远离故土的外侨生活在异国他乡，除了种种的不适应，还要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因此，随着租界的开辟，建立



八仙桥公墓内的
法兵墓



法兵墓碑拓片

经营性公墓，让逝去的亲友有一块安息之地，很快提上了租界管理当局的议事日程。1844年，旅沪外侨组织了一家殡葬公司，并购买今汉口路、四川中路附近一块土地准备兴建公墓。但这里靠近外滩，地价上涨很快，有洋商愿意用今山东路、福州路交界处14亩荒地交换，于是就建起了近代上海第一家公墓——山东路公墓。

山东路公墓主要是安葬英美侨民的，由英租界以及后来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1849年，法租界设立，随着旅沪法侨人数的增加，也需要建立一座专属公墓。按照《上海土地章程》的规定，租界是外侨租地建屋的区域，因此早期的外侨公墓大多位于租界之外。1860年后，法租界人口骤增，公董局准备向东西两面扩张。1864年，总董比索内想出了一条妙计，即在法租界以西购买土地，用于辟建专门安葬外国侨民的公墓。这样一来，由外侨经营管理的公墓，与孤悬于华界之中的跑马场、外国兵营一样，就成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飞地”，为以后租界的扩张打下了伏笔。正巧，公共租界工部局囿于山东路公墓的规模，也打算新建一处公墓，于是双方经过磋商达成一致，共同完成此事。

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以西的延伸处，原本是阡陌交错的农田和荒地，其中有同仁辅元堂和潮州山庄所属的义冢。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购入今淮海公园南部40亩土地建造外侨公墓，1868年6月正式落成。1870年，法租界公董局购入今淮海公园北部土地21.75

亩，建造法侨新公墓。这两处公墓位于西门路（今自忠路）以北，外侨又称之为西门公墓（West Gate Cemetery），因地近八仙桥地区，中国老百姓则称其为八仙桥“外国坟山”。

与泥城桥、垃圾桥等地名不同，八仙桥一开始并不是上海河道上的一座桥梁。关于八仙桥的得名，还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呢！1856年，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侵略者并未满足，又于1860年炮击大沽，攻占天津，进逼北京。就在京郊东南的八里桥，蒙古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清兵与英法联军展开决战。但数万精锐勇士的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抵御列强的枪炮，清兵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八里桥是拱卫京城最后一道屏障，战役之后北京已无险可守，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八里桥战役”英法联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英法侨民欣喜若狂，法租界公董局特意将一条新开辟的马路命名为“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对于中国人而言，八里桥是屈辱之地，“八里桥路”无异于另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因此，上海百姓并不买账，故意将该路唤作“八仙桥路”，即使在中国人绘制的地图上也标作“八仙桥路”。与此同时，这一地块内的商铺、旅馆、饭店、菜

倪蕴山纪念碑，现藏于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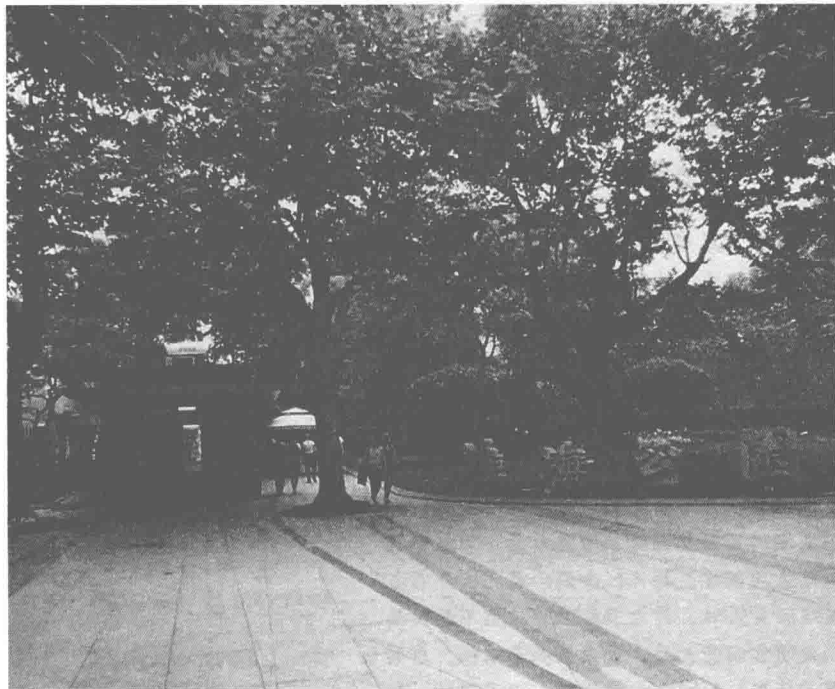
八仙桥西人公墓

场、车站等，也自发冠名为“八仙桥”。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内涵截然不同。面对铺天盖地的“八仙桥”，法租界当局只能接受事实，听之任之。八仙桥逐渐成为上海市区最著名的区片地名。

1900年法租界扩张成功，八仙桥公墓被划入租界内，原先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界址洋泾浜通往公墓的“坟山路”开始拓宽改建。其中，法租界这一段“坟山路”以法国军舰“麦高包禄号”命名为麦高包禄路，1946年汪伪政权收回租界后改名为定安路。其实，麦高包禄就是元代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至于公共租界的那一段，仍然称为“坟山路”，直到1946年才与定安路合称为龙门路。

八仙桥公墓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管理的两处外侨公墓，这里曾葬有美国驻沪副领事晏玛太等著名外侨，以及1900年前后迁葬于此的1855年小刀会起义中阵亡的法国水兵。当然，也有极少数华人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安葬在八仙桥公墓，倪蕴山即属此例。后来，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昔日荒僻的八仙桥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区，两处公墓已无法拓展。据1921年工部局年报称，虽八仙桥公墓尚能维持，但已停止接受新穴。此后，上海外侨一般都安葬在更西面的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或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公墓（今陆家嘴东方明珠电视塔处），也有不少侨民安葬在由华人经营管理的万国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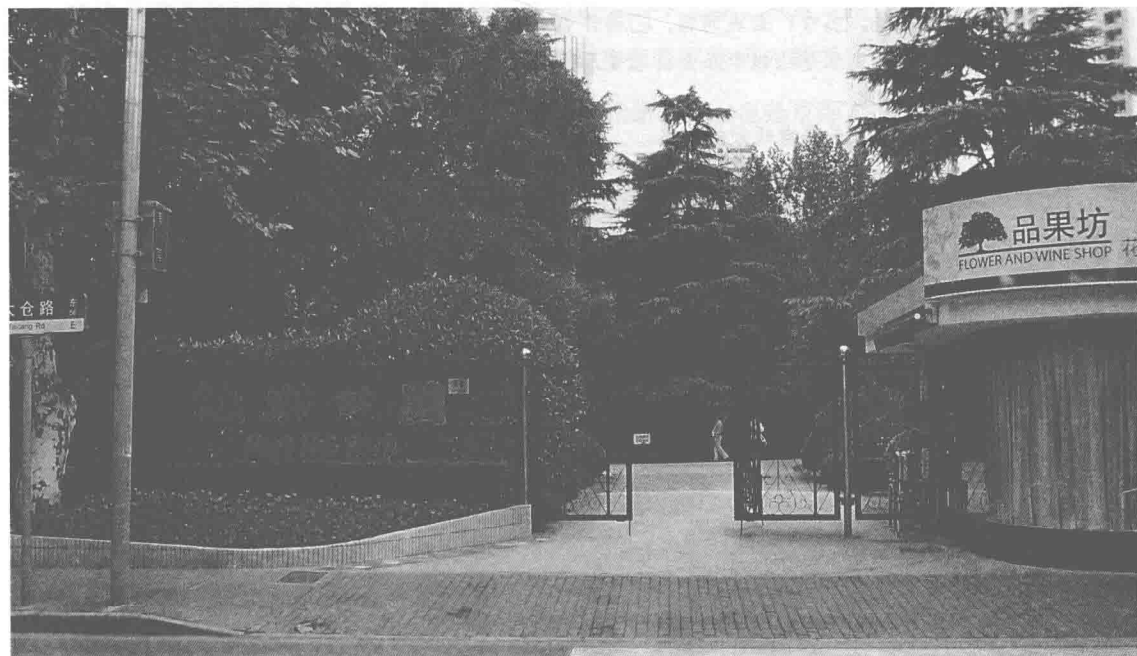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租界正式收回，上海外侨公墓处于无人管理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侨陆续回国，八仙桥公墓更成了“无主荒坟”，环境脏乱不堪。1956年，市人大代表提议将八仙桥公墓改建为公园。1957年10月，公墓开始拆除，遗骸全部迁葬浦东。1958年6月20日淮海公园落成，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园景有水池、花坛、假山、长廊、凹形回廊等。20世纪90年代，淮海公园北部改建为开放式街头绿地。



淮海公园淮海
中路大门

八仙桥西人公墓

淮海公园太仓路大门



挽蕴山倪牧师

《万国公报》1898年8月号

蕴山与余交如金石，情同水乳，相勖以道，相规以义，二十年如一日。诩意竟先我而去耶！呜呼痛哉！君品端行方，循规守矩，事母孝而爱弟笃，敬长诚而交友孚。屡试童军，屡列前茅，终以额溢遗之。后悟富贵功名如电光石火，一转瞬而皆非我有，唯信道行教可盼永福，于是毅然入耶稣教。其时沮之者夥，讥之者多，唾骂□噤宗朋□，辄君悍然不顾，而其信心之坚有如此者。讲经则阐发靡遗，如孺皆悟。祈祷则晨昏不辍，切实而求。且传道沪、汇、川、宝等处，风飘雪霏不顾也，而君无冤色忿心。以为尘世不鞅掌天国不能陟，而其志之卓如此者。迨升牧师，兢兢业业，矻矻孜孜，栉风沐雨，戴月披星，群以为自此可以振兴，福音远播，使千万人有重生之望。乃不料竟长逝耶！呜呼痛哉！人谓君若是信心，若是恳切，而主宰何不赐其遐龄，增其力量，为教中之表率，作后起之楷模，乃何以年未周甲遽而物化？余谓：君之去即君之福。君之信心坚而行道勤，不唯脍炙人口，抑已上达主听。主不忍使其再跋涉于尘世，故一日下诏，处明官而受光荣，亲古圣而享永福，乐莫大焉。然余又何悲于中，而书于情耶？如君之相勖相规，以道以义，始终不渝者，未有继起之俦。呜呼！老成凋殒，□雨作古，如曹闾轩、丁介生、潘恂如、黄近霞诸先生等均相率而归。乃曾几何时，而君又接踵而去。呜呼！不禁泪而述之。

时在己丑三月中浣，教弟萼甫钱芳棣手述。

1928年5月15日宋美龄致米尔斯函（节选）

亲爱的达达：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决定不把他安葬在西门墓地（West Gate Cemetery），我母亲那边的亲戚都安葬在那儿，尽管我们在那儿也有墓地。正如你可能知道的，父亲那边的人们都安葬在广州（应为广东，当时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编者注），因此我们想最好是把他安葬在上海。对了，幸运的是，我们获悉一个叫万国公墓的新墓园刚刚完成，所以我们就去那儿，发现那儿非常好且干净。所以我们买了地——全部面积够我们全家人用。父亲是安葬到那家公墓的第一人。你知道，他喜欢在任何竞争中当第一，所以我想要是他知道的话他会非常欣慰的。

——转引自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

阜丰面粉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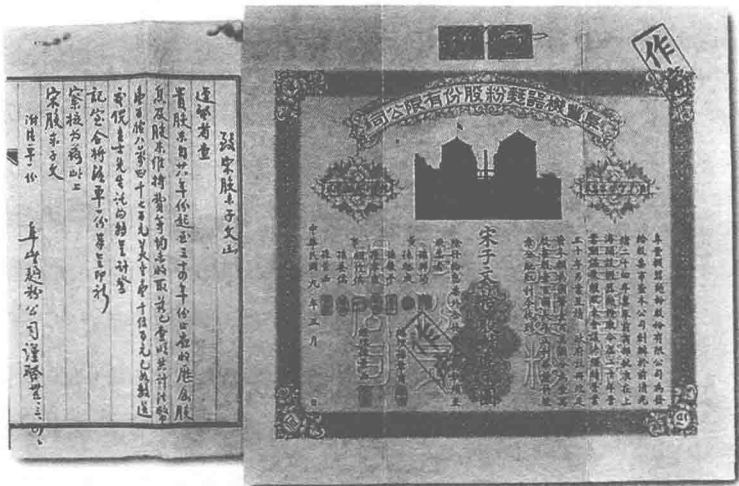
自1900年起，宋耀如开始担任阜丰面粉厂经理，直至去世。此后，宋子文也长期持有阜丰面粉厂的一部分股份。

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上海苏州河畔的潘家湾绝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不过，在20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无人知晓的土地。1900年，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这里开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潘家湾的历史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孙氏兄弟本是安徽寿州人氏，其家族在寿州占有一半土地，被誉为“孙半城”。孙家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资本，在官场上有着丰富的人脉关系。孙氏兄弟的祖父孙家鼐，是咸丰朝状元，曾任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他们的外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

晚清之际，中国与列强签订通商条约，规定凡外侨进口面粉，海关不得征税。而进口面粉数量之大，已远超在华外侨的饮食需要，洋行借此倾销洋面粉获取暴利。1893年，孙

宋子文所持有的阜丰面粉公司股票





卓丰面粉厂“自行车”牌注册商标

多森经营食盐赚了一大笔钱，又值其兄孙多鑫从外祖父李瀚章幕下退出回到家乡，兄弟俩便商量投资实业，开创一片新的天地。1897年，孙氏兄弟开始调查各地面粉厂，那时上海英商“增裕机器面粉厂”试机出粉，他们便给增裕厂小麦三百石入磨试验，以了解粉质，计算利润。结果出粉八成，粉质优良，一算成本竟有赢利。于是，兄弟俩决定开办一个类似增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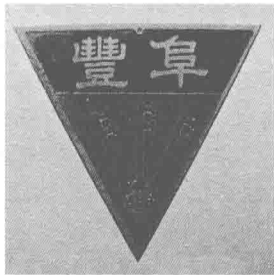
的机器面粉厂。1898年，他们在苏州河畔潘家湾购得了30亩地作为建厂基地，又在北京东路租得一幢楼房办公。孙多鑫亲自远涉重洋，到法国和美国考察磨面机器的性能，随行翻译是颜永京牧师的长子、我国外交界前辈颜惠庆的长兄颜子庆。经过实地考察，孙氏兄弟认为美国机器上佳，便以22000元定购一套，由美商派技师负责机器安装。其间交易往来，均由宋耀如从中牵线搭桥，宋以技术入股，并出任该厂技术经理。1900年6月，卓丰面粉厂正式投产。当时，清政府正在奖励实业，孙家鼐积极支持孙辈办厂，以其长子名义投资两万元，还直接上书慈禧核准注册。因此，孙家卓丰厂的面粉被朝廷恩准为“概免厘税，通行全国”。

卓丰面粉厂开办第一年，因缺乏经验，产品滞销，亏损7万多两白银。但在第二年，因采取回佣、期票等手段与洋面粉竞争，终于打开了销路，获利10余万两。从此，卓丰厂连续赢利，随之添置机器，扩大生产。自创办至1921年，年利润低则20%多，高则60%多。从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中，总共赢利法币579万元，再加上股息红利313万元、公积金128万元，合计为1020万元。而这仅仅是股东大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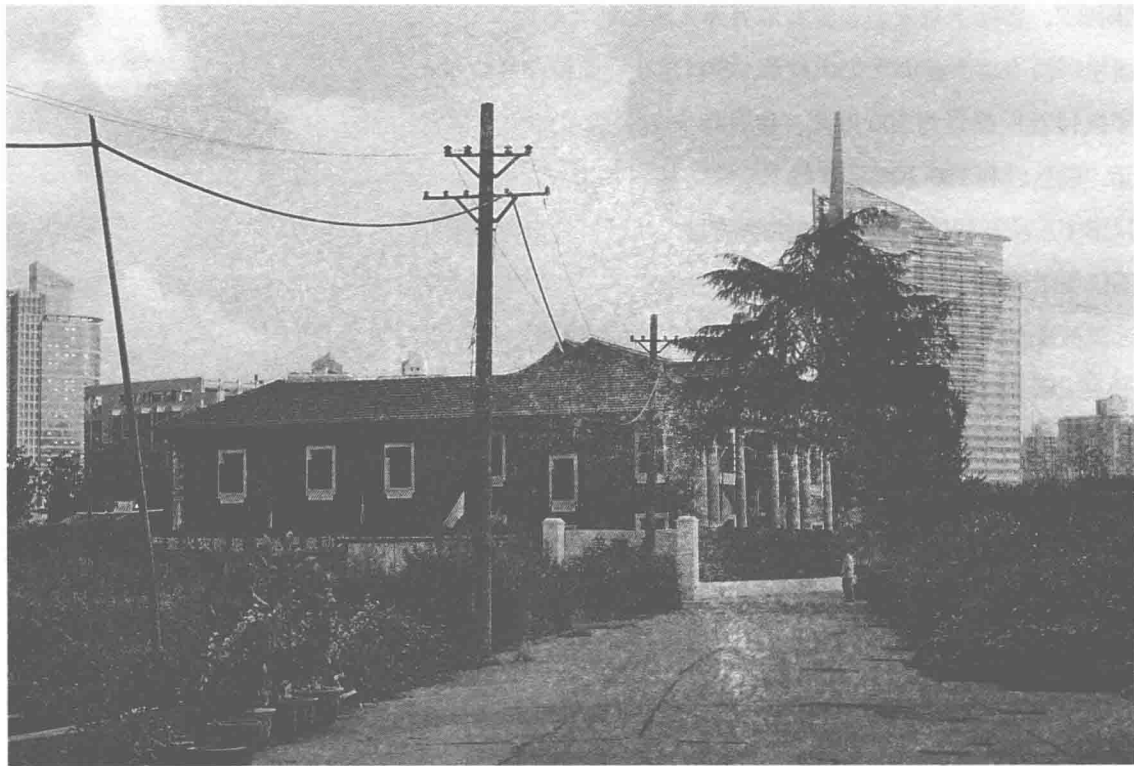
“明账”，实际上每家企业都有不为外人所知的“暗账”。据估算，阜丰面粉厂的不动产溢价有 250 万元，各料盘存和面粉存货约 400 万元，历年拨付新厂投资约 200 万元，拨付孙家为大股东的中孚银行约 600 万元，股息红利 250 万元，这些“暗账”加起来约有 2 000 万元之巨。而且阜丰厂所招的工人，十之八九为安徽寿州人，且多为孙家佃户，这样不仅便于控制，还可压低工资，降低经营成本。当然，孙氏兄弟对这些远离故土的乡亲也很照顾，专门在工厂旁边建造了一批石库门弄堂房子——阜丰里，作为面粉厂的职工宿舍。

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孙氏兄弟很注意产品的质量。他们坚持使用品质优良的进口小麦，合理配方。每批小麦进来，都要进行化学定性，分类储存。为防止差错，下麦工人身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按搭配顺序先后下料。1937 年，阜丰厂自动化圆筒麦仓落成后，即由机械控制配料。一系列先进的工艺和严格的管理，使得该厂“自行车”牌面粉深受客户赞誉。使用一包“自行车”牌面粉制作油条，可比其他面粉多出两根，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孙氏兄弟坚持“稳健经营、薄利多销”的信条，使得阜丰面粉厂不断发展壮大。1932 年，阜丰厂日产面粉达 26 000 包。1937 年，全厂工人近 500 人。其规模已远远超过了近在咫尺的荣氏福新八厂，被誉为“远东第一”。

孙氏兄弟雄心勃勃，目光远大，他们并不满足于阜丰所取得的辉煌成就。1915 年，孙多森在北京创立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专营各种企业投资。1918 年，在山东烟台创办通益精盐公司，又在哈尔滨创办通森采木公司。在孙氏创办的企业中，以 1916 年创设的中孚商业银行规模最大，总管理处在天津，上海、北京设有分行，上海、北京、南京、苏州又有多处支行，天津、郑州等地亦有办事处。孙氏兄弟以自身的魄力和智慧，从阜丰面粉厂发展到“阜、孚、通”财团，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阜丰面粉厂证章



正在整修中的阜丰
面粉厂办公大楼

1956年，阜丰面粉厂与福新二厂、福新八厂合并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成为上海市区唯一的一家机器面粉厂。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该厂承担了占全市居民口粮供应约70%的面粉加工业务。1984年，在阜丰福新面粉厂的基础上，组建上海市面粉公司，为全市产值最高、销售收入最多、实现利税最丰的100家工业企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州河水质改造工程，沿河的工业企业陆续迁走，阜丰里也早已被拆除。如今，莫干山路120号原阜丰面粉厂总账房间那幢洋房依然耸立，这一带已成为沪上著名的创意产业园区。

附

大来日记（节选）

——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记

虞和平、王杰 译 张富强 校

（九月十六日）这天上午九时，我们举行了全团成员会议，我在办公室里度过了上午的大部分时间。下午三时，我们来到阜丰面粉厂，全面地参观了这座中国最大的面粉厂。该厂有日产面粉1500大桶的能力。我们以前向这个公司供应美国塔科马的小麦，但是现在美元升值已达到原有最低汇率的两倍，我们已完全被关在门外，在今后的三年内，我们将无货卖与中国。他们将从半径为250英里的地区内得到原料供应，并满足所需。但是在质量上，中国的小麦远不及我们的小麦，光泽暗淡。不过他们加工出质量很好的面粉，尤其适合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他们用中国式的楼船由苏州河送我们去阜丰面粉厂。该厂内外都用红旗和常青树作了装饰，人行道上铺着麻织地毯。最后，把我们领到一个大厅里享以糕点，厂主宋先生用英语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他的报告时常被掌声打断。这一报告对我们许多团员来说是一件惊喜之事，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一事实：在此报告的这位中国绅士，只不过与在美国开洗衣店的华人约翰略有不同罢了。下午六点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约会，要去基督教中国青年会出席欢迎会。

——转引自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商务印书馆

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偕其革命同志廖仲恺、胡汉民、张继、朱丁，前往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参观，唐绍仪、温宗尧闻讯前来作陪，他们受到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的热情接待。1917年，孙中山派邓家彦去商务印书馆接洽印刷《会议通则》一书，结果未被接受，只得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19年上半年，孙中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手订《孙文学说》，托人送交商务印书馆，未料又遭退稿。当时，商务印书馆正与北京大学新文化阵营之间展开论战。在革命者孙中山的眼里，商务印书馆已沦落成为“保皇党人盘踞之据点”。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以极其严厉的措



张元济

辞点名批评商务印书馆。有学者统计，孙中山藏书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很少，这恐怕与商务印书馆曾经拒绝出版其著作，使孙中山深为不满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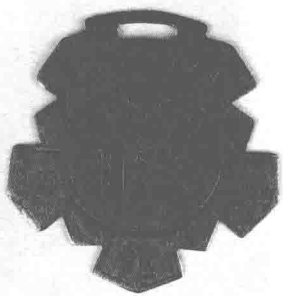
另外，张元济在1917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宋耀如提存款二万元，又未到期者一万八千元，亦来提。”似乎颇有不满。有学者由此认为宋耀如是商务印书馆的大股东。孤证

难立，宋耀如是否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还需进一步论证。但作为中华书局的股东，宋耀如在商务印书馆存有巨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孔祥熙也是中华书局的大股东、董事，为了解决中华书局“民六危机”，翁婿两人时常前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处，商议两家出版机构合并之事。此后，孔祥熙与张元济建立起了不错的私谊，他时常前往张氏寓所拜访求教。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是夏瑞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夏瑞芳是青浦人，鲍氏兄弟是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大家都是基督教清心书院（今市南中学的前身）一起读书的校友，后来夏瑞芳又成了鲍咸昌的妹夫。学校毕业后，三人分别在英文报馆和美华书馆当排字工，眼见出版印刷业利润很高，开始筹划创立自己的印书房。他们的倡议得到了高凤池、郁厚坤、张蟾芬等亲友的支持，大家集资入股，购置机器和纸张，对外招揽业务。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宣告成立。

商务印书馆最大的股东沈伯芬是天主教徒，其他股东大多为信奉基督教的鲍、郁、谢三家成员。因此，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印制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等一些宗教团体的宣传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学堂却保留了下来，新式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给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夏瑞芳等都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知道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重要性。于是，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了国人学习英语的初级课本《华英初阶》，迅速打开市场。紧接着，又推出高一级课本《华英进阶》，销路也很好。这两本读物出版后在中国流行了十多年，获利颇丰，为商务印书馆赚取了第一桶金。1898年6月，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路顺庆里，租屋12间，开设新工厂。1900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日资修文印书馆，规模大为扩充，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稳固的发展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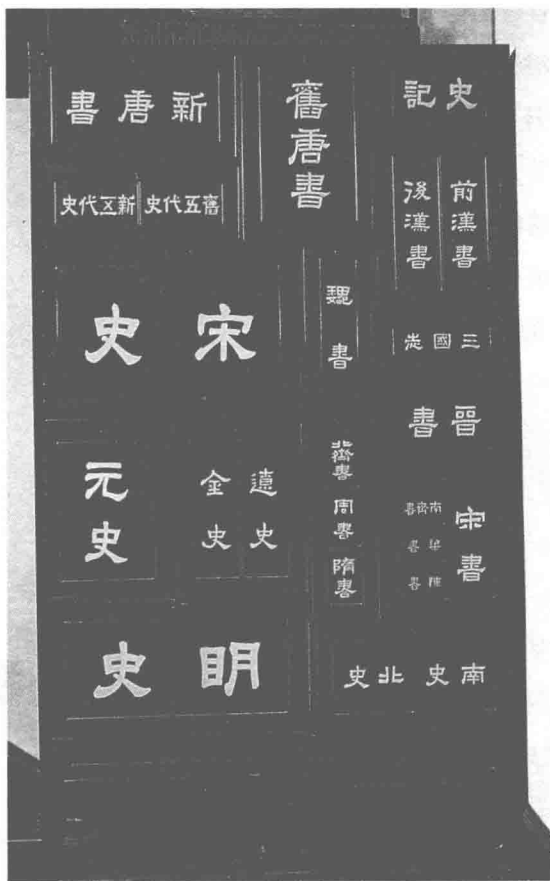
1901年以后，张元济、高梦旦等一批文人加盟，给商务印书馆增添



商务印书馆证章，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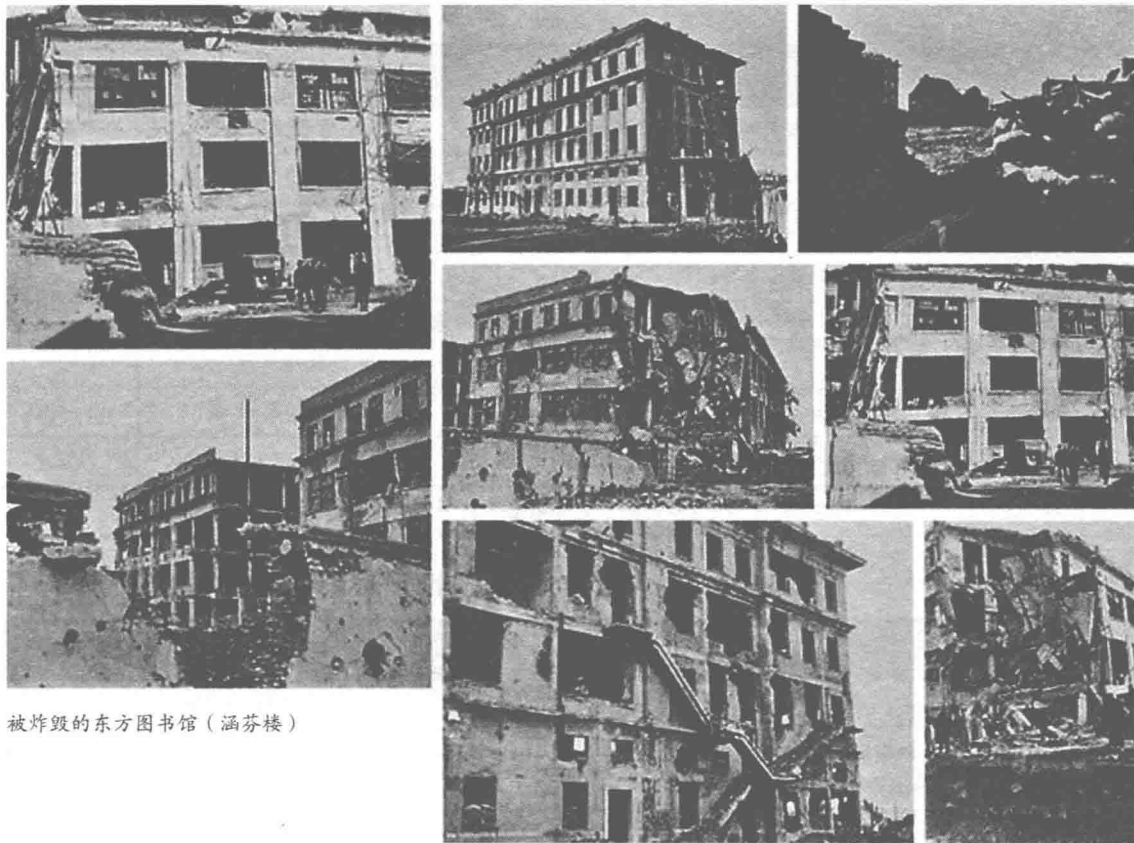
了新的活力。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一户书香门第，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衙门任章京。高梦旦，福建长乐人，1870年出生，少时好实用之学，曾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后率留学生赴日，任留日学生监督。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董事长等职，高梦旦被聘为编译所国文部部长，后升任编译所所长。在张元济、高梦旦等文人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开创了编印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1904年，商务印书馆引进日本出版机构金港堂的资金，规划出版《最新教科书》，并聘请一批日籍专家为顾问，以确保图书质量。《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教

上海孙中山故居所藏商务版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科书，一经问世即大获成功，引发了国内编印教科书的热潮。尽管属于互利互惠的平等合作，但日资参股毕竟有损声誉。1914年1月6日，商务印书馆与日方达成回购股份协议，从此成为“完全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

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15年开始，商务印书馆筹备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部类古籍丛书，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堪称功德无量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在翻印古籍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将公司图书资料室涵芬楼向社会开放，1926年正式改名东方图书馆。据文献记载，东方图书馆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多幅，不乏大量珍贵的孤本、善本，是当时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



被炸毁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

厂，以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遭到日机轰炸。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号称东亚之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实为中华文化的惊天浩劫。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一度迁往重庆，1946年才回到上海。1954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京，后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1957年恢复独立建制。根据业务分工，商务印书馆主要承担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为品牌的出版格局。

张元济日记

(1916年)七月廿五日 星期二

发信 廷桂

用人 告梦翁,托炜士商俞君事。

编译 黄少希编历史演议。与梦翁商,拟请其注重社会方面,又多采野史,注明出处。

印刷 复廷桂信,告知山东银行已来接洽。营口印票,需用美纸明日再寄。

应酬 孙文,偕其友廖仲恺、胡汉民、张溥泉、朱丁五人来观厂。又,唐少川、温顿甫同来作陪。

杂记 买进钱氏书目(也是国牧斋)二本,十八元。

——转引自《张元济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一览表

编号	书名	作(译)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37	救亡策	孙文	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250	<i>Suggestion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i>	J. Low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1912年
305	世界新宪法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1922年8月
309	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	蒋梦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18年11月
316	公共意见与平民政治	A. E. Lowell 范用余译	商务印书馆	1924年3月
321	银行学	陈其鹿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年5月
324	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	爱尔乌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年9月
335	伦理学原理	F. Paulsen	商务印书馆	1913年10月
350	中国美术	波西尔	商务印书馆	1928年8月
352	新广东观察记	李宗黄	商务印书馆	1922年10月
379	两般秋雨庵随笔	梁绍壬	商务印书馆	
380	修辞学	王易	商务印书馆	1926年6月
381	虞初续志	郑澍若	商务印书馆	

续 表

编 号	书 名	作 (译) 者	出 版 单 位	出 版 日 期
392	德国文法教科书	王撰会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398	国际条约大全 (十四年增补)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4 月
450	正气歌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1 月
471	森林要览	凌道扬	商务印书馆	1918 年 4 月
485—487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 第一~第三册	许国英	商务印书馆	
488—497	国文第二~第六册	庄适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5 月
514	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	谢无量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6 月
521	最新行政文牍 第四册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 2 月
545	通俗新尺牍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12 月
552—554	妇女杂志 (第十一卷第一、七、十一号)	章锡深	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575—578	东方杂志 (第二十二卷第十四、 十二、八、九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4 月 至 6 月
991	<i>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i>	Edwin J. Dingle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2 年
1042	<i>The Legal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 Other States</i>	M. T. Z. Ty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7 年
1083	<i>China's New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Problems</i>	M. T. Z. Ty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8 年
1121—1831	二十四史书		涵芬楼影印	
1461	<i>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i>	T. Richard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1 年
1514	<i>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i>	B. K. Sark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6 年
1759	<i>Chapters on China and Forestry</i>	Dau-Yang Li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16 年

商务印书馆

编号	书名	作(译)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1885	<i>English Weekly</i> Oct. 25, 1930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30年
1983	<i>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i>	Ching-Lin Hsia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26年
1984	<i>The Four-Corner Numeral System in Arranging Chinese Characters</i>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6年
1987	<i>Sliver & Prices in China</i>		Shanghai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35年
2569—2570	经史百家简编		商务印书馆	1915年6月
2571—2582	经史百家杂钞		商务印书馆	1906年
2637—2640	新字典		商务印书馆	
2666—2675	王船山读通鉴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	
2942—2953	正续古文辞类纂		商务印书馆	1907年
2962	四部丛刊第二次预约样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3090	神召会诗歌		商务印书馆	1923年

——根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1989年内部印行)整理

上海宋庆龄故居藏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一览表

编号	书名	作(译)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348	苏东坡书赤壁赋		商务印书馆	1938年2月
463	英华大辞典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8年
563	杨杏佛讲演集		商务印书馆	1927年6月
566	<i>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		商务印书馆	1913年
567—568	辞源 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33年3月
569	辞源续编		商务印书馆	1933年5月
858	明密码电报书		商务印书馆	1932年12月

续 表

编 号	书 名	作(译)者	出 版 单 位	出版日期
890	学生字典		上海商务印书馆	
1152	康熙字典		上海商务印书馆	
1153—1154	辞源上、下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年12月
1312	明密码电报书		商务印书馆	1921年8月
1358	华英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559	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	陈翰笙编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1729	<i>English Crammer Serices Book-III Idion and Grammar for Secondary Schools</i>	J. C. Nesfield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5年
1789	<i>Science Readers</i>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3年
1829	<i>English Letter Writer</i>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4年
2229	65年外国学术资料		商务印书馆	1965年2月
2677	明密码电报书		商务印书馆	1919年
4393	圣经摘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8年
4433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六册		商务印书馆	1912年6月
4483	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1年
4525	欲我何为(官话)		上海光学会藏板, 商务印书馆代印	1914年
4537	圣经摘录		商务印书馆	1918年
4885	韩柳文研究法	闽侯林	商务印书馆	1954年

商务印书馆

——根据《上海宋庆龄故居藏书目录》(1987年内部印行)整理

中华书局

位于福州路上的中华书局
总店和商务印书馆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11月29日傍晚，孔祥熙夫妇亲至中华书局总店，为这对“雅好读书”的新婚伉俪订购礼物。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伯鸿），将新出版的《四部备要》装入四只柚木书箱，命人连夜题刻上下款：上款为“介石兄美龄妹结婚纪念”，

下款为“祥熙蔼龄敬赠”，由书法家唐驼题写。该书共五集十箱，第一、二集印订尚未告竣，故先将已出者800余册送至西摩路宋宅，并附预约券一纸。其实，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孔祥熙也是书局最重要的股东和董事。蒋宋联姻，送礼者众多，特意提及《四部备要》，倒是一个不错的广告案例。1930年，孔祥熙就任中华书局董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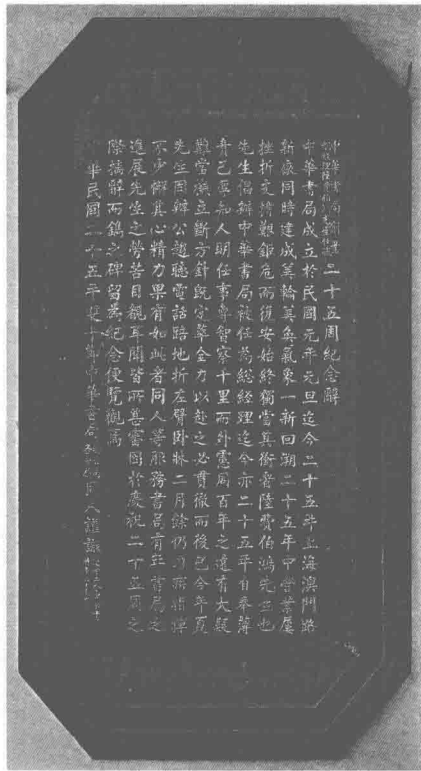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晚清之际，上海的出版界几乎是商务印书馆一统天下。尤其是1904年，商务利用日资推出《最新教科书》获得成功，引领了国内教科书编印之风。而此时的大清

帝国，已步入濒临崩溃的暮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应该及早准备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出版部主任陆费逵却从中看到了无限的商机。1911年，陆费逵秘密约请编辑人员编写一套适应共和体制的教科书。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就在这一天，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等部分商务职员打出了中华书局的旗号，同时推出新编《中华教科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即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宗旨，原清政府认可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这样一来，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一枝独秀，完全应验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虽然商务印书馆紧随其后，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但中华书局毕竟拔得头筹，迅速抢占了教科书市场。此后，编印教科书一直是中华书局的业务重点。

中华书局初创时，资本只有2.5万元，仅在福州路东首租了三间店面。1913年4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股本增加到100万元。1916年，位于静安寺的中华书局总厂落成，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同一年，发行所迁至福州路棋盘街新建的五层大楼，与商务印书馆毗邻。此时的中华书局，资本已增至160万元，先后在各地设立分局40余处，员工有2000多人，一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第二大出版企业。

购地建房，添置设备，虽然确立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领先地位，但几乎占用了公司全部资金。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以致需要吸引社会游资来维持企业运营。1917年5月，外间谣传中华书局即将破产，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公司陷入严重困境。时值民国六年，史称中华书局“民六危机”。为了渡过难关，中

中华书局创业暨总经理陆费逵伯鸿就职二十五周年纪念碑





中华书局历年董事常会纪要，现藏于上海中华印刷展示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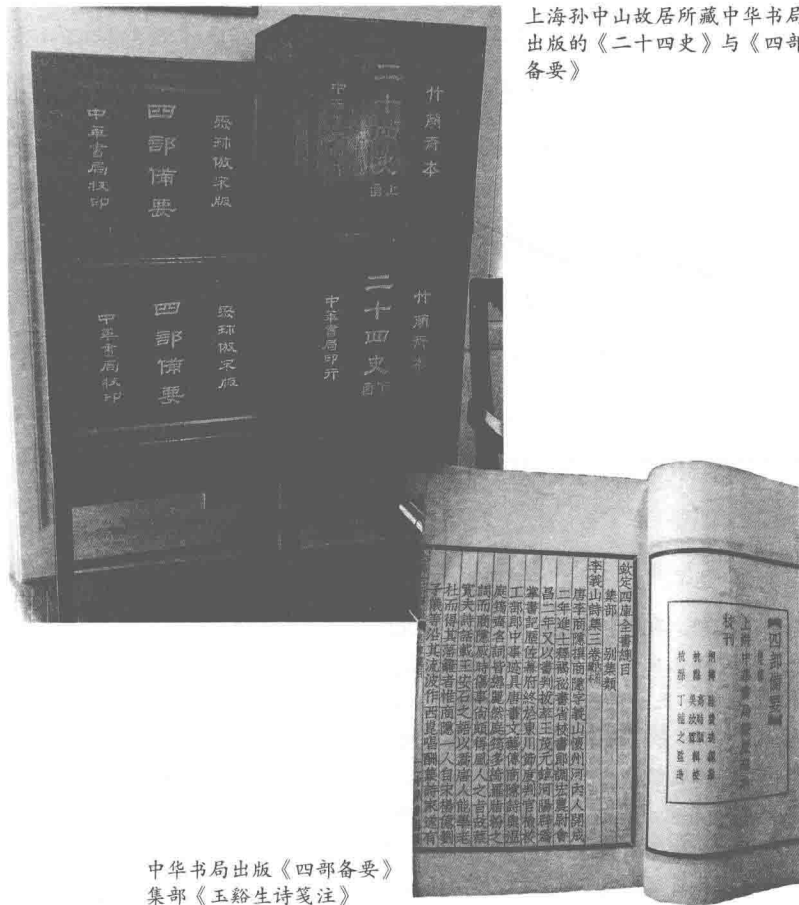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合并。其实，中华和商务都以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为主，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两败俱伤。早在1914年和1916年，两家出版机构就有联合之议，但都没有形成结果。这一次，中华书局因资金周转问题向商务印书馆伸出了橄榄枝，应该是强强联手实现双赢的绝好机会。从当年3月到5月间，双方几乎天天举行会谈。宋耀如与孔祥熙翁婿二人，也时常前往商务总经理张元济处，商议合并之事。虽然张元济认为接手中华书局对商务印书馆有利，但遭到了商务内部郑孝胥等人的

反对。而中华书局此时的实际情况，只是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绝非资不抵债面临倒闭。于是，以宋耀如为首的中华大股东决定出面干预，说服债权人从共同利益出发，不要向公司逼债。此时的宋耀如，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富翁，又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出版商，由他出面大家自然买账。不久，常州富商吴镜渊组织“维华银团”为公司筹集资金，局面终于稳定了下来，中华再次步入发展的正轨。

1930年孔祥熙就任董事长以后，中华书局大量承印政府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发展迅猛。1933年，中华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1935年，又在上海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迁设于此。与商务印书馆一样，中华书局编辑部也附设图书资料室，自1925年起改称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有50余万册，以丛书、类书、地方志、工具书、教科书、报纸杂志等收藏著称。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焚毁，中华书局图书馆成为民间出版机构附设图书馆中藏书最

多的一家。

抗战期间，中华书局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日军占领租界后，澳门路总厂被查封。1942年，中华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54年，中华书局总局迁至北京，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1957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对出版工作的指示，商务和中华两家老牌出版机构恢复独立建制。商务搞“洋”，即从事外国哲社名著的编译工作。中华搞“古”，主要从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与此同时，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一分为二：一部分



迁至陕西北路457号，成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从事《辞海》的编纂和修订。1978年，在辞海编辑所基础上成立上海辞书出版社；另一部分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在上海编辑所基础上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址位于瑞金二路272号。

附

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陆费逵

热心维护此文化机关，而已作古人者，有四人焉，一为戴懋哉先生……，一为范静生先生……，一为陈仲瑀先生……，一为宋耀如先生，子文部长之尊人也。公正刚直，清理兼顾，民六恐慌之时，公为股东，又为大存户，首与公司订分年摊还之约，且责起诉者曰：“吾人当明是非，当与公司当局者共谋维持之方，若冒昧破坏，损失恐更大。”且不时惠顾，勗以努力恢复；屡言外国公司失败再兴者，方为真成功也。此四人者，不及见书局成年，遽归道山，殊令人悲感不置！

——《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一期，1931年8月10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今虹口区东余杭路530号是宋氏老宅，旁边526弄内的大多数房子也是宋家的产业。1931年1月6日，宋老太太倪桂珍签署法律文件，委托律师将宋宅出租给上海烟公司。如今的526弄17号，仍被当地居民称之为“香烟工厂”。据说宋耀如生前曾经开办过卷烟厂，但至今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证据，或许只是小型的家庭作坊。而宋子文、宋子安兄弟，确实插手过“获利颇丰”的卷烟业，还一度担任了民族资本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董事长。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是南洋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他们最初在泰国和日本创业，经营过商业、运输业。但华侨在海外谋生经营和发展事业，没有祖国的强大是不会有前途的，于是简氏兄弟决定回国来发展自己的实业。1905年，他们在香港募集10万港元创立了广东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缺乏经验，生产的卷烟配料不当，质量不好，销路困难，企业刚满一年就宣告停业。后来，兄弟俩改进了生产工艺，推出优质白鹤牌香烟，逐渐为顾客所接受。然而，新生的广东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却受到了老牌英美烟公司的打压，经营发生困难。即使简氏兄弟关闭了日本的店号，尽力经营广东南洋，也未能挽回企业的颓势，公司在1908年5月再次宣告停业。连续的打击并没有浇灭简氏兄弟心头实业救国的火花。资产清理拍卖后，易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注册为无限公司，并于1909年2月重



简照南



简玉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制造厂大门



新经营。他们继续积极经商，用经商的收入充作南洋的资本，终于自1911年起迎来了企业的连年盈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年盈利达到16万元。

在企业发展的鼓舞下，简氏兄弟决定在上海租地开设工厂。1916年在上海开厂生产以后，产品销路更旺。据北方和内地的顾客反映，南洋出产的卷烟口味要超过英美烟，因此产品供不应求，还要从香港调剂补货。1917年上海厂盈利40万元，1918年盈利更达60万元。于是，简氏兄弟将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为500万元，实收资本270万元。改组后的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本店及总工厂设在上海，其分工厂设在香港，并现有支店设在北京、天津、青岛、济南、汉口、南京、镇江、杭州、云南、广州、香港、星（新）加坡。”从此，南洋烟草企业的中心从香港转移到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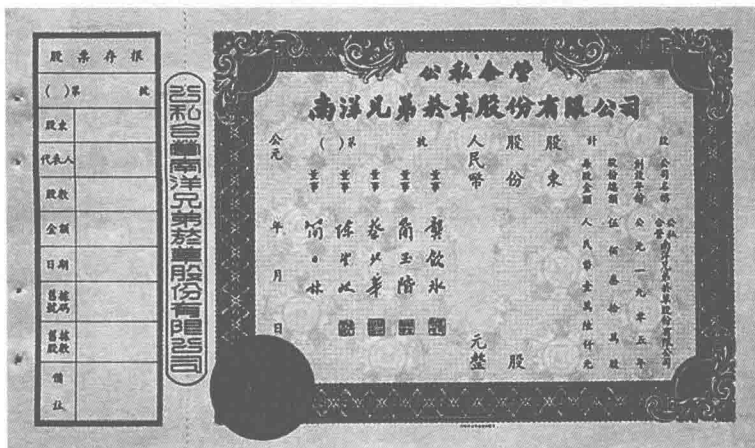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有发展，就引起了英美烟公司的忌恨。早在1914年，他们就让买办邬挺生来与南洋谈判，因要价未能谈拢而不了

了之。1917年和1918年，英美烟公司又先后两次提出吞并南洋的方案，即形式上保留南洋公司的名称，简氏兄弟可以留任总经理和协理的职务，但英美烟公司要收购公司60%的股权，南洋25年内不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经营烟草业务。这一釜底抽薪的吞并方案将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不击自垮。面对英美烟公司的吞并压力，南洋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简玉阶认为：“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国货提倡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在简氏兄弟的坚持下，公司最终没有被英美烟公司吞并。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再一次扩充股本1500万元，营业更有起色。上海和香港的三家卷烟工厂日夜开工也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1920年，公司在上海又建造新厂，装备了自行设计的新式单刀式卷烟机，每分钟可生产卷烟450支。1920年，上海总公司的盈利额高达252万元。1922年，英美烟公司第四次重弹合并的老调，以简玉阶为代表的一派人士坚持抵制，英美烟的图谋未能得逞。在20世纪2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已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卷烟公司。据1932年的统计，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拥有的卷烟机就达119台，占所调查上海全部60家香烟厂卷烟机总数的27%，成为我国民族卷烟工业中的巨无霸。

中国民族资本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引发了一大批政府权贵的觊觎。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开始向民营烟厂渗透，南洋烟草公司亦是

公私合营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行的股票





位于今东大名路上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

其主要目标。宋子文曾托人与简氏兄弟接洽，意欲收购南洋烟草公司股份，后因简家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1937年，迫于外商烟厂的竞争压力，简氏兄弟感到难以独自支撑，便由公司董事冯炳南介绍结识广东银行总经理邓勉仁，从而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你有情我有意，两者一说即合，简氏以每股5元的价格将烟草公司股份之半数出让给宋家，全部股权则由宋所操纵的广东银行保管，从此公司大权落入宋子文手中。同年4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召开董事会，增加宋系董事10名，宋子文亲任董事长，并委派宋系人物程叔度为总经理。

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南洋烟厂被焚毁。193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胶州路购地重建

厂房。抗战胜利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46年5月恢复上海总公司机构，由宋子安任董事长，潘铭新任总经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公司上层管理人员避居香港，只有上海、广州两地工厂勉强维持生产。1951年，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简玉阶任私方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任总经理。1959年1月，上海南洋烟厂转产为上海南洋电机厂。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厂托交中国银行驻港总稽核室代管，公司海外一脉得以继续发展。

中央银行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作为国民政府法定国家银行、最高金融机构，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于上海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中央银行开业暨总裁、副总裁、理监事就职典礼盛况空前，各界要人、外国驻上海使节、中外大银行家、上海财经界名流等应邀出席，蒋介石亲自为中央银行授印并致“训词”。

1904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为我国最早行使国家银行职责的金融机构。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早期的中国银行总行设于北京，实权在北洋军阀所掌控的北京政府手中。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开始筹设革命政权自己的国家银行。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创设于广州，广州市长林云陔兼任行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的宋子文任副行长。不久，林云陔去职，宋子文继任行长。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无论是经营区域、业务范围，还是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广州的中央银行都不符合国家银行的规范。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年底与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而此时的中国银行，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国家银行，但其性质是一家官商合办金融机构，商股掌握着很大的权利。即将完成统一大业的国民政府，需要

的是能完全执行其命令并为之服务的国家银行，一向不怎么听话的中国银行显然不符合要求。况且，中国银行一直是北京政府的国家银行，代表着“反动与保守”，国民政府必须与之划清界限。而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金融机构，只有继续打出“中央银行”的旗帜，才能彰显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性与合法性。

1928年10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而中国银行转为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同时，还公布了《民国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决定发行短期公债3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为中央银行股本，并由财政部出面以该项公债向上海银行界抵借现款作为中央银行的流动资金。8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央银行理事、监事人选，并召开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20日，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身份出任总裁。25日，公布《中央银行章程》。至此，“该行内部已大体布置就绪，重要职员均经内定”，就等11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至于原设于广州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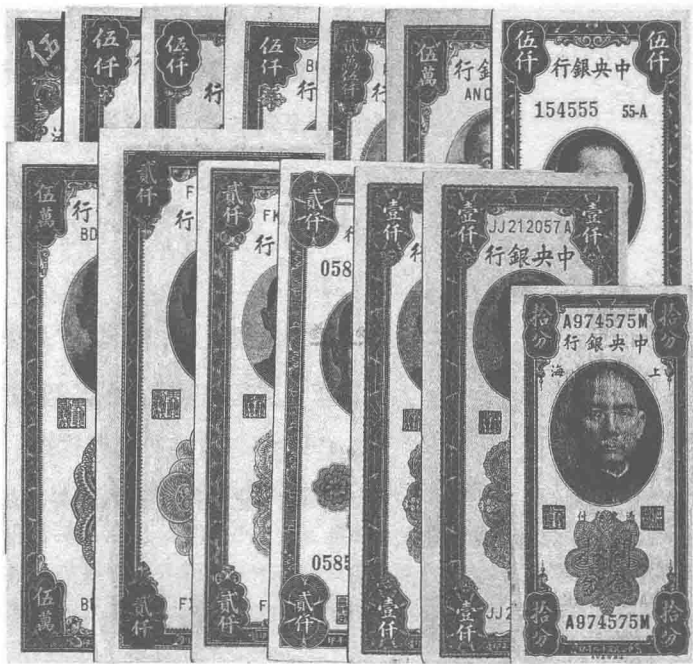
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



央银行，先后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与新成立的中央银行不发生连带关系。

开业之始，中央银行发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面额银行兑换券，12月又发行辅币券。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以及金融信用的提升，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量亦有长足增长。尽管如此，中央银行钞票只是众多银行钞票中的一种，发行数量还远逊于中国、交通两

行。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中央银行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经营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各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不久，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也成为法币发行机构。1937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合组“四联总处”，后又与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称“四行二局”，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国家金融体系。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發行的關金券

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将国家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不久，又策动内蒙古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税收锐减，但江西“剿共”又使军费开支剧增，必须加大货币的发行量，以弥补财政赤字。为此，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善于贯彻“领袖意志”，不像宋子文那样锋芒毕露，蒋介石对他非常满意。10月底，宋子文进一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职，孔祥熙又成了这两个重要职务的继任者。直到1945年7月，孔祥熙才因美金公债案遭到弹劾被迫下台。

抗战期间，中央银行总行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因抗战需要，只能靠大量发行法币以弥补财政的不足。战后，原本应该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稳定货币，恢复经济生产，但为了支付国民党军队庞大的内战军费，法币发行量不减反增，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8月

18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民众将黄金、白银和外汇兑换为金圆券。然而，新货币的发行限额也没有得到坚守，金圆券与法币一样迅速贬值，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民心尽失，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倒台。1949年初，解放军占领长江以北，中央银行总行辗转迁往广州、重庆、成都，年底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外滩15号中央银行大楼归房地产部门管理，各民主党派一度在此集中办公，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上海航天局机关所在地。1991年，通过房地产置换，该大楼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第一家以产业置换形式入驻外滩的金融机构。

位于外滩15号的中央银行，今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附

蒋介石在中央银行开幕典礼上的训词

十七年来，中国经济破产，民生凋敝，无非为经济没办法，政治不得进行，今中央银行开幕，即可进行经济建设，为经济上之解放。总理在粤组中行，资本仅五十万，今中央资本，十愈（余）倍于昔，以良好经济之发展，进行建设事业，则三数年后，其成绩可期。中央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即为国家银行，中央政府基础巩固，政治之建设，实有赖此，望各界予以扶持。

宋子文在中央银行开幕典礼上的答词（节选）

……或谓子文以财政部长兼总裁者，此实出于误会。盖本行条例中明明规定，总裁、副总裁由国民政府于常务理事中遴选之，并非以财政部长资格兼总裁。关于此点，今日特为声明。又其次，则为“今后本行业务之方针”。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条例第一条已明白规定。所谓国家银行者，故名思议，乃代国家做事，非以营业为目的。与普通银行性质固异，即与他种国有营业机关性质亦不相同。盖国家银行之业务，当以全民之利益为目标，不当以银行自身之利益为目标。

……子文自当与诸位同事一致努力，照此方针积极进行，务使确为银行之银行，决不是一般银行、钱庄争目前自身之利益，此则子文所差堪自信者也。今日承诸公光临，并承训示，实觉荣幸之至。此后，必须诸公随时训勉，各界一致辅助，俾本行得达到上述各项之目的，此则尤深盼于诸公者。敬表谢意，并盼赐教。

——《中央银行开幕记》，《银行周报》第12卷第43号，1928年11月6日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设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大清银行纷纷停闭，唯上海分行因地处租界尚能维持营业。1912年2月5日，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原址开业。南北议和成功后，中国银行总行设于北京，由上海阜丰面粉厂厂主孙多森担任总裁。早期的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业务以代理金库为主，存款大部分来自政府机关以及代收之关、盐两税和其他税款，放款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财政部垫款及同业借款。但中国银行又是一家官商合办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上海分行，实权一直掌握在商股手中。在北洋军阀派系争夺、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中国银行始终保持对外信誉，业务稳步上升，为上海经济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2年中国银行
发行的纸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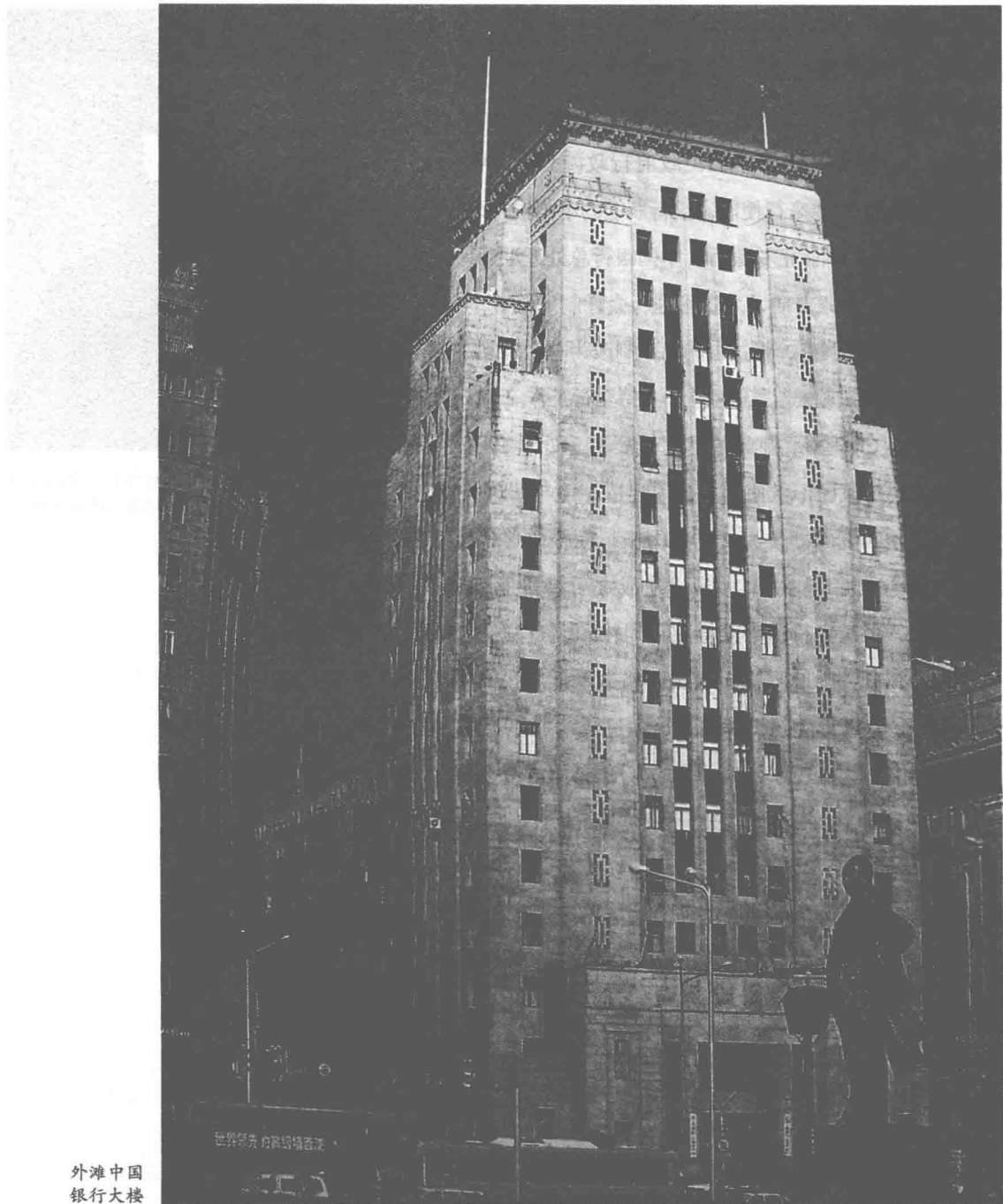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控制金融，一面设立中央银行，一面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27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入驻外滩23号原德国总会大楼办公。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把原来行使国家银行职能的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总处迁沪后，在组织机构、业务方向、人事管理、会计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作了重大调整，将过去的总裁制改为总经理制，原副总裁张嘉璈被推选为总经理，主持全行工作。

1934年，中国银行业务迅速扩展，总处所在的原德国总会建筑已不敷使用，必须建造一幢与“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身份相匹配的办公大楼。中国银行新楼由著名建筑师陆谦受设计，原计划建34层，总高90多米，建成之后将是上海乃至远东的第一高楼。当时，中国银行理事会会议记录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外滩造一高塔，高度约300呎，在圆明园路造一低塔，高度178呎。”可见最初的设计是双塔形建筑。然而，这一建楼计划却受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无理阻扰。紧挨着原德国总会的外滩22号是外滩最高建筑，即77米高的沙逊大厦。执掌租界行政大权的外商决不允许中国银行大楼超过沙逊大厦尖塔高度，因此工部局工程处以地基太深会影响其他建筑为由拒发施工执照，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高法院。与此同时，中国银行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除正常金融业务之外的开销一律削减，最后只好放弃原有设计，将大楼改为地面15层地下2层的单塔形建筑，总高约70米，比沙逊大厦矮了一小截。

1937年底，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竣工。尽管一下子被砍去了17层，但中国银行大楼为四方攒尖顶，与沙逊大厦金字塔形尖顶相比显得更加雄伟挺拔。中国银行大楼占地面积5075.2平方米，建筑面积32548平



曾经担任中国银行
总经理的张嘉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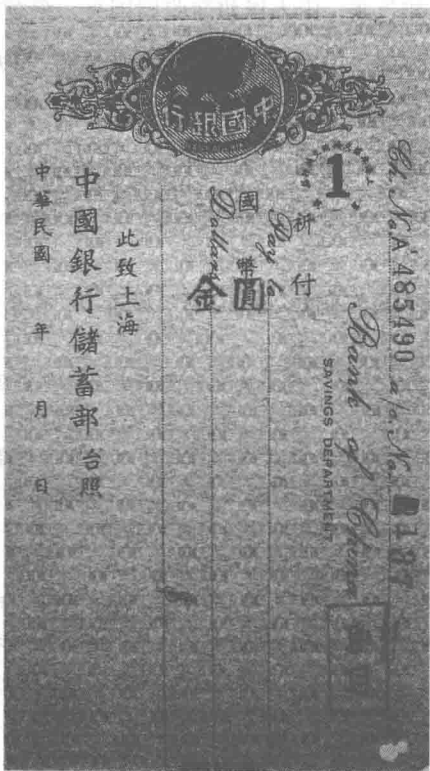


外滩中国
银行大楼

方米，主楼为钢框架结构，副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用去钢材2400吨，全部系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的产品。与外滩其他大楼不同，中国银行是一幢具有民族风格的高层建筑。主楼顶部采用平缓的四方攒尖形屋顶，覆以宝蓝色琉璃瓦，檐部用石斗拱装饰，栏杆、窗格等均采用中国传统图案。大楼内部按银行功能设计，布局合理，设施先进。尤其是营业大厅，铺设大理石地坪，两边各有8根圆柱，顶部为拱形玻璃天棚，并悬挂宫灯，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透露出一股民族豪气。

正当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建造之际，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35年3月通过一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充作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增资之用。中国银行股东会被迫接受增加官股1500万元，官股董事一下子增加为9人。4月1日，中国银行新董事会成立，由财政部指派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原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任总经理。经过这次改组，国民党政权完全控制了中国银行，从而使这家老牌银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中央银行外，中国银行的业务在国家行局中是最大的，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垄断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1944年2月，孔祥熙取代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但宋仍是常务董事和最大的私人股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迁至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624号，与霞飞路办事处同地营业。



中国银行上海储蓄部发行的支票

战区内的虹口、界路、南市办事处及豆市街办事分处移入法租界八仙桥办事处内营业。总管理处主要负责人和各处室转移至香港，沪行经理贝祖诒亦随总管理处驻港，主管全行的外汇等业务。同年12月2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原有对政府的存放款业务、发行钞票的事务，以及对内地各支行处的管辖工作都移归沪行驻港处，留在上海的中行机构基本以商业银行的面貌出现。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沦陷，中国银行自12月22日起停止一切收付。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银行凭借其固有的信誉和政治地位，各项业务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也随之迁至台北市，其后改组并更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遗留在大陆地区的机构和产业，由人民政府收归国有，继续沿用“中国银行”名称，成为新中国唯一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1949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上海迁往北京。

附

宋子文在中国银行大楼奠基仪式上的讲话（节选）

（1936年10月10日）

数年以来，中国银行已经感觉原有的房屋，狭隘不堪，设备简陋；不过因为节省经费起见，勉强迁就，一年一年的迁延下去，直到旧屋实在不能将就，方决定建筑新厦。至于新厦落成以后的外观内容和设备，建筑师已经在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得有声有色；不过兄弟却有一句话，不能不代表中国银行声明，就是无论建筑师那篇文章上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中国银行并不是要修造一所华丽的房屋，来表示我们资产的力量，我们唯一的宗旨，是要增加我们工作的效率，和顾客的便利。至于装饰门面的工夫，是我们所不愿意做的，董事会将原来造价的预算，一再删减至百分之五十，就可明了我们的用意。今天我们所当注意的，不是物质上的观察，是精神上的意义。

——《建筑月刊》，上海市建筑协会发行，1936年第4卷第7期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于1935年4月，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历史渊源，都难以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提并论。但是，农民银行却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更为特殊，与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而四省农民银行的前身则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冬，蒋介石为了配合“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颁布所谓的《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救济条例》，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资助地主乡绅组织“还乡团”。但金融救济处毕竟是内部机构，不能发行钞票，无法解决“剿



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
节约建国储蓄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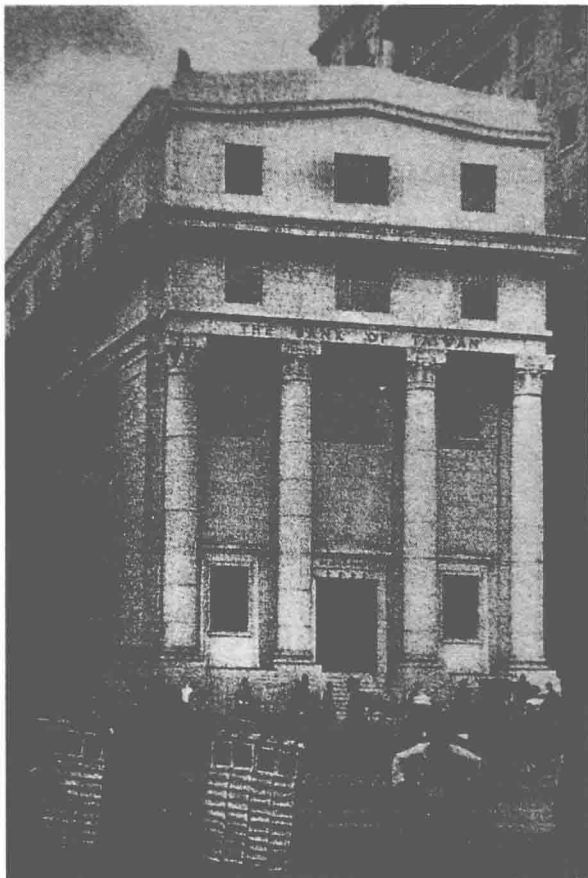
匪”军费问题。1933年4月，“剿总”司令部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组建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由蒋介石的同乡郭外峰担任总经理。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战事已跨出了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范围。蒋介石曾经提出，“军队开到哪里，金融机构必须设到哪里”，于是计划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进一步改组为全国性的国资控股银行。

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同年6月4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明确该行“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依照股份

有限公司之组织设立”。中国农民银行的资本总额定为国币1000万元，由财政部及各省市政府分别认股。另有部分商股对外发售，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奉化武岭学校、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黄埔抚恤委员会、中央军校同学会等单位纷纷斥资认购。因受官股控制，农行领导层由政府委任，历任总经理为徐继庄、叶琢堂、顾翊群、李叔明，除顾翊群外均由蒋介石指派。1938年，农行设立董事长，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1939年，又增加理事长一职，由蒋介石亲自担任。1944年底，孔祥熙被免去财政部长职务，陈果夫以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接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从此农行成为国民党CC系控制的金融机构。

收受部队存款是中国农民银行存汇业务的重点，放款业务也以垫支军费为大宗。国

1945年10月，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进驻外滩16号原日资台湾银行大楼



国民党政权军队数量巨大，每月军费数额惊人。由于农行与军队有特殊关系，加以种种便利条件，巨额军费成为该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另外，为政府军需部门代购军粮是农民银行经营的特殊业务。钱由国库拨给，价格由粮食部核定，农行与粮商直接交易。由于该行收购军粮有功，蒋介石曾多次传令嘉奖。



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兼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果夫

抗战后期，为了给国民党军队的庞大费用开辟财源，农民银行决定开展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所谓信托业务，主要是倒卖人民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盐、粮食、棉花等物资，从中渔利。从1942年到1944年，信托部每年的纯收益占该行当年总收益的60%。抗战胜利后，信托业务越搞越大，经营的业务包括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农业保险、农村水利、农林建设、农村教育、渔业、盐业、制茶、棉织、蚕丝、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通过信托投机，农行不仅为国民党政权扩大内战提供了经费和物资，还通过扶持党营事业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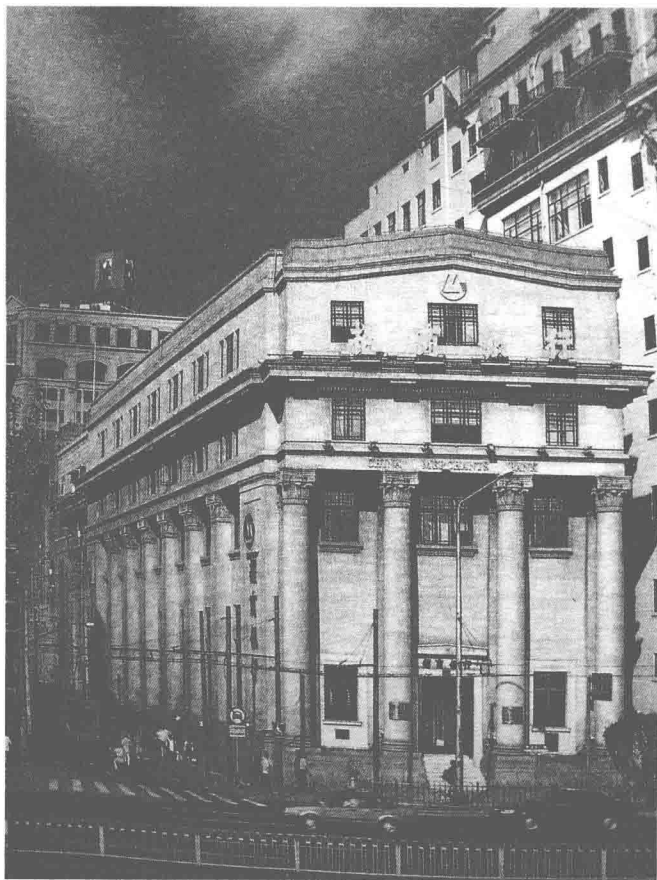
然而，作为国民政府经营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农行对农村资金的投放为数并不算多。1937年以前该行农业放款占放款总额的比重还不到20%，此后几年更是在10%以下。1942年8月中国、交通两家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的农贷业务移交农行接管后，农业贷款额才大量增加。解放战争期间，农行为配合所谓的“戡乱建国”政策，向农村发放各种贷款约300亿元。但这些资金大半被地方土豪劣绅侵吞，农民真正所得微乎其微。

中国农民银行总行最初设在汉口，上海分行早在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时就已设立，1935年2月开始对外营业。1937年4月，根据蒋介

石的“战略需要”，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迁到上海。同年，农行总行又由上海辗转迁至重庆，上海分行继续留在租界，直至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占租界后被迫停止营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指定中国农民银行负责接管清理日商台湾银行。台湾银行成立于1899年，总行设在台北，是日本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11年4月在上海外滩设立分行。抗战期间，台湾银行帮助日本在东南亚扩张经济势力，其业务活动带有很大的侵略性。1945年10月，农行上海分行进驻外滩中山东一路16号原台湾银行大楼，恢复存储、汇兑、放贷、信托等金融业务。

外滩中山东一路16号，今为招商银行营业大楼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农民银行迁往台湾，在台北市设立办事机构。1967年5月20日，农行正式在台湾复业，资本额定为新台币1.5亿元，除继续办理农业金融业务外，也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2005年12月，台湾当局下令废止《中国农民银行条例》。2006年5月1日，农民银行与合作金库银行以2.45 : 1的比例进行换股合并，并更名为“合作金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至于农行留在大陆的产业，一律视为官僚资本，由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没收。新中国成立后，外滩16号是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办公大楼。20世纪90年代，通过产业置换，这里又成了招商银行外滩支行的营业场所。

中央信托局

中央信托局，是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重要机构之一，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合称“四行二局”。1939年，还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逐步形成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统筹机构和大本营。

由国民党政权直接经营的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并且代理国库的地位，在从事具体金融和商业事务上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在中央银行系统之下设立一家独立的金融机构，承办一切信托业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屯兵华北，形势日益危急，国民政府开始加强战略物资的采购和储备工作。然而，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有许多事情必须委托商业机构代理。1934年8月，中央银行奉命筹建中央信托局，拨足资本为法币1000万元。按照《中央信托局章程》，该机构主要经营业务有：

一、储蓄。甲，公务员储蓄；乙，军人储蓄；丙，有彩储蓄。

二、采办办理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与国营事业或公共团体委托购买事项。

三、信托。甲，企业信托；乙，存款信托；丙，基金



中央信托局钢印，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信托；丁，投资信托；戊，证券买卖；己，特约信托。

四、保险。甲，人寿保险；乙，物产保险。

五、保管。代理文件、契据、证券、物料之保管，及代收证券本息。

1935年10月1日，中央信托局正式对外营业，总局设于上海圆明园路8号，后搬入汉口路126号。理事会是中央信托局最高决策机构，理事长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兼任，常务理事为张公权、叶琢堂，理事为宋子良、徐堪，监事为陈行、李铭、陈光甫，理事会聘局长一人总理全局业务。总局内设秘书处、会计处、业务稽核处、信托处、购料处、易华处、储蓄处、房地产处、产物保险处、人寿保险处、中央储备金处、代理出售政府物资财产委员会等12个部门。中央信托局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局28处，各省代理处31处。

中央信托局与中央银行关系密切，历任局长均由央行总裁孔祥熙以理事长的名义予以委任。首任局长张公权，原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因受宋子文排挤，改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但他拒不到任，由此引发了国内金融界的动荡。邀请张公权担任中信局局长，也不过是蒋、孔、宋所把持的官僚金融体系装饰门面的手段而已。不久，张公权调任铁道部部长，只在名义上保留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等机构的理事职位。张走后，由叶琢堂接任局长职务。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而且蒋早年在

上海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就是通过叶的关系。叶琢堂之后的历任中信局局长，如俞鸿钧、刘攻芸、吴任沧、程远帆、沈熙瑞等，也都是蒋、孔、宋家族的亲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信托局总局于1938年底撤至香港。在宋蔼龄的指使下，孔令侃被任命



中央信托局徽章

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孔令侃到任后，大权独揽，局内大小事务均由他做主，甚至中央银行的业务也要插手。对此，局长、副局长也无可奈何。当时，中央信托局主要办理保险、储蓄、信托、购料、运输，都是些“油水”十足的业务，因此成了孔家敛财的主要渠道。除了各项金融业务之外，中央信托局还有一项秘密使命，即向德国采购军火。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也是中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抗战爆发后中德军火贸易不便公开进行，只能在暗中交易。另外，德国几家大的商行也希望在中国收购土产，以抵充军购款项。于是，孔令侃在中央信托局内设立专门机构，为德商大肆收购桐油、猪鬃、矿砂、药材、蛋品等物资，孔家可以从中获取巨额佣金。这些活动贸易不但要瞒着日本，也要避开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搞得非常神秘。中央信托局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军火采购部，为此还在香港设有秘密电台。香港沦陷前夕，中央信托局总局迁往重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总局迁回上海。此时，中央信托局已归属于“国家行局”行列，不再是一般的信托公司。而且，奉命处置敌伪产业，成了中央信托局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副业”。1947年，专门成立的苏浙皖敌伪产业管理局，实为中央信托局下属机构。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和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均为中央信托局没收的“敌伪产业”，后奉蒋介石手谕分配给宋庆龄居住。当然，由中信局接收的所谓优质房产还有很多，大部分都分给了从重庆回来的“党国要人”。于是，“敌产”变成了官僚的私产，接收变成了劫收，在申城上演了一出“五子登科”的丑剧。

中央信托局发行的
节约建国储蓄券



1947年5月7日，中央信托局脱离中央银行，改为国民政府直属金融机构，资本由国库拨给，受财政部监督。1949年，总局迁往广州，后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依然以物资购办和保险为主要业务。2003年7月1日，为配合台湾当局的“金融改革”政策，“中央信托局”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央银行”总裁许嘉栋出任董事长。2007年7月1日，“中央信托局”并入台湾银行。

附

我帮孙夫人找房子

陆天麟

有一天，宋子文打电话给信托局长刘攻芸，说孙夫人要从重庆到上海来定居，需要一个比较靠得住的人，负责接待孙夫人。他们就找到了我，由我办理孙夫人在上海的一些相关事务。……孙夫人定居上海，住宅问题是头等大事，为此我把信托局的事先放在一边，专门办理这件事。有关部门与信托局地产处一联系，结果找到靖江路45号，准备作为孙夫人到上海后暂时的住处。……

靖江路45号原来是德国人的房子，房子较小，潮湿闷热，很难受。住了没多久我们就搬回香山路故居去了。一段时间后，信托局地产处处长来对我说：“你请示一下夫人，淮海路有一处房子，若是喜欢就搬过去吧！”我向夫人汇报后，夫人说：“如果房产没什么纠葛的话，你有空就和我一起去看看吧！”有一天，我陪夫人一起去淮海路看房子。这所房子有点名气，有一个大花园，栽满了樟树，碧绿常青。当时这所房子是美华委员会的职工宿舍，我们去看时那些职工还住在里面。我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央信托局的，来看看房子。”看后，夫人非常喜欢，她对我说：“房子蛮好，但现在有人住在里面，是否会有什么纠葛？将来会不会发生其他问题？”我对她说，这不要紧的，一切都可以解决。……

有人说蒋纬国曾在里面居住过，到底是否住过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蒋纬国也想住进去，而且想要这所房子的名流闻人很多，信托局地产处很为难，谁都不敢得罪。所以，他们反而和我商量，希望孙夫人能住进去，这样其他人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于是，在1948年春天我们从靖江路搬到了淮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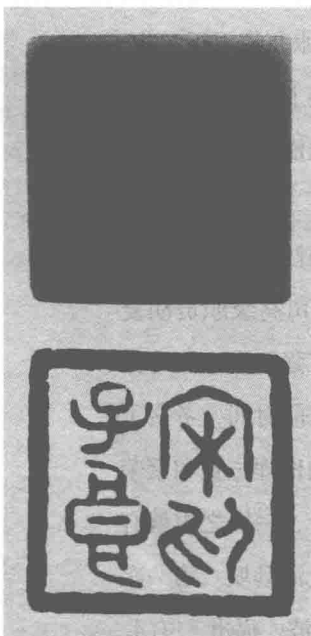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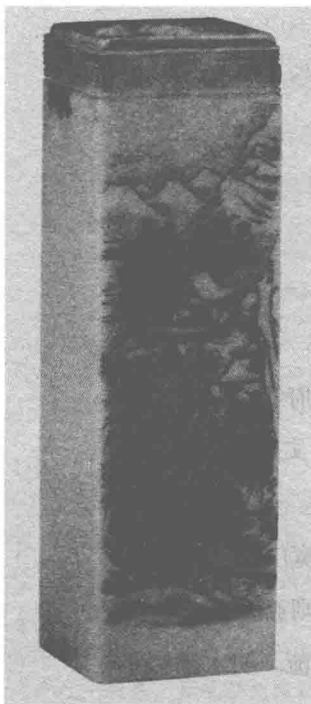
——转引自陆天麟等口述，王志鲜、段炼整理《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代史资料》2009年第1期

上海浚浦局

1927年7月7日，上海设立特别市，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确立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执政地位。1929年宋子良出任上海会丈局局长，1931年3月转任上海浚浦局局长，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肥差。

古代的吴淞江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河道宽广，水量充沛，是上海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所谓“江所不能遽泄者，则亚而为浦”，吴淞江的支流一般称为浦，黄浦是其中比较大的一条支流。明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元吉奉命治理苏松水患。他采用叶宗行的意见，废弃了日渐淤塞的吴淞江下游水道，开浚范家浜，引江水东流再折向北，由吴淞口注入长江。并进一步开挖南北向的黄浦，承接上游太湖大部分洪水，逐渐形成“黄浦夺淞”的局面。这样一来，吴淞江反而成了黄浦江的支流。

如果说吴淞江映照了旧日松江府的辉煌，那么黄浦江则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繁荣。183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与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来到吴淞口，换小船沿黄浦江强行进入上海县城。在上海、宝山、崇明，郭士立一行逗留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考察了当地的经济状况和风俗人情。上海这座天然良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水陆贸易，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胡夏米统计，一周之内就有400多艘100—400吨位的大小船只，经过吴淞口驶往上海县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



浚浦局局长宋子良使用的印章，现藏于上海市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广州辟为通商口岸，列强就是看中了上海港作为南北贸易中转站的特殊地位。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仅十几年的时间，上海的贸易总量就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由于黄浦江泥沙淤积，形成沙洲和滩地，严重影响了上海港的通航能力。自开埠之后，铁壳蒸汽轮船逐年增多，吨位越来越大，吃水越来越深，对码头和航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航道狭窄，一些大型船只难以驶入黄浦江，只能停泊在吴淞口，通过驳船或其他陆上交通工具将货物转运至上海。这样一来，不仅延迟了交货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运输的成本。于是，旗昌、怡和、太古等外商航运公司联名致信江海关税务司，希望中国政府派员疏浚黄浦江航道，整修沿岸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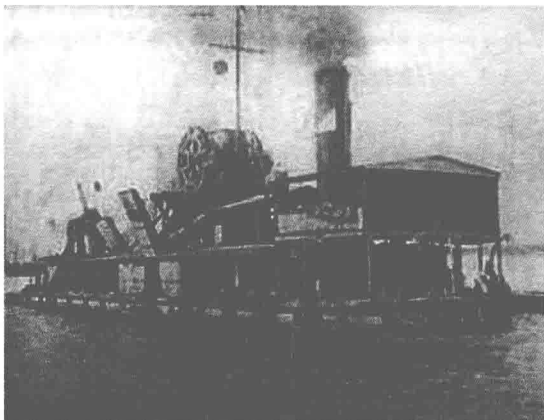
但颀顽的清政府并不把航运贸易当一回事，更不愿意花费人力物力为外商服务。为了缓解列强施加的压力，清政府向英国陆续购买了几艘挖泥船，但船小沙多，根本无济于事。日积月累，黄浦江航道逐渐淤塞，上海港面临着衰败的危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附件第十一款第二条规定，由上海道、海关税务司、各国驻上海领事馆、上海通商总局、驻沪各航运公司、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代表共同组建黄浦江河道整治机构。1905年，清政府外务部与十一国公使签订《修浚黄浦河道条款》，设立浚浦工程局，由辜鸿铭任总办，聘请荷兰人奈格（J. DeriKe）为总工程师，局址设在公共租界九江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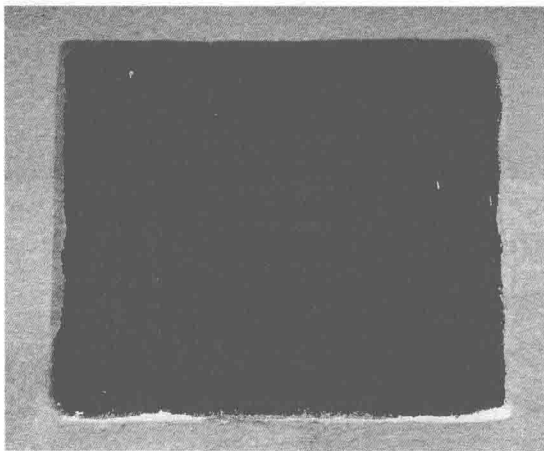
浚浦局路

号。1910年底，由于经费不足，浚浦工程局一度撤销。1912年4月4日，民国政府与英、美、德、法各国再次签订《办理浚浦局暂行章程》，正式建立上海浚浦局，聘瑞典人海德生（A. V. Heidenstam）为总工程师。新设立的浚浦局，不受上海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归中央外交、财政两部领导，由海关附收浚浦税保证其日常开支。

上海浚浦局的职能是多样性的，但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疏浚黄浦江，确保航道畅通。疏浚河道，首先要清理淤泥。据统计，自1912年成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浚浦局总共挖泥64 386 000立方米。至于浚浦局的开销，以1912年以后每年平均800 000两白银计，共支出23 200 000两白银，差不多每挖三立方码的淤泥就要花去一两银子。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海关用于疏浚黄浦江的钱，堆起来比挖出的泥沙还要高。没有人知道疏浚河道的钱到底去了哪里，但挖出来的淤



浚浦局名下的挖泥船“海龙”号



通往复兴岛的定海路桥铭牌

泥却在黄浦江下游堆出了一座神奇的“小岛”，因临近周家嘴而被叫作“周家嘴岛”。1927年，上海浚浦局向国民政府申请，买下周家嘴岛产权，还在岛上兴建了浚浦局俱乐部。

1937年7月淞沪抗战爆发，宋子良撤往大后方，指令总工程师薛卓斌兼代局长，驻留上海维持日常工作。1938年，浚浦局的“海龙”“海狮”“海獭”“海狸”等十余艘挖泥船和测量船被日军强行征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接管浚浦局，黄浦江航道疏浚处于停顿状态，周家嘴岛一度成为日本海军的补给基地。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浚浦局收回周家嘴岛，改名“复兴岛”，1948年在俱乐部花园内树立了“复兴岛收回纪念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贸易处在接管江海关的同时，一并接管了上海浚浦局。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原浚浦局人员全部留用，职位待遇一律不变，为恢复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0年，浚浦局划

归交通部上海区港务局领导，改称港务局工程处。1952年，在工程处基础上重新成立疏浚工程公司。1957年，与港务局航道科合并组建航道管理处，后改组为上海市河道工程管理局。1964年9月，正式更名为上海航道局，疏浚整治黄浦江河道，仍是上海航道局最主要的职责之一。

松江盐务稽核所

1928年6月，宋子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取道欧洲回国。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正大力推行盐务整理与盐税改革，在大哥的安排下宋子安出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

上海濒江临海，土地常受海潮冲击，“瘠鹵之壤”不宜耕种，居民多以煮海盐为生。煮盐业与航运业、棉纺业一直是古代上海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根据文献记载，引海煮盐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要造好团舍，归并灶座，或三灶或两灶合为一团。团内筑池凿井用以存贮卤水，井上须盖屋面遮风挡雨。灶舍方位朝向东南，以适应夏季的季候风，不致烟熏火燎。团内还有便仓，以利储盐待运。团舍之外，辟有大面积的摊场，开河通海，筑坝筑堰，调节水量。农历五、六、七、八月，天气酷热，水汛不至，必须用水车逐段引咸潮入港，以免影响摊晒。每遇大汛，则须彻夜守候，防止潮水涌入，淹没摊场。经过咸潮浸灌之后，摊场内含有大量盐分的泥土称作“灰”。每天由男女丁工分布场上，扒扫摊晒，籬灰取匀，历经几道工序，通过竹管引卤入团，最后举火烹炼，制成食盐。

在古代，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宋子安



海滩晒盐场景

主要来源之一，食盐是由政府严格监管的特殊商品。相传，古海盐县治即设于华亭乡柘林，大致在今金山卫城东北六里处，秦朝的时候塌陷为柘湖，县治这才迁往武原乡。自汉代起，始设郡国盐官，上海地属会稽郡，在海盐故武原乡设有盐官管辖盐务。唐时松江盐区属两浙嘉兴管辖。南宋时期，华亭县新场镇设有茶盐分司，并在下沙设立盐课司。元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盐的生产与流通，对江南盐场的控制更为严格，在华亭和上海县城设盐局，并派军队驻扎下属盐场，严禁食盐私产私销。在官府的强力压榨之下，松江府全境五大盐场食盐产量一度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定额总数约为宋代产盐量的一倍。明代设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于杭州，设松江分司于下沙镇，委派副司管领新旧盐场团舍灶户。清代初期，下沙场副使改为批验所大使，两浙松江分司改为嘉松分司，各场置

盐务司署，设盐课司大使。同治年间，浙西官盐总局设于上海县，管理督察食盐运销和缉私事务，后移设苏州。

民国初年，江苏省在松江设立松盐运销局，浙江省在上海设“苏五属督销局”收税处。上海全境盐税收入，四成归江苏，六成归浙江。1913年1月，北洋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盐务稽核总所，聘用洋员为总所会办，监督全国盐税收入。同年6月，在上海设“苏五属榷运局”，管理盐税事务。1914年6月，设立松江盐务稽核分所，原“苏五属榷运局”改组为松江盐运副署，主管盐务行政。

宋子安就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之际，正是国民政府着手改革盐政的关键时期。根据1913年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协定，中国政府仅能使用盐税收入抵债后的余款，即“盐余”。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税率，北洋政府曾经颁布《盐税条例》，规定每百斤食盐征税2.5元（后改为3元），此外不得以其他任何名目征税。但由于内战频兴，军需浩繁，各省相继截留盐税，并擅自增收附加费，盐政一度失控，积弊日深。在上海地区，食盐的产销一度实行包商制度，即由商人先行缴纳现金，由政府发放引票，凭票到盐场收购食盐运往他处销售，并承包该地区的盐税征收。在官商勾结之下，承包商打着食盐专卖的旗帜擅自提高盐价，任意征收盐税，人民苦不堪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于全国已在形式上达成统一，中央财税部门开始着手改革盐政。1931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以“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为原则，规定每100公斤食盐征税5元，渔盐征税0.3元，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税。虽新法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但因奸商暗中阻挠，加之财政当局深恐税收减少，直至抗战爆发仍未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然而，此时的盐税收入已很可观。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为8524万元，1937年达到2.2863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2.9%，这还不包括已经沦陷的东北地区。



财政部松江盐务管理局徽章，
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在此背景之下，宋子安走马上任，全力推行新盐税法，为整理场产而四处奔劳。所谓的整理场产，即对下属盐场进行实地调查，制订计划，充分发掘盐场的生产潜力，提高食盐产量。对于那些设备陈旧的盐场，宋子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和人脉关系，四处筹措款项，加紧维修，保障供给，为恢复生产而精心操劳。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松江地区的盐务管理得以加强，盐税收入也随之迅速增加。因襄助盐税改革有功，宋子安不久即升任松江盐运副使兼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全面掌管松江一地的盐政事务。与此同时，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宋子文在财政部专门成立缉私处，并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缉私武装——税警总团，主要驻守在上海一带，税警官佐教练所即设在松江。宋子安就任松江盐运副使之后，在做好食盐推广运销和盐税征收工作的同时，常常率领武装人员下乡开展缉私活动，有力地打击了走私势力，保障了新盐税法的贯彻实施。1933年，宋子安接任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离开松江。1937年4月，松江盐务稽核所改组为松江盐务管理局，原松江盐运副署同时撤销。

虬江码头

宋子良曾以中央银行代表的身份出任虬江码头建设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大上海计划”中最为重要的工程——虬江码头一期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在上海的东北角，杨树浦和吴淞之间，有一条黄浦江的支流——虬江，原是吴淞江的旧水道。宋代以后，因泥沙淤塞严重，吴淞江已无法承担来自太湖的洪峰，旱涝灾害不断。明永乐年间，户部左侍郎夏元吉奉命前往江南治理水患，他听取了精通水利的上海人叶宗行的建议，拓宽挖深上海浦使之成为黄浦江的下游水道，并放弃吴淞江下游水道，开凿范家浜引江水入浦。于是，被废弃的吴淞江下游水道被称为“旧江”，沪语“旧”“虬”同音，逐渐演变为“虬江”。原虬江古河道西起白鹤江，向东流经今白鹤、旧青浦、纪王、封浜、江桥、沈家行，过黄浦江至高桥镇东北注入长江。清中期以后，仅存数段彼此不相联通的残留河道。上海开埠之后，虬江所流经的北区日益繁荣，1914年和1922年，闸北一带残存的虬江水道分两次填没筑成虬江路。而杨树浦以北地区，因水路交通日益繁忙，虬江逐渐成为流经江湾五角场区域通往黄浦江的航运要道。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上海现在虽成为全中国最大之商港，而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从而提出了将上海改造成为现代化多功能港口城市的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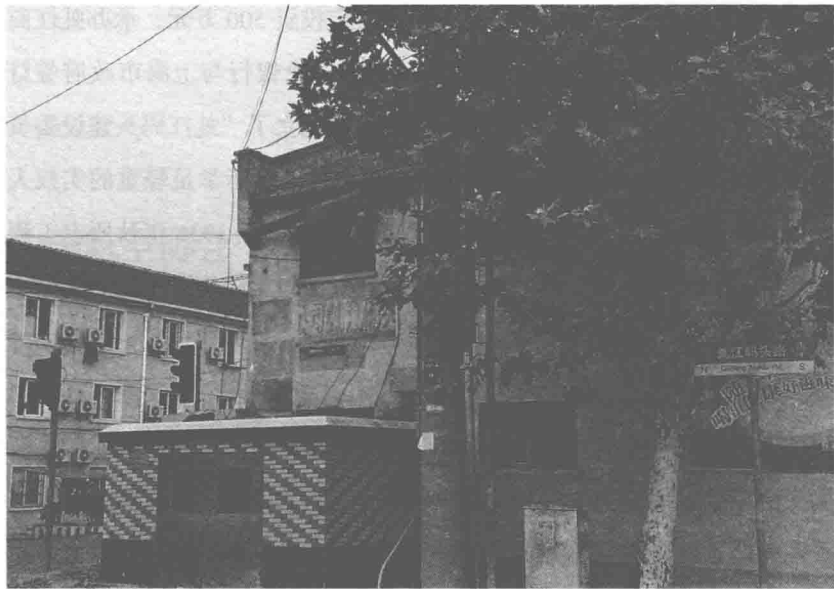
宋子良

伟计划。依据孙中山“以港兴市”的基本思想，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伊始，就开始酝酿建设“大上海”，希望“能达到总理之远大规划，使上海成为各商埠之模范，以此根据地为建国方略之发轫点”。1929年7月，上海市政府决定绕开租界，在江湾另行开辟一个新的市中心。同年8月，公布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此后又陆续公布了《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上海市分区计划》和《上海市道路计划》，这些全市性或专题性的建设计划，构成了近代上海第一个总体性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

根据《实业计划》，孙中山理想中的东方大港位于杭州湾沿岸乍浦与澉浦岬之间，当时这里并不属于上海的行政管辖范围。因此，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吴淞建造新高港，而《实业计划》中所拟建的挖入式泊船坞

虬江码头旧址





通往虬江码头的
虬江码头路

大致位置正处于虬江与黄浦江汇合处。经过勘察，从虬江口到吴淞口的黄浦江下游江水较深，可停泊吨位较大的船只。在此建造码头，水路可通过蕰藻浜至江浙内地，陆路可在此增辟支线与京沪、沪杭甬铁路连接，无疑对“大上海市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极为有利。1931年1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决定先在此处建造码头，以备将来在吴淞开辟新商港。虬江码头岸线设计为1400米，面积约800亩，计划以客运为主，兼作国内航运的起迄点。整个工程预计用14年时间分三期建造，竣工后的虬江码头将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以及远东地势最优越、设备最周到的码头和海陆空交通中心。如果说《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是建设“新上海”的核心，那么《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则是整个“大上海计划”的基础，是“以港兴市”实现孙中山建造“东方大港”美好愿景的第一步。

但是，工程尚未上马，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受战事影响，巨额的工程款已非上海市政府所能承担。1934年11月，

中央银行觉得建造码头有利可图，于是决定投资 500 万元，承办虬江商港若干码头和仓库的建造。1935 年 2 月，中央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兴建虬江码头互惠办法协议书》，共同组建成立了“虬江码头建设委员会”，宋子良以中央银行代表的身份出任委员，属于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1936 年 6 月，虬江码头一期工程奠基开工，至 1936 年秋所定工程基本完成。包括总长 1 180 英尺的钢筋混凝土固定结构万吨级码头泊位两个，两层钢筋水泥堆栈两幢和铁棚平栈两幢，另外建造了一些辅助的露天堆货场和办公楼。在建造码头的同时，为了便利陆运交通，还专门辟建了虬江码头路，并有两条南北向的铁路与码头相连。新建成的虬江码头一期，可以停泊 2 万吨大船 3 艘和 1 万吨大船 1 艘，或同时停泊 5 千吨轮船 6 艘。按照投资双方签署的协议书，虬江码头建成之后由中央银行派员管理。为此，由中央银行负责筹建的中央信托局还专门成立了虬江码头业务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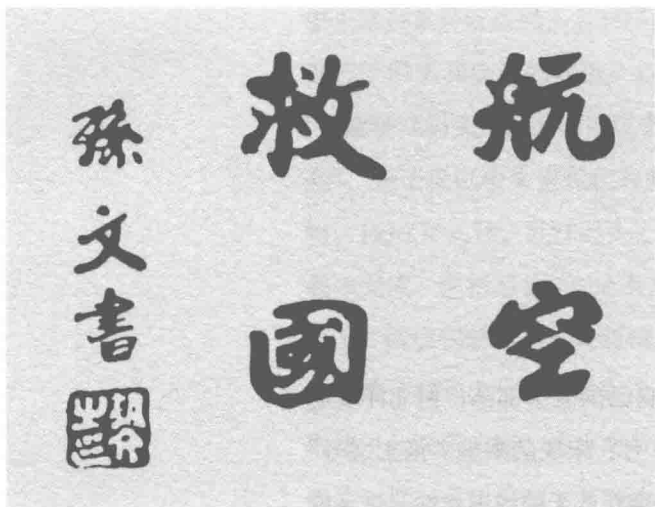
第一期工程完成后，虬江码头正式对外营业，曾经停靠过招商局的轮船和外商的远洋客货轮。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于 9 月 6 日在虬江码头登陆，一路向西，见屋就烧，见村就毁，房舍人畜一概不留，建于明代的殷行古镇及附近 45 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之后，虬江码头被日军长期侵占，改名饭田码头，作为海军港务部栈桥。抗战胜利后，虬江码头仍由中央信托局经营管理。国共内战期间，被国民党海军征用，停靠军舰，抢运战备物资。1949 年上海解放后，这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专用码头。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

尽管早在 1911 年中国就已开始构建自己的航空部队，但北洋政府时期的空中力量是非常微弱的。1923 年 7 月，宋庆龄乘坐“洛士文号”飞机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试飞，成为首位翱翔在蓝天的中国女性。试飞成功后，孙中山题写了“航空救国”四字以资鼓励。1928 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成立，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的空军。1935 年，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亲任委员长。

1932 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寻衅发动“一·二八”事变，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闸北、江湾，大批工厂企业、市政机构和文化设施被毁，百姓流离失所，损失十分惨重。战火平息之后，中国民众开始认识到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掌握了制空权才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同年 4 月，上海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6 月 28 日正式成立，即着手征求会员和捐款，拟定创办航空工程学校和飞机制造工厂计划。1933 年元旦，中国航空协会又在上海成立，宋美龄任会长，孔祥熙、吴铁城、王正廷、王晓籁、林康侯、张惠长、黄秉衡等 7 人为常务理事。

自成立之后，中国航空协会陆续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江苏、河南等省成立分会，但位于上海的总会却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而此时，近代上海第一个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正在建设之中，航空协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也将目光投向了新市中心江湾五角场一



孙中山手迹“航空救国”

带。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航空协会很快从民间集资 10 万元，征得上海市博物馆（今长海路 174 号）旁 10 亩土地，聘请留美建筑师、“大上海计划”总顾问董大酉担任会所及陈列馆的设计师，并由泰锦记营造厂负责承建。193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航空协会大楼举行奠基仪式，上海各界领袖及该会理事、会员参加了典礼。首先，由航空协会常务理事兼常委召集人王

晓籟报告该会成立经过及征募建筑费用等情况，继由华侨领袖胡文虎的代表林霭民及上海市长吴铁城发表演说。吴铁城指出：“今天举行中国航空协会会所奠基典礼，目的是奠定中华民国航空救国运动的基础。中国航空协会，系我国唯一的民间赞助政府建设之空防机关。同时，也是主持民间航空事业的机关。今天即吾国航空强盛的开始，深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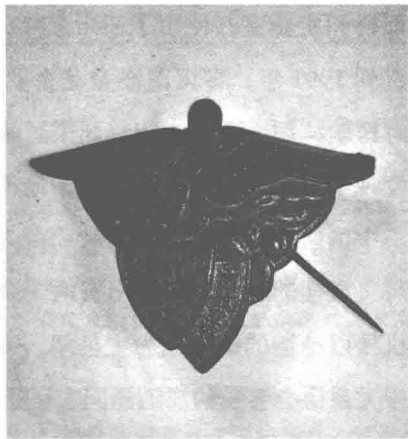
尽管航空协会大楼是由民间机构出资建造的，但董大酉还是将该建筑纳入了“大上海计划”市中心区域建筑群总体规划之中。为凸显航空协会“提倡国民航空救国，研究发展航空技术”的宗旨，整幢大楼如同一架凌空起飞的双翼飞机，而外观和细部装饰则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式样，整体风格与附近的市博物馆和市图书馆相得益彰。飞机楼的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机首”和“双翼”组成，共三层。圆形“机首”的底层为会客室，顶层为天坛式样的纪念堂，中间呈圈状，建成三祭台，正中镶着一块蓝色玻璃，阳光可透过玻璃直射大厅，此曰“皇穹宇”。楼顶上是“圜丘坛”，坛分三层三圈，用白石砌成，按九的倍数依次递减。“前翼”的一二层为航空陈列馆和航

空图书馆；第二部分是“机身”和“尾翼”，高二层，是航空协会的办公场所。“机身”顶部也像飞机一般呈弧形。“尾翼”上镶有“中国航空协会”字样。这幢承载着中华民族“航空救国”梦想的飞机楼，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均相当完美，工程进度很快，从奠基到竣工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1936年春大楼竣工，5月5日正式交付使用。

飞机楼建成后，一些展览会相继在这里举办，例如中国建筑展、简易航空展等。另外，中国航空协会先后两次发起“捐资购机”活动，海内外爱国同胞踊跃捐款。第一次募得139万元，购买飞机18架；第二次募得129万元，作为中国空军后勤保障之用。在航空协会的努力下，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航空救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然而时隔不久，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飞机楼遭日军轰炸，受到严重破坏。上海沦陷后，飞机楼被日军用作军火库。1941年3月，汪伪政府筹建上海特别市卫生局，一度在这里办公。抗战胜利后，原先的租界已归还中国政府，江湾不再是上海的政治中心，这座经典建筑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中国航空协会纪念奖章，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中国航空协会胸针，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旧址

1949年9月初沪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在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旧址上成立，1951年7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飞机楼被圈在了大学校园里。此后，飞机楼作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和实验室，使用了三十多年，但无人知道这幢建筑的具体来历。直到1991年，泰国南洋金龙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钟良先生前往长海医院就医，不经意间看到了这幢美轮美奂的建筑，并且在正门右侧发现了大楼的奠基石。为此，他特地去南京查阅有关档案，由此揭开了中国航空协会这一段悲壮而令人唏嘘的历史。郑钟良特别珍惜自己与飞机楼的缘分，特意出资两千余万元对大楼进行修缮。修复后的飞机楼以纯洁的银白色为主色调，突出建筑的飘逸与庄严。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同志，还专门题写了“飞机楼”匾额。如今，中国航空协会飞机楼是第二军医大学校史馆的所在地，每年新生入学都会到这里上了解校史的第一课。

附

蒋介石《航空训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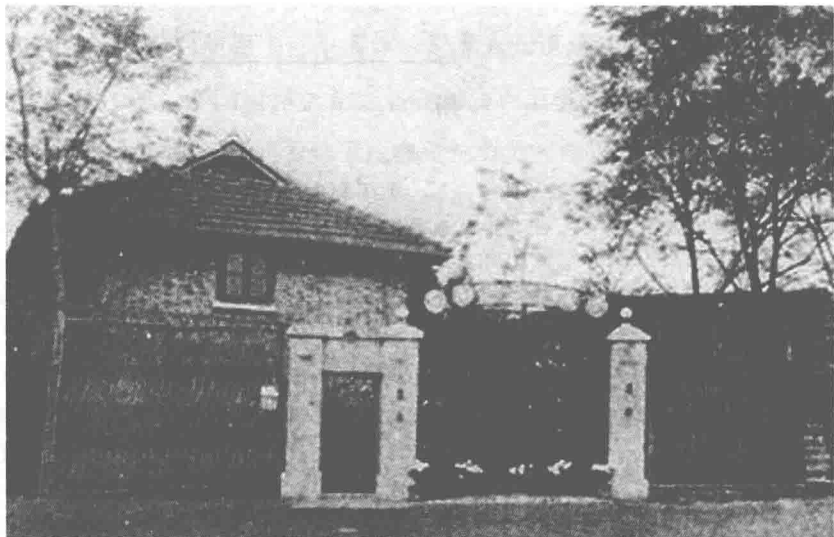
现在要救我们的国家，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空军。因为中国的陆军海军在最近几年之内，无论如何练，都比不上人家。我们若要海陆军与人家并驾齐驱，至少也要二三十年的功夫；而且当我们前进的时候，人家同时也在前进，一定要我们的进步比他快，然后才能赶得上！所以要靠陆军海军来救国家，现在已来不及。只有在陆军海军之外，注重空军，只要我们能加倍的努力，空军总是可以赶得上人家的！譬如某国的空军，战斗员还只有四百人，如照我们的计划，四年之后一定可以赶上，但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加倍的努力。如果能加倍努力，四年以后，即可与彼方抗衡；所以，空军是救国唯一的力量。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普通会员会证》左页文字

裨文女塾

宋母倪桂珍幼年时随父亲倪蕴山从川沙老家来到浦西，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旁的裨文女塾。在这所采用西方教学方法授课的教会学校里，倪桂珍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还学会了弹钢琴。17岁毕业之后，倪桂珍留校担任教员。

裨文女塾创办于1850年，先后改名裨文女中、沪南女中、市九女中等。随着民办先锋中学、建浦中学、上海市第二十一中学、肇周路小学、浦西中学、蓬莱中学、上海市沪南体育活动中心等先后拆并融入，2003年定名为“黄浦学校”，如今已成为一所大型的九年一贯制现代学校。



上海最早的女校
裨文女塾

说起裨文女塾，不得不说到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裨治文出生于美国一个农民家庭，在其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影响下，11岁就加入了公理会。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安道华神学院深造，后受美国国外宣教会派遣，于1830年抵达广州，成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刚到广州，裨治文跟从英国伦敦会的苏格兰教士马礼逊学习中文，三年后与马礼逊共同创办《中国丛报月刊》并担任主编。1847年，裨治文与妻子伊丽莎白·格兰特移居上海，并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编印



裨治文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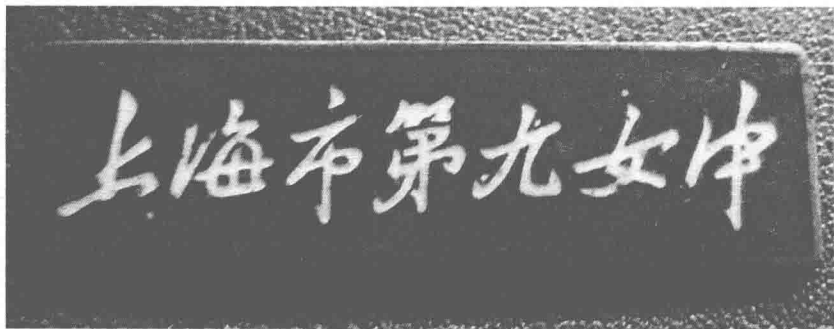
学报。一年后，上海文学与科学会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裨治文担任会长。身处中国的裨治文十分关心女孩教育，他坚定地支持妻子伊丽莎白·格兰特于1850年创立中国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校址在县城西门外斜桥。建校之初，裨文女塾仅招收了12名学生，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为防止歹徒闯入校园，格兰特校长还雇佣了一名彪形大汉当警卫，拿着一支毛瑟枪，整天在校园里巡逻。由于严谨的办学作风和优越的学习条件，使得当时上海滩有钱人家间曾传有“非裨文女生不娶”的戏言。

裨文女中真正发展壮大是在王佩贞校长任上，她为裨文女中奉献了毕生的年华。王佩贞生于1904年，1922年毕业于裨文女中，1930年沪江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毕业，1931年9月受聘担任裨文女中校长。王佩贞上任后，发现校舍简陋，园地荒芜，规模很小，课程简单，她矢志要改变这种状况，将裨文女中办成出色的学校。她首先广开师资渠道，打破以往教会女中的清规戒律，聘请既德高望重又有真才实学的非教徒男教师执教；其次调整课程，除继续注重英语教学外，开始重视数理，又十分注意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智能，开设体育、钢琴、歌唱、演剧、家政等课程。同时，她又积极筹措资金建造新校舍。经过三

年努力，一幢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的三层大楼，终于在1937年正式落成并交付使用。由于她精于教学管理，学校实力明显提升，声誉鹊起，上海滩不少中上层人士、社会名流都期望送自己的女儿进裨文女中。由于裨文女中办学有道，声名越来越响，一些国民党元老纷纷应邀题词，居正题词“昌明女学，世济贤良”，孙科题词“百年树人”，程潜题词“桃李盈门”。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不让学生受侵略者的欺侮，王佩贞毅然放弃新校舍，迁入租界内租屋上课。先后在原大通路新民中学、南阳路爱国女中、戈登路女青年会、赫德路海关总署职员宿舍艰难地坚持办学。同时，为了保全原南市校舍不被日寇占据，面对日本宪兵“征用”的命令，王佩贞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孤身出入戒备森严的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交涉。她的理由是“教会女校，男性不得入内”。经过她斗智斗勇和多方斡旋，终于保全了校舍，免受日寇的践踏。不久，日寇为了制造军火，欲将沦陷区内所有金属都作为战略物资搜刮走，学校教堂内有一口从美国纽约铸造后运来的铜钟，也成为日寇觊觎之物。王佩贞闻讯，马上组织人力把它从钟楼上卸下来，埋入地下加以保护。但可惜的是，这件有150年历史的文物，后来不经意间被外来人员偷走砸碎当废铜烂铁卖掉了。

1937年和1948年，王佩贞先后两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欧柏林大学进修，回国后均继任裨文女中校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



上海市第九女子
中学校徽



原上海市第九中学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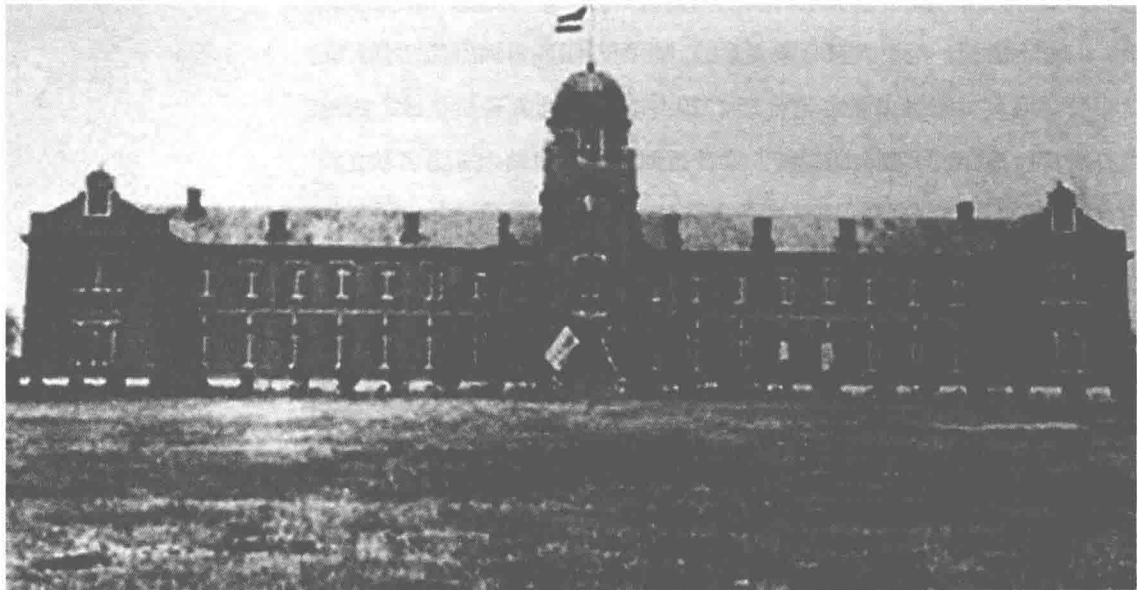
国教会对裨文女中施加压力，断绝经济资助，撤回美籍教师，并暗中策动王佩贞去美国。面对这一重大问题，王佩贞采取了独特而又极富浪漫色彩的处理方法。在沪江大学时，王佩贞有个恋人，但因为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信教，两个人被一条无形的“银河”阻隔而不能结合。在这个特定时刻，王佩贞决定与苦恋了20年之久的恋人喜结良缘，用这个办法巧妙地摆脱了教会的羁绊。学校也回绝外资津贴，并更名私立沪南女子中学，独立办学。1953年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由私立转为公办，王佩贞先后被陈毅市长委任为副校长、校长。1971年她才从校长任上退了下来，但她退而不休，仍然时刻关心着学校工作，直到1998年逝世。

除了伊丽莎·格兰特和王佩贞，先后有20多位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前14位是美籍人士，自1926年在政府立案起，才改由华人当校长。慈眉善目的“革命老人”王瑞兰、林景华等历任校长，都为该校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中国公学

1890年，宋耀如由“巡行传道”自降为“本处传道”，即“除去了年议会会员的资格”成为“可在本堂担任传道职务的教友”。此后，他在上海定居，并执教于慕尔堂内的主日学校。虽然教职身份降低了，但传教义务也相应减轻了，其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实业和革命。后来，宋耀如曾经担任中国公学教员，在授课之余宣传革命。作为最早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宋耀如的言行给学生胡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无理剥夺中国留学生的自由居住权和自由通信权。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千余名留学生罢课抗议，其中一部分人忿然退学回国。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经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租赁民房，筹办中国公学。日常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公推张邦杰、黄兆祥、王敬芳为执行部干事，谭心休、钟右愚等为评议部议员，实际工作由王敬芳主持。4月10日，中国公学正式开学，首批新生318人，分别来自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等13个省份。没过多久，日本有关规则逐渐懈弛，官费学生大多东渡复学，中国公学陷于困境，面临解散。经干事张邦杰、王敬芳等人四处奔走，在郑孝胥、熊希龄的帮助下，两江总督端方答应每月资助中国公学1000两白银，并拨吴淞百余亩官地作为校址。虽然是由清政府资助的学校，但当时的中国公学云集了一大批革命志士。除了宋耀如之外，于右任、马君武、沈翔云、彭施滌等都曾担任过教员，章太炎、陈其美、戴天仇等也常常

中国公学教职员工在教学大楼前合影



出入该校。在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中国公学校友就有 18 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学生中约一半人参加了革命党，“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

1907 年，大清银行营口经理罗诒答应提供 10 万两白银贷款，用于建造吴淞校舍。1909 年春，中国公学新校舍在吴淞炮台湾落成，计有学生宿舍 130 余间，教职员办公室 10 余间，教室 10 余间，电机房 3 间和操场 2 处。创建之初，中国公学实行的是民主管理体制，执行部干事由学生公选，并对由学生班长、室长组成的评议部负责。接受清政府资助之后，中国公学聘请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数十人担任校董，推选张謇为董事长，推举郑孝胥为学校监督。同时取消了原有的评议部，并改公选的干事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这无疑是对学校民主办学传统的背叛，从而引发了学生和校方的严重对立。1908 年 9 月，包括胡适、杨杏佛、张奚若等人在内的 160 余名学生宣布退学，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自行创办中国新公学，继续实行学生自治校的民主实验。中国新公学艰难地支撑了一年多

的时间，终因经费拮据而难以为继。此时，中国公学在吴淞建造了新校舍，却苦于生源匮乏，就主动招呼新公学商议两校事宜。1909 年 10 月，经过谈判，新老公学宣布合并，学校的管理重新回到了民主自治的轨道。正如胡适后来所说：“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毅然加入中国公学校董会，以示对这所革命学校的支持。但因军阀混战，经费筹措困难，吴淞校园又被同济医工学校借用，中国公学几度停办。直到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毅然加入中国公学校董会，以示对这所革命学校的支持。但因军阀混战，经费筹措困难，吴淞校园又被同济医工学校借用，中国公学几度停办。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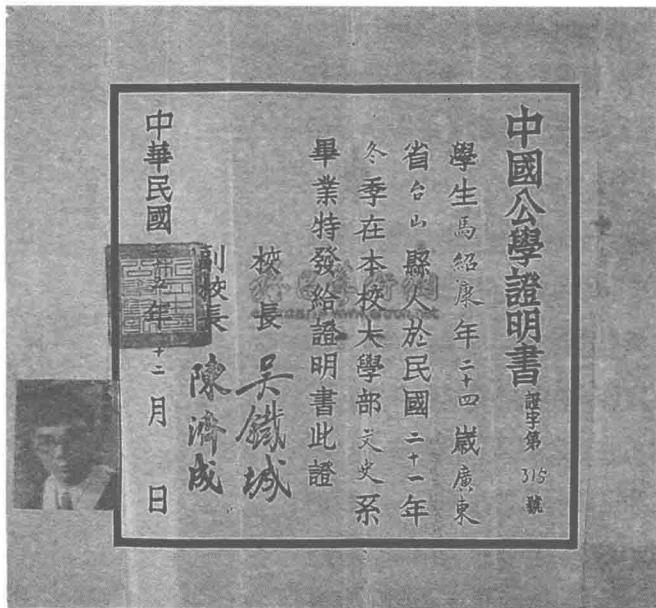


1920年，学校才迁回吴淞。1921年，梁启超被补选为常务校董，张东荪出任教务长，研究系开始接手中国公学。在梁启超、张东荪执掌校务的七年里，筚路蓝缕，大胆突破，中国公学顺利完成了由中学升格为大学的重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时局渐趋稳定，中国公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928年4月，胡适回到阔别了18年的母校，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在胡适的主持下，中国公学坚持民主与自由的办学风气，创造了学校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公学讲求兼容并蓄，英美派、德日派均有一席之地，讲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学说都无所顾忌，这在国内的大学里是罕见的。而且，学校的招生政策也相当宽松，唯以知识才能为准，不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这也是中国公学易出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1930年1月，胡适辞职，马君



中国公学校友会
欢迎胡适先生



中国公学颁发的
毕业证明

武继任校长。此时的中国公学，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三大学院的综合型大学，并在积极筹建理学院。

思想活跃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纷争，国民党大力推行党化教育，与中国公学自由民主的理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31年1月，学校发生风潮，此后短短的一年时间，校长接连更换了好几位，却终究未能延续中国公学曾经的辉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突袭闸北，继而进攻吴淞，中国公

学校舍损毁殆尽。1933年，师生撤退到法租界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借上海法学院教室继续上课。1936年，中国公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停办。抗战期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于重庆复校，江竹筠烈士生前曾在该校高中部就读，1940年学校再度奉命停办。1949年，熊克武、但懋辛等部分老校友有过重建中国公学之议。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面临接管、改造，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想要恢复一所停办多年的大学又谈何容易。薪已尽，火难传，中国公学已成为近代教育史一段难以复制的美丽传奇。

附

胡适回忆中国公学的有关内容

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涑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这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的大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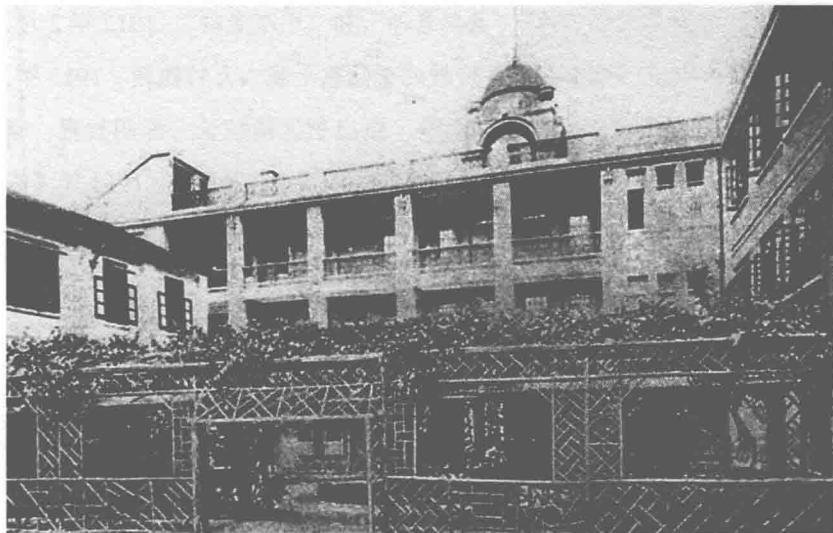
——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万竹小学

1922年初，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离开故乡浙江奉化，来到上海。那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工作，就委托在上海经商的陈果夫对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予以照料。当时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也对蒋氏兄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在“上海妈妈”陈洁如的安排下，蒋经国进入南市老城厢万竹高等小学读书。

万竹小学创立于宣统三年（1911年）7月，以校址原为顾氏万竹山房为名，寓育才似春日万竹破土之义。它是上海第一所市立小学，既不同于官办学校，也不同于私立学校，而是辛亥前后上海自治运动市政机构所设的学校。1911年10月正式开学，先设初等科两级，首批学生106人，分男女两部。当时男部校舍尚未竣工，先以女部校舍为男子部，另租狮子弄民房为女子部。1912年上半年，男子部有学生233人，女子部有学生138人。9月，男子部校舍落成，两部又各添招200人。至1913年秋，万竹共有学生850余人。

万竹小学的创办人、首任校长李廷翰先生公子李昌允曾经回忆说：“学校初创时要去动员家长送孩子来上学，那时万竹可不要开后门，有钱人家要进的是老牌子学校。”短短两年，从需动员入学到生源激增，证明学校办得很出色。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仍收藏着一份1914年《视察第三区学务总报告》，这是当时教育部视导部门根据1913年1月部颁《视学规程》，对第三区即皖苏浙区学务情况视察检查后作出的



市立万竹小学外观

报告。教育部视导部门在上海视察评估 358 所小学和 23 所女子学校后，认为“在上海的小学中，以万竹小学及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敬业中学之前身）、工业附属小学三所为优”，特别是万竹小学“编制严密，学事发达，形式、精神二者俱备，殊为难得”。女子学校则以“万竹小学女子部及务本女校、爱国女校为优”。

万竹有如此骄人业绩，校长李廷翰功不可没。李廷翰生于 1886 年，嘉定南翔人，龙门师范毕业，初任时化贫儿学校教师，并在南洋、浦东等中学兼课。1911 年 7 月，因龙门师范时的恩师、时任上海自治公所议会议长沈恩孚推荐，李廷翰出任万竹校长。他认为“养成健智之国民，培养国家之元气，小学实为基础”，决心从强国培本之大处着眼，办好万竹。他明白“教育为困苦之事业”，而“小学教育尤为教育事业之最困苦者”，不过他却动员了全家义务帮助管理学校。这其中 有他的妻子范娴贞、妹妹李廷蕙、母亲葛氏。在后来万竹校友撰写的回忆文章中，都忆及葛氏如何帮助管理校内秩序，如何不厌其烦地帮小学生洗脸洗手，甚至带操。为此，学生们都亲昵地称呼李廷翰、葛

氏和李廷蕙为“大李老师”“老李老师”和“小李老师”。1912年2月，毕业于务本女校，原本在他校任教的李廷蕙干脆入万竹执教。1913年，江苏省政府颁令褒奖万竹与李廷翰，指出李廷翰校长“深明教育，富有经验；处理校务，井井有条；延聘教员，均能称职”。1914年《视察第三区学务总报告》也指出，在上海中小学校的校长中“万竹小学校校长李廷翰之明达，浦东中学校长朱叔源之勤能，皆以教育为己任，不易得也”。

李廷翰还潜心探索贫儿教育，是贫儿教育的首倡者。他撰写的《平民教育谭》等系列文章，影响很大。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和执教的毛泽东，也是李著教育论文的忠实读者，他有关教师要参加校内体力劳动、多作自我批评、减少师生隔阂以及贫寒环境对孩子成长有利等观点，都受此影响。

蒋母王太夫人抱着
年幼的蒋经国



万竹是老城厢的骄傲，创办、培育万竹业绩的李廷翰和他的作风与思想，更是老城厢的瑰宝。万竹的后续者，大多能秉承李廷翰的理念，勇于探索，勇于实践，使万竹一直走在上海小学的前列。民国前期上海小学教育界有一句时谚“南有万竹，北有尚公”，万竹、尚公两所小学是当时上海小学中并驾齐驱的排头兵。只可惜，在日军侵犯上海时，尚公小学毁于战火，后也没有复办，只留下了万竹。

1952年，原万竹小学被宣布为“五年学制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改名为邑庙区中心小学。1956年更名为上海实验小学，旋公布为上海唯一一所国家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小学。1998年定为“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小学”，2001年又由中国教育学会定为“全国小学德育教育实验小学”。从“万竹小学”到“实验小学”，它



今上海市实验小学
校门

始终是一所上海乃至全国出类拔萃的小学校。百年间，学校培育的3万多名毕业生，诚如万竿破土之竹，许多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其中有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施增玮、计算机专家朱棋瑶、世界银行顾问李祥甫、香港商会副会长张永珍、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实业家汤蒂茵、画家陈秋草、电影表演艺术家陈述、评弹名演员蒋月泉等。

附

蒋经国就读万竹小学期间蒋介石的来信（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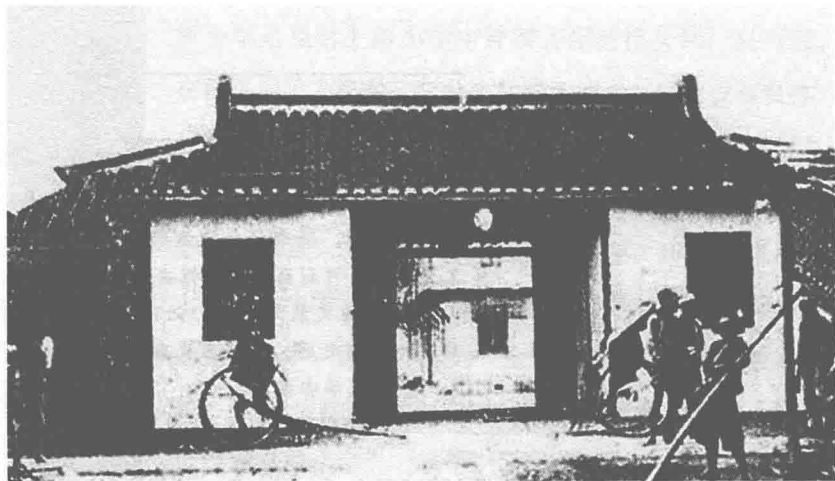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

——转引自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版

浦东中学

1923年，虚岁十四的蒋经国到了读中学的年龄，蒋介石委托戴季陶在上海找一所好一点的中等学校。当时的浦东中学校长朱叔源，是老同盟会会员，与戴季陶关系非常好。于是，戴季陶就把蒋氏兄弟托付给了朱校长。1923年下半学期开始，蒋经国、蒋纬国入读浦东中学。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与其他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反英、反日游行示威。事后，校方以“行为出轨”为由开除蒋经国的学籍。6月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前往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即赴苏联留学。蒋纬国则随养母姚冶诚由上海迁居苏州，转往东吴大学附中继续读书。



民国时期浦东中学校门

位于浦东六里镇白莲泾南侧的浦东中学，是上海历史较为悠久的中等学校，民国前期在全国教育界曾名噪一时。民国政要及社会名流蒋中正、孙科、蔡元培、胡适等先后为浦东中学题过词。

提起浦东中学，不得不说学校创始人杨斯盛。杨斯盛生于1851年，号锦春，川沙青墩人，他从泥水匠起家，凭着勤奋、正直、聪明、好学成为上海建筑业巨子。他虽富甲一方，却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因感自己“幼年失学，不获读”，深切同情“乡邻子弟失学之苦”，产生了将毕生积蓄捐献兴学的想法。他在《卷产兴学启》中这样说：“值次国步艰危，不可终日，听名人谈论，必以兴教育为救国第一……此区区家产与其传之子孙，使贤者损志，愚者益过，何如移作兴学，完成我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于是，他慨然捐



位于浦东中学内的
杨斯盛像

出家产的三分之二，共计31.3万两白银，兴建浦东中学。浦东中学从1905年开始筹建，1907年1月正式开学。建成后，杨斯盛顶住压力聘请刚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党人黄炎培担任浦东中学首任监督（即校长）。他还立下规定：杨氏子孙不得干预校务。1908年4月30日，杨斯盛因积劳成疾，年仅58岁就去世了。弥留之际，他没有一言嘱咐私事，却想到学校的黑板有反光，学生看黑板上的字有困难，一再叮嘱：“校中黑板必须改良！”1911年5月，清政府追授杨斯盛为盐运使衔，并列入国史馆立传。当时清政府对杨斯盛倾产兴学之评价甚至超过武训：“慨罄巨金，广建学校情事，于山东义丐武训略同，而捐款且逾十倍，成绩



位于浦东中学内的
杨斯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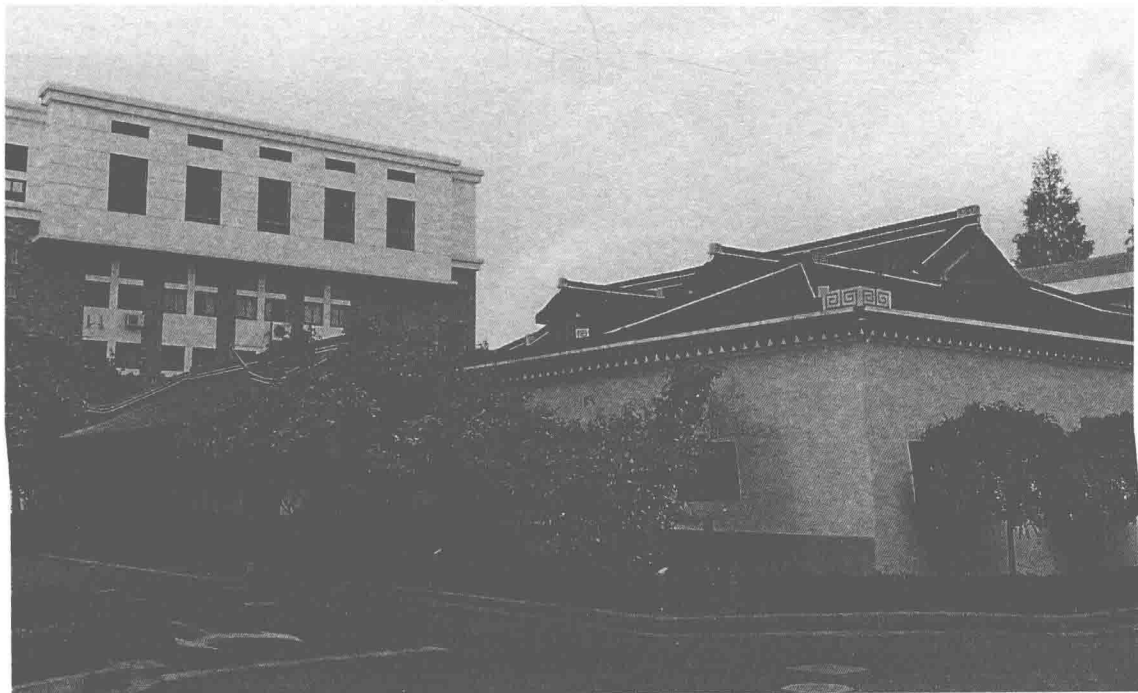
更远过之。”1914年，当地人决定募捐为杨斯盛建铜像，就连袁世凯、黎元洪也各捐银元1000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恽代英、郭沫若、沈雁冰等都曾莅临浦东中学演讲。1934年初，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人改组校董会，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吴开先、俞鸿钧、陆京士、汪曼云等11人为董事。原校董李孤帆被迫辞职后，心中不服，于1934年1月在南市多稼路浦东中学附属小学增办初中，改名为私立斯盛中学，另立校董会，自任董事长，正式脱离浦东中学，无形中削弱了浦东中学的实力。1937年浦东中学校舍被日机炸毁，原校址成了一片废墟，10月迁校杜美路（今东湖路）复学。1940年，校长汪曼云投敌，学校惨淡经营。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从重庆回到上海后，不愿再到浦东的废墟上重建校园。

新中国成立后，浦东中学才迎来新生。1951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批准浦东中学迁回六里桥复校。然而，由于经费原因，复校并不顺利。复校元老蔡承瑞回忆当时情形，仍感遗憾：“1951年，我负责来浦东中学荒芜的原址上请工人扎篱笆、圈场地，开办浦东中学。由于购置竹、瓦片的经费不足，仅仅圈了30多亩土地，还有一大半土地就放弃了，被别人占去了，真是遗憾。”由于当时将浦东中学定位为一所乡镇中学，办学经费和招生规模受到限制，学校发展一直比较乏力，在沪上名气也不大。

改革开放后，浦东中学才真正获得发展。近20年来，上海市教育局和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在经济和人事上给予支持，拨款建造教学大楼，使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学校还修缮扩建了一批校园内的历史遗迹，如杨斯盛故居、墓、铜像、碑，炎培亭，五卅惨案纪念碑，革命烈士纪

杨斯盛故居，现为
浦东中学校史馆



念碑，校史碑，勤朴校训碑等。经过历代浦东中学人的努力，学校先后获得“浦东新区文明单位”“新区首批德育基地”“新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区三星级行为规范示范学校”“新区健康校园”“上海市贯彻体育工作条例先进学校”“新区教育科研先进集体”“新区科技教育先进学校”等光荣称号。

百年间，从浦东中学走出了众多优秀学子，我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革命烈士殷夫、胡也频，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原中顾委常委李一氓，会计学泰斗潘序伦，“两弹一星”功臣王淦昌，我国载人飞船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龚惠兴，文学家马识途，电影艺术家谢晋，奥斯卡电影技术奖获得者晏仲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现在，浦东中学正在以创建浦东新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为发展契机，实施历史名校振兴工程。相信不久的将来，经历过百年风雨洗礼的浦东中学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充满生机的浦东大地上。

附

天堂和地狱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地狱在哪里，不过我自己觉得，没有偷懒骗人，并且做一些好事，心里就觉得很舒服，那就好像生活在天堂里。如果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即使吃得好，穿得好，还是好像生活在地狱里。

蒋经国在上海浦东中学的作文札录，
展出于奉化溪口文昌阁小洋房展览馆

复旦公学

在华山路复旦中学校园里，竖立着一块孙中山题写的“努力前程”石碑。那么这所学校与孙中山先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1903年，中国籍天主教神父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建了震旦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由民间创办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然而，震旦校政不久即被外籍传教士篡夺，由此引发了部分爱国学生的集体退学风潮。1905年，马相伯重新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并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



位于今复旦中学
内的李公祠

睿、熊希龄等 28 人为校董，在吴淞另行创立了复旦公学。“复旦”之名，出自《尚书》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诗句，既具有自强不息之意，又隐含恢复震旦之情。复旦公学成立之后，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与法国天主教会窃取的旧震旦无关。

辛亥革命爆发，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复旦公学一度停办。直到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复旦校友于右任，与邵力子、胡敦复等 42 人联名上书，将学校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汇报。民国肇建，财政十分拮据，但孙中山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一向极为关注，听闻复旦公学素有反抗外国压迫的精神，当即决定拨发补助金一万元。于右任、胡敦复等人又向教育部申请立案，请求拨借校舍，帮助复旦复校。经教育部批准，江苏都督庄蕴宽准借徐家汇李鸿

章祠堂为复旦校舍。1912 年 5 月 10 日，复旦公学正式复校开学，暂借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为临时校址，9 月迁入李公祠内。1913 年，复旦成立了由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曹成父等人组成的董事会，王宠惠出任董事长，聘请李登辉为校长。当时，孙中山在复旦董事会中排名第一，可谓“首席校董”。从此，复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917 年，复旦公学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并保留了原有的预科和中学部。升格为大学后，报考复旦的学子日益增多，原李公祠校舍已不敷使用。1918 年，校长李登辉亲赴南洋募款，在江湾购买土地，建造新校舍。1922 年，大学部迁

孙中山手书“努力前程”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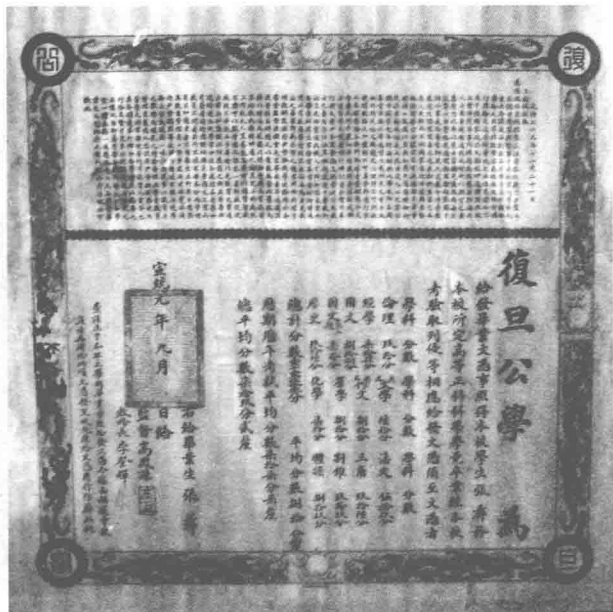
往江湾，即今邯郸路校区，中学部仍留在徐家汇李公祠。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复旦逐渐发展成为一所以培养商科、经济、新闻、教育、土木等应用型人才闻名全国的有特色的私立大学，并形成了从中学到研究院的完整的办学体系。孙中山先生之兄孙眉的长孙孙满，即毕业于复旦大学。

1923年，从广州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应复旦师生之请，欣然提笔写下“努力前程”四字，发表在当年的《复旦年刊》上。后来，复旦大学将这四个字镌刻于原李公祠慈禧御碑之上，竖立在中学部徐家汇校园内。

1937年5月，因孙中山先生曾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为了纪念这位“首席校董”，复旦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每年的5月5日为复旦校友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辗转江西，再到重庆北碚，艰难复校。1941年11月，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学校由私立转为国立大学。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原址。至1949年，学校设立文、理、法、商、农五院，共20多个系（科），已初具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又使复旦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当时，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但在南方却没有一所可以和北大相匹配的综合性大学。在上海，尽管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一批名校，却都是偏重于理工科的高校。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私立大学，已无法适应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办教育体制。至于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作为在外国注册的教会下属学校，更是处于被改



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毕业证书



复旦大学校徽



今复旦大学校门

造的行列。只有复旦大学，不仅拥有坚实的文科、商科基础，又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可以作为南方高校的代表，改造为全国最重要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1952年，复旦大学列名第一批进行院系调整的高等院校。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关系科，相继并入复旦大学。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总共19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的新复旦，汇聚了江、浙、皖、沪地区最著名的一批专家学者，成为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从此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

至于华山路上的复旦中学，已经与复旦大学脱离了隶属关系。早在上海沦陷期间，复旦大学附中坚决不向敌伪注册，一度将校名改为“笃志中学”，以表明坚贞不屈的志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

规定，凡不属于师范类院校不能设附属中学，于是复旦大学附中改为私立复旦中学。上海解放后，培真中学、联群中学先后并入复旦中学。1956年，私立复旦中学改制为公立学校。如今，复旦中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重点学校。

附

呈请孙中山先生出任复旦校董函

中山先生执事：

緬維复旦，创自己巳。几经艰辛，始克成立。贤士大夫实宏其赐。乃成材未百，世乱繁兴。旧有胶庠，化为壁垒，度支以穷。三百青年，一时星散。继复卜室惠山，略图完聚。终以轔蹶，未能久之，言之痛矣。迹者国是大定，作育是谋。复旦为东南巨校，坐视沦替，情所不安。良等用是奋兴，力谋振董。今已稟准教育部立案，并乞苏督指拨上海李公祠改作黉舍。兴复不易，亟待扶持。伏以先生学林泰斗，薄海倾心。敢为吾徒，乞赐栽植。倘荷不鄙，许为复旦校董，时时督教，以所不及，不胜大愿。敬谨陈白，伫候德音。春寒为道，自卫不宣。

马良、胡敦复、于右任、邵闻泰、钱智修、叶永婆、郑允拜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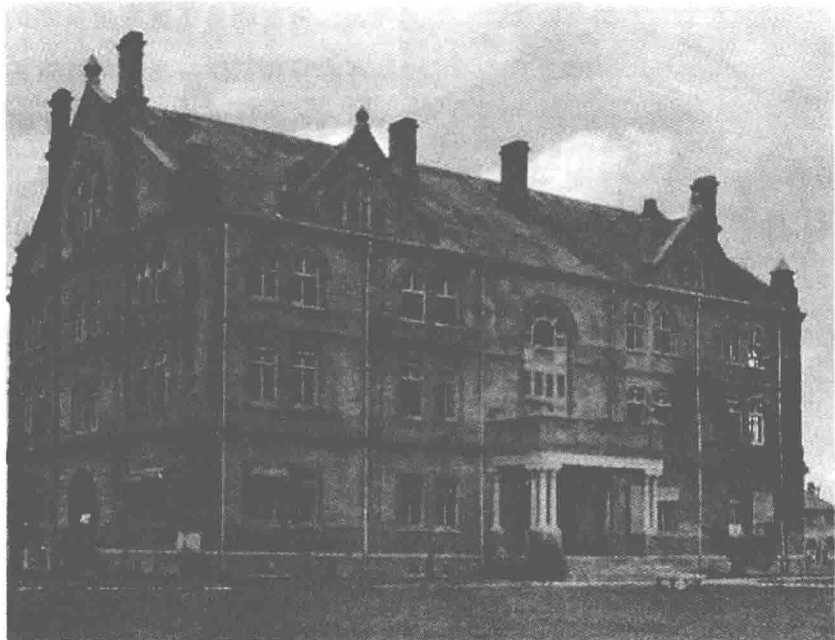
——转引自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

沪江大学

孙中山之兄孙眉，生有独子孙昌。孙昌次子孙乾，爱好体育，热衷于各种球类运动。1924年，以广东省排球队队员的身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并获得冠军。1927年，又作为国家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在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获得亚军。中学毕业后，孙乾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一年后赴日本士官学校兵工科学习。孙中山的嫡亲外孙，孙婉与第一任丈夫王伯秋的儿子王弘之，曾就读于沪江大学政治系。孔家大小姐孔令仪，也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

沪江大学是近代中国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1900年，美国南部浸信会华中差会和北部浸礼会华东差会部分传教士为躲避义和团之乱，来到上海避难。其间，两家基督教教会组织达成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院校。1906年，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由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出任校长。1909年，又开设了浸会大学堂，校长是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1911年，两校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黄浦江畔，校长为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1914年，学校中文名字正式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信、义、勤、爱”为校训。1917年，学校在美国注册，弗吉尼亚州政府颁发特许证，批准该校可以授予学位。

20世纪20年代末，沪江大学改组校董会，增设8名华人校董。



沪江大学第一幢大楼
——思晏堂

1928年1月，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刘湛恩为校长，这是沪江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就任校长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他对学校内部机构作了调整，相继成立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从院长到系主任皆由华人充任。主持建造了图书馆、大礼堂、教职员住宅楼、女生健身房、男生新膳堂等，并添置了大量实验设备，学校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刘湛恩校长又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创办了沪江商学院，聘请著名金融专家朱博泉为院长，又请章乃器、潘序伦等社会名流执教。商学院还设有专科与普通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授



沪江大学首任华人
校长刘湛恩

沪江大学校徽



课，为在职员工或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沪江商学院是当时上海最富盛名的学院，也是办得较好的一所夜大学。刘湛恩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贫困山区，早年有半工半读的切身体会。除了在商学院开设夜校外，他对沪江大学本部的贫困生也十分

爱护，特意设置了奖学金、助学金，并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教会学校，1913年在杨树浦创设沪东公社，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兼办社会福利事业。在刘湛恩任上，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创办了面向工人阶层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设平民医院和诊所，免费施医送药。

尽管刘湛恩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主张沪江大学应该“更为中国化”，1929年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备案，英文校名也相应改为 University of Shanghai。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湛恩被推举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为宣传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沪江大学师生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此遭到日伪方面的忌恨。1938年4月7日上午8时半，刘湛恩携子去学校上班，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突遭特务暗枪袭击，不幸以身殉国。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悲痛。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明令国葬刘湛恩，上海社会各界数千群众为这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沪江大学校舍遭到严重破坏，只得迁往位于公共租界的商学院继续上课。1938年，沪江大学联合圣约翰、东吴等学校成立“上海联合教会大学”，总部设在南京路大陆商场四楼。1943年春，沪江大学校友和东吴大学校友在重庆合办“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由凌宪扬任院长。凌宪扬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1941年，出任中央信托局下属的中央印制厂经理，负责为各大银行印制钞票，一度成为孔氏家族的红人。1945年10月1日，沪江大学在上海正式复校，凌宪扬继任校长，于次年2月将学校迁回杨树浦军工路原址。凌宪扬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募款，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困难，并大力扩充优势学科沪江商学院。1949年，凌宪扬拒绝担任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不愿意追随

今上海理工大学校门



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但迫于各种压力，上海解放后不久即辞去校长职位，由余日宣、蔡尚思、张春江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主持校务工作。1951年4月，凌宪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1957年初被释放，于1960年病逝。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撤销建制，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1996年上海机械学院与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2006年，上海理工大学首次将沪江大学作为学校前身，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上海市市长韩正同志出席了校庆活动。

同济大学

孙科与严蕙娟的女儿孙穗芳，早年就读于世界小学、启秀女中和上海市第八女中。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因“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高中毕业后不能报考大学。无奈之下，孙穗芳提笔给宋庆龄同志写了一封求助信，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没过多久，宋庆龄回信了，她开导孙穗芳说，人生有很多出路，读大学并不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她也希望孙女明年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孙穗芳将信转寄给了教育部门，随后家里来了一位干部，告诉她明年可以参加高考了。1957年，



民国时期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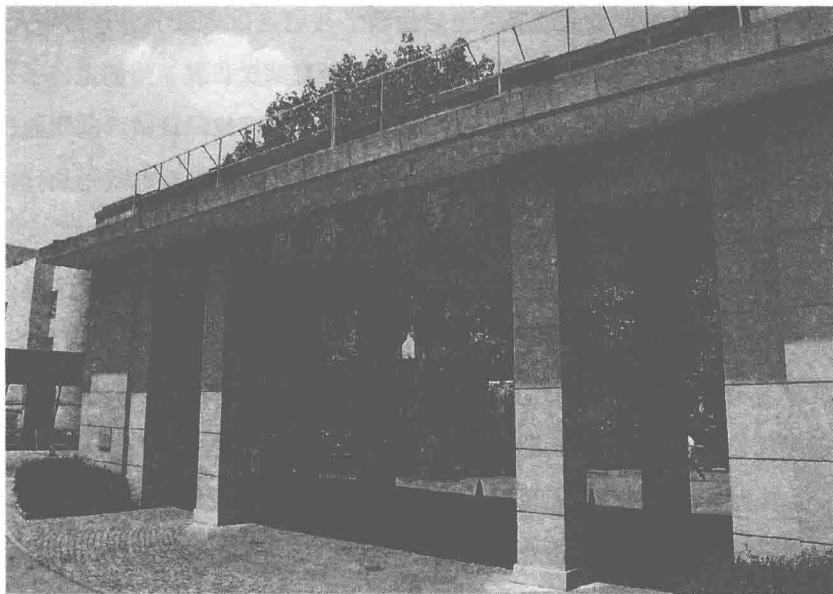
孙穗芳经过努力，终于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直到 1959 年寒假，孙穗芳有机会前往香港探亲，才离开同济大学，离开了上海。

报考同济大学建筑系，是孙穗芳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新成立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需要建设人才，尤其是建筑行业，而同济大学是中国建筑设计与施工专业的最高学府。当然，早期的同济大学却以医学见长，而且与德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1900 年前后，德国海军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在上海创办同济医院。“同济”原是德语 Deutsch（德意志）的沪语谐音，这两个字则出自于《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宝隆医生希望中德两国人民能够同舟共济，用现代医学造福人类。作为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同济早期的医师大

20 世纪 50 年代
同济大学校门





今日同济大学校门



多是德医公会成员，他们白天从事医务工作，只有在傍晚才能到医院兼职施诊。鉴于医疗力量的严重不足，宝隆医生决定在医院内开设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专职医生。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他不仅号召旅沪德商捐款成立基金会，同时要求中国官方给予资助。不久，学校董事会成立，宝隆医生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兼学堂首任总理。1907年10月1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初定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后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址即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济医院对面。创建初期，学校只设德文、医学两科，医学又分预科和正科，仿照德国医科大学前期、后期的教学制度。1912年增设工科，并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同一年，医正科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按照德国医科大学规则参加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成为同济历史上第一届毕业生。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相持阶段，上海法租界当局认为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强行解散学校。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教育部



同济大学校徽

和江苏省政府派人与法租界公董局协商，并成立以沈恩孚为首的华人董事会，接办同济医工学堂。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的主持下，拨出专款在吴淞中国公学旧址筹建校舍，并专门辟筑同济路以利交通。新校舍落成后，同济医预科、工科、德文科、机师科陆续迁入，只有医正科仍留在白克路同济医院内。1924年5月20日，经教育部批准，改名同济医工大学，自此5月20日被定为学校的校庆日。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学校，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两科分别改为医学院和工学院，1937年增设文学院、理学院，同济大学从而成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转为国立大学后，医科仍是同济发展的重点学科，除了原先就有的解剖研究馆外，又先后设立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学、病理学、细菌学等研究馆。1930年，同济医学院有教师18人，在校学生204人，教学实验设备齐全，规模位居全国各医科大学之首。1934年，同济医学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合办吴淞卫生事务所及公共卫生研习所，并与江苏省立医院签订协议，在常州、金坛、无锡、常熟等县设立分诊所。1937年，受上海市政府委托，在江湾新市中心协助创建上海市立医院，由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兼任院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开始内迁。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先后辗转浙、赣、桂、滇等地，甚至一度绕道越南河内再折回昆明。1940年学校来到四川宜宾，1942年落脚于古镇李庄。西迁时期，同济师生秉持“科学救国”的理念，坚持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知名学府。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因吴淞校园早已毁于战火，学校只好分布在市内各教学点。此时，同济工学院已发展成为全校最大的学院，地址在其美路原日本中学（即今四平路同济大学校址），同济医学院在市中心常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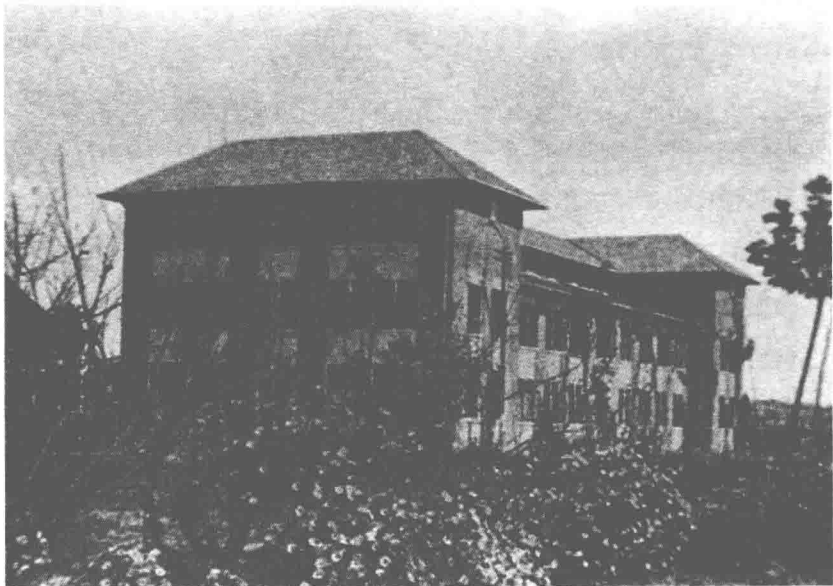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相继支援其他高校。其中，最为有名的医学院和附属同济医院迁往湖北，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及附属同济医院）。1952年，随着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11所高校土建专业的并入，同济大学成为以土木建筑类专业见长的单科性大学。

1996年7月，上海建材工业学院和上海城建学院并入同济大学。2000年，上海铁道大学与同济大学合并，开始重建同济大学医学院，原上海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同时更名为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暨南大学

1931年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6次常务会议决议，国立暨南大学成立新的校董会，由宋子文、林森、孔祥熙、马超俊、陈耀垣、余井塘、吴铁城、萧佛成等11人担任校董，陈立夫、孙科、郑洪年担任常务校董。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南京的暨南学堂。1906年，在南洋考察华侨学务工作的钱洵和董鸿祯向两江总督端方汇报，爪哇岛学生可自筹川资归国读书，恳请政府提供食宿。端方闻讯即奏明朝廷，倡议创办学



暨南大学科学馆

校，招收华侨子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华侨集中的南洋群岛。学校初设于南京鼓楼薛家巷，取《尚书·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意，命名为暨南学堂。1907年春正式开学，翌年改为中学，学生大多系南洋归国华侨子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暨南学堂停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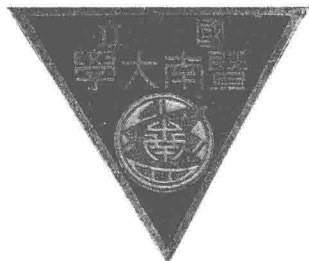
1917年，教育部派黄炎培复办暨南学校。1918年春，学校组织成立，设师范、商业两科，附设补习科及附属小学，有侨生70人，内地学生40人。1919年，又成立中学科，三年级以上分设文、理两科。1921年2月，暨南学校商科由南京迁至上海徐家汇，并开始筹备商科大学部，下设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系科，培养高级经济金融管理人才。继承原暨南学堂招收归国华侨子弟的传统，新设立的商科大学部专门招收华侨和有志去南洋经商的学生，这是暨南转变为华侨高等学府的开端。当时的真如地区，位于上海、宝山、嘉定三县交界处，水陆交通便利，畛域开阔，地价则比市区便宜得多。因此，校董会决定在真如车站南盈圩，紧沿沪宁铁路地段，勘定200余亩土地作为学校新校址。1923年夏，暨南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师范科、中学科、商科相继迁入，并于秋季开学。暨南学校迁入真如地区之后，不仅兴建了暨南新村，还修筑了暨南路（今新村路）、交通路、桃浦西路等马路，真如境北杨家桥一带逐渐形成较大的集市。

1927年，暨南学校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原暨南学堂首任堂长，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华侨事务委员会理事郑洪年再次出任暨南校长。暨南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发扬本国文化，发展海外侨胞事业”为办学宗旨，下设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和独立的法学系，以及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1930年增设法学院，位于南京的学校女子部也迁至上海真如。学校注重师资建设，延聘知名学者授课，常常邀请社会名流来校讲学，如鲁迅先生曾两次到暨南为师生演讲。1927年至1932年，华侨生源接



暨南大学

国立暨南大学创校二十五周年暨南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章



国立暨南大学徽章

近学生总数的一半，1936年后增招内地生，华侨学生仍占三分之一。因此，1931年暨南大学设立董事会，11位董事大多具有华侨或留学背景。其中，宋子文、林森、孔祥熙、吴铁城、陈立夫、孙科等均为党国政要，可见中国政府对该校之重视。

在上海真如的十五年，是暨南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为了培养学以致用的高级专业人才，暨南大学的课程设置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参观考察，并设立了相应的奖学金和工读制度。学校学术氛围浓厚，学术团体众多，如经济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法律学会、历史社会学会、会计学会等，在学界颇有影响。因华侨学生居多，平时寄宿校内，课余文体活动极为丰富。尤其是足球运动最具特色，在抗战前连续10届的江南八所大学足球锦标赛中，暨南队得9届冠军、1届亚军。1927年和1930年，以暨南球员为骨干的中华队，两次力挫劲旅英格兰队，获得

暨南新村一号，原
暨南大学教工宿舍





位于真如万里小区绿地中的暨南大学旧址纪念碑

上海杯国际足球联赛冠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暨南的足球传统也带动了真如地区的群众体育，不少人纷纷组队练习足球，镇上的市第六简易体育场成为当时上海足球运动的基地之一。如今，足球仍是真如群众和中小學生最为喜爱的体育项目。

只可惜，暨南大学和真如地区的发展被日军的炮火所摧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真如地属战区，暨南大学只能暂借苏州东吴大学上课，后又迁往广州中山大学，直到战事平息后返回。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暨南大学迁至公共租界继续上课，真如校舍除科学馆幸存之外，其他都被炮火夷为一片瓦砾。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内迁福建建阳。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回到上海，分借体育会路、宝山路等处上课。因受内战影响，此时华侨学生比例很低，1947年仅占全部学生的20%。

1949年，暨南大学只有20余名教职员和40余名学生追随时任校

长李寿雍前往台湾，其余师生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文、法、商、理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及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学校停办。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重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兼任校长。1963年，暨南大学董事会成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担任董事长，聘请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和教育界、侨务界及海外、港澳知名人士为董事。“文革”中期，暨南大学撤销建制，1978年10月再度复办。如今的暨南大学，是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三方共建的重点高校，仍保持着华侨最高学府的特色。

大夏大学

孙中山之子孙科，曾长期担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一度还兼任暨南大学、上海美专、光夏商专等院校校董，1942年又被推举为私立大夏大学董事长。1935年6月，孙科来到大夏大学，就私立大学的使命和毕业生出路问题发表演讲。11月，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邀请其加入学校董事会。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为筹划迁校事宜劳累过度，导致胃出血病逝于重庆。12月30日，孙科召集大夏校董开会，决议推选欧元怀继任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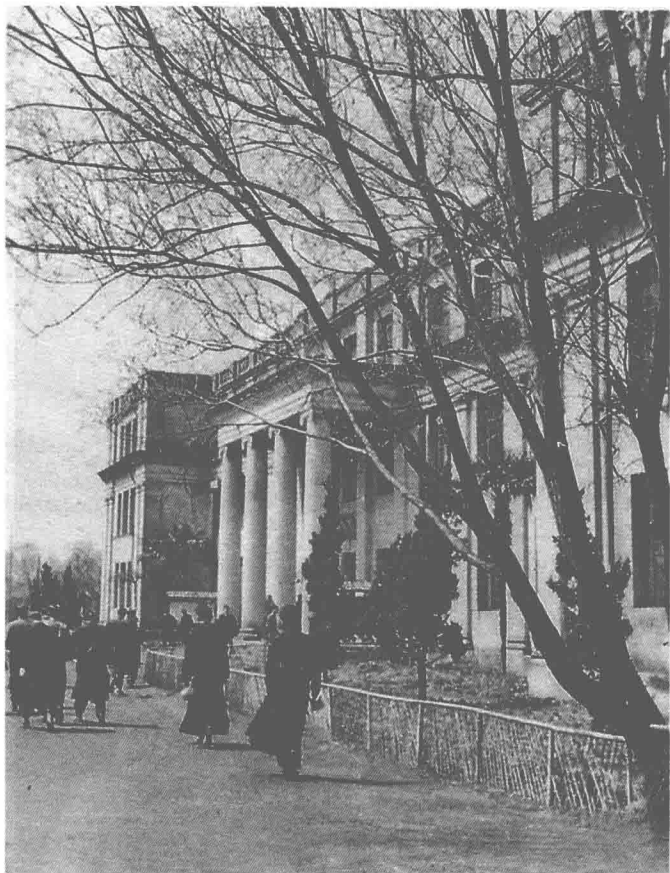
大夏大学创办人王伯群

1923年冬，厦门大学学生因对个别教授教学方法不满，提出改革校务的要求。学校当局在未查明事件缘由的情况下，宣布开除“肇事学生”陈国柱，又解聘了支持学生争取正当权利的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教授，从而引发部分学生罢课。1924年6月1日，学校当局派人殴打集会抗议的学生，教授余泽兰、李拔峨、吕子芳、林天兰、吴毓腾、周学章等联名辞职，329名学生签名退学，集体离开厦门大学。事后，学生推举罗士清、孙亢曾、施乃铸等14人组成代表团来到上海，请求在沪的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原厦大九教授另筹新校，继续未完成的学业。经欧元怀等多方奔



走，原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长、老同盟会员王伯群慷慨解囊，捐出2000银元，作为创校基金。7月7日，新校临时筹备处在上海贝蒂麇路（今成都南路）美仁里24号设立。不久，又租定小沙渡路（今西康路）201号为校本部，宜昌路115号打油厂为临时校舍，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启和里为员工宿舍。这所全新的私立学校，初名大厦大学，后定名大夏大学，以示该校与“厦大”的渊源，并有“光大华夏”之意。9月20日，学校在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家花园举行开学典礼。9月22日，正式上课，共有学生190人，后陆续增至229人，大部分为原厦门大学离校学生。

大夏大学群贤堂



10月22日，大夏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聘请王伯群、吴稚晖、汪兆铭、叶楚伦、邵仲辉、张嘉森、马君武、欧元怀、傅式说、王毓祥为校董，并推举王伯群为董事长，马君武为首任校长。到了1926年，校方又聘请虞洽卿、王一亭、徐新六、徐寄庚、胡孟嘉、张公权、钱新之、王志莘、杜月笙、黄潮初、赵晋卿、张竹平等人为校董，均为沪上名流。此时，因马君武与吴稚晖、叶楚伦等校董产生矛盾，辞职离校，由董事长王伯群兼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后，聘请孙科、居正、吴铁城、杨永泰、许世英、孔祥熙、何应钦、王正廷、黄绍竑、梁寒操为大夏校董，大多为政界

要员。一所私立大学，有这么多社会知名人士担任校董，无疑对学校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建校初期，大夏大学倡导“师生合作”，提出“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后又以“自强不息”为校训，激励师生奋发努力。虽然是一所新设立的私立大学，但马君武、欧元怀等都是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家。为了罗致人才，王伯群、马君武、欧元怀不惜亲自登门，延请一批知名学者来大夏执掌教席，邵力子、郭沫若、田汉、朱经农、周昌寿、夏元璪等都曾在在大夏大学任过课。因此，学校发展得很快，1928年在校学生达600多人，校舍已不敷使用。由校董杜月笙和张竹平担保，学校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以及新华、金城、通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借贷33万元，在中山北路以西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以北购地200余亩准备建造新校舍。与此同时，面粉棉纱大王荣宗敬捐赠临近丽娃栗姐村（上海市郊著名度假园林，旧址后改建为长风公园）的一块地基，并开挖了一条小河（今华东师范大学内的丽娃河），使校园面积扩大到280亩。1930年9月，一期工程竣工，学校全部迁入，小沙渡路等处房屋拨给附属大夏中学使用。在当时，大夏以一流的教授、先进的教学设备和美丽的校园景色，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内迁，与复旦大学在庐山、贵阳两地组建联合大学，庐山联大由钱新之任校长，吴南轩任副校长，吴泽霖任教务长。贵阳联大由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章益任教务长。后两校负责人在贵州桐梓集议，决定各自恢复校名，复旦在重庆，大夏在贵阳。1944年，局势危急，大夏从贵阳迁往黔北赤水。为躲避敌机轰炸，取道茅台，逆流而上，历时三个月，师生员工和全部图书仪器安全到达目的地。王伯群校长因迁校之事呕心沥血，过度劳累而引发旧疾，不幸辞世。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回到上海原校区。1946



大夏大学校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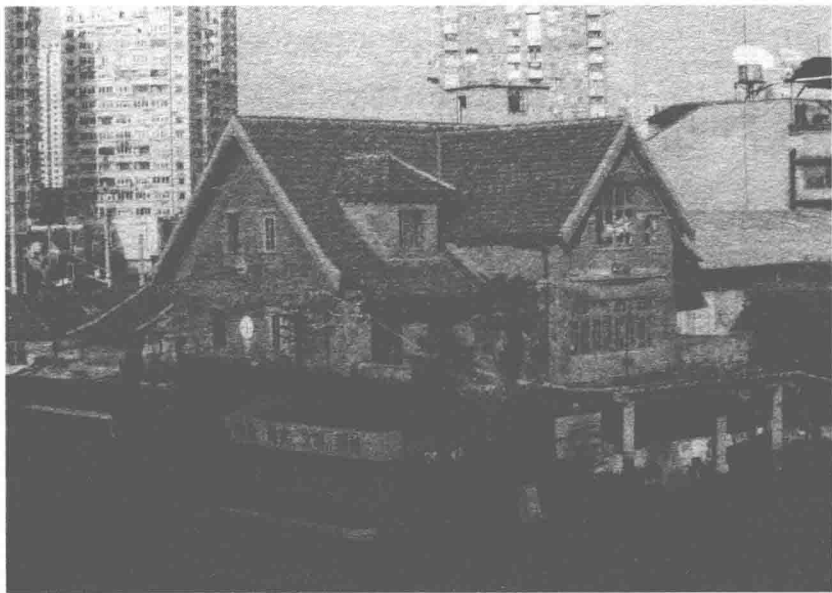
今日华东师范大学
内的思群堂

年10月，礼堂兼饭厅的“思群堂”落成。12月20日，为王伯群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大夏董事长孙科亲自莅临主持“思群堂纪念碑”揭幕仪式，由王伯群夫人保志宁为纪念碑揭幕，全校师生向已故老校长致以深切的缅怀与敬意。

1951年10月，教育部决定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师范类高等院校——华东师范大学。原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大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小部分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至此，大夏大学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奉化中学

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里，宁波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上至富商政要，下至摊贩工友，祖籍宁波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一些宁波籍商人，经过努力打拼，在上海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从而形成了商界赫赫有名的宁波帮。在宁波籍著名人士的倡导和支持下，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在上海创办了一批为家乡子弟开设的中小学校。坐落在中山公园西侧的上海市长宁中学，其前身就是蒋介石家乡亲族创办的私立奉化中学。



原奉化中学校舍



蒋纬国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蒋介石本人非常注重亲情，对家乡人士往往委以重用。例如，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毛庆祥、侍卫长俞济时、空军副司令毛邦初、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粮食部部长俞飞鹏等，都是浙江奉化人。至于蒋介石的贴身警卫，大多为溪口蒋姓同族。尽管宁波人开设的中小学很多，但上海还没有一所专门面向奉化子弟的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知识人

才，上海再次兴起了一股创办新学的热潮。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早年曾经在上海读过中小学，尤其关注青少年教育事业，也深知培养亲族势力的重要性。经过长期酝酿，1946年5月9日，由蒋纬国领衔具名，邀请当时沪上各界社会名流，在国际饭店召开建校筹备会议。会上宣布，以“提倡教育、作育英才”为宗旨，筹建一所“学用合一”的中学，并提议以蒋介石的故乡奉化为校名。5月16日，私立奉化中学筹备处向上海市教育局申请立案，上报筹建学校的发起人有蒋经国、蒋纬国等41人。时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毛庆祥出任学校董事长，聘请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侄孙毛圣栋为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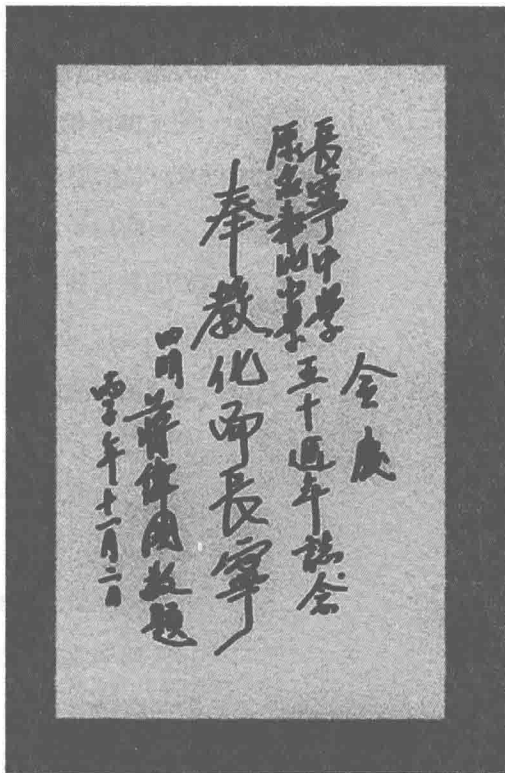
为筹建这所奉化子弟学校，蒋纬国、毛庆祥、毛圣栋三人联名发函，向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募捐。蒋氏亲族还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海外侨胞劝募，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不仅作为发起人自己认捐，还用各种途径号召各地侨胞为奉化中学捐资。经过努力，奉化中学筹建处很快募集到建校基金36900万元法币。抗战胜利后，法币虽然在国统区已不值钱，但在刚刚光复的沦陷区却是硬通货。据说，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

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甚至可以在高档酒楼摆上两桌宴席。因此，36 900万元法币的建校基金可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于是，学校租下长宁路35号（后改为长宁路593号）安康绸缎庄总经理周联康的一幢三层洋房，以及周围一块五亩的土地，作为校舍和操场。

1947年2月，奉化中学正式开学。同年暑假，学校利用募捐来的建校基金，先后在操场的东西两侧各建造一排南北走向的木板平房，包括教室12间和风雨操场、礼堂等校舍，还陆续添置了一些理化仪器和图书设备。蒋纬国等校董主张“有教无类”，招生应尽可能地放宽限制，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教育。加上奉化中学是蒋氏亲族创办的学校，各种设施相对较为先进，教育经费有所保障，每年又有20%的免费名额吸引一批贫苦学生，因此生源完全不成问题。到了1949年春，奉化中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奉化中学于1952年12月26日改为公立学校，易名为长宁中学，是上海市首批私立转公立的三所中学之一，也是解放初期长宁区仅有的两所完全中学之一。1956年，原圣谊中学并入长宁中学，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1979年，原奉化中学校长毛圣栋应邀回到长宁中学做客。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学校旧貌换新颜，毛圣栋遥想起当年创办时之艰辛，开学时之简陋，不禁感慨万千。事后，他把学校的情况写信告诉在台湾的蒋纬国。1996年10月，长宁中学举行50周年校庆大典，蒋纬国欣然命笔，写下了“奉教化而长宁”的题词，寄赠学校师生。题词中巧妙地嵌入了“奉

蒋纬国为长宁中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题词



位于长宁路 1302 弄 9 号的长宁中学新校舍



化”“长宁”新旧两个校名，字里行间弥漫着对这所学校深深的眷恋和关注之情。

2001 年，长宁中学又顺利地完成了与新宁中学的合并。2002 年 8 月，长宁中学迁入长宁路 1302 弄 9 号新校址。新学校占地 18.5 亩，总运动面积 4 200 平方米，有 200 米环形塑胶跑道环绕的标准化操场。校舍呈 H 形布局，建筑面积 11 088 平方米，有标准化教室 35 间，专用教室 19 间，办公室 26 间。迁入新址后的长宁中学，已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场地宽敞、环境优美的上海市一类达标学校。长宁中学深感“长宁”二字的厚重，遵循“爱国从爱校做起，成才以成人先”的校训，在“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创特色，以特色促腾飞”，大力发展特色教育。其中，美术特色教育在长宁中学有着近三十年历史，经过几代老师的辛勤耕耘，学校已积淀了浓厚的艺术气息。据不完全统计，学校有近 10% 的毕业生走上了与美术相关的事业之路，先后有 50 多人次的作品获区级以上奖项，多名学生参加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书画交流活动，在社会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

沪西礼拜堂

据北新泾当地老人口碑相传，1918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与教友黄佩文，应北新泾马家宅沈氏（当地人称马老太）之邀，曾在沪西北新泾一带布道。1921年，倪、黄二人同瑞典女传教士克利生和安德生又在北新泾镇东大街8号建立了一间布道所，不久即迁往西大街，拥有信徒七十余人。这是北新泾地区基督新教传入之始。

倪桂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传教事业一向有着极高的热情。但她并不担任圣职，也难以承担传教布道的重任，因此1918年的北新泾之行当属一次远游兼宣传活动。1919年瑞典女传教士克利生和安德生在北新泾设立布道点，也许就是倪桂珍她们一年前所打下的基础。1921年，两位女传教士和一些中国籍牧师设立了正式的布道所。因北新泾布道所房屋狭小简陋，1925年她们在周家桥三角场租赁了3间楼房作为新的布道所，命名为沪西神召会耶稣堂。此次搬迁，倪桂珍又捐献了不少钱物。

早期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团体形形色色，派别林立，成分复杂。有的团体本身在西方就是一个教派。有的虽属同一教派，却由不同国家或地区所派遣，由此形成不同派别。还有的本是跨宗派的差会，久而久之在国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教派”。来自瑞典的克利生和安德生是神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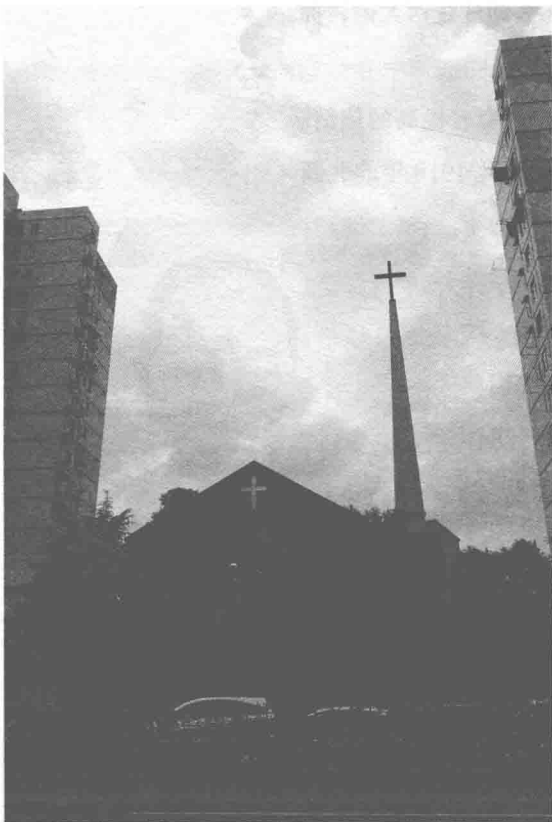
宋母倪桂珍



的女传教士。神召会出现于1901年美国五旬节复兴运动之后，在上海信众数量不多，属于较小的新教派别组织。而倪桂珍是监理会的信众，宋家一直是虹口景林堂的教友，在景林堂内甚至还有倪桂珍做礼拜的专座。但是，作为从小在中国长大在国内受洗的基督徒，倪桂珍的宗教派别观念并不强烈。她的父亲倪蕴山是英国伦敦会牧师，她年幼求学的裨文女塾属于美国公理会，丈夫宋耀如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在倪桂珍看来，不管哪宗哪派，只要能传播“上帝的福音”，都是她全力支持和热心赞助的事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周家桥沪西神召会耶稣堂房屋被毁，两位瑞典女传教士被遣送回国，教会事务由中国籍牧师汤荣福接手负责。为

沪西礼拜堂



重建教堂，汤荣福发动信徒捐款，购得长宁路1465号一块三亩多的土地。1940年，耶稣堂沪西神召会新堂落成，为单层砖木结构平房建筑。1947年，神召会联合了全备福音会派、使徒信心会派以及其他几个小教会正式成立了上海灵工团，沪西神召会耶稣堂也相应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上海灵工团沪西神召会耶稣堂。

新中国成立后，沪西神召会耶稣堂继续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1951年已有信徒2377人。1958年8月，上海市召开基督教工作人员及信徒代表会议，决定打破宗派界限，实行联合礼拜。在彼此尊重的原则下，照顾到各个教派信仰的特点和习惯，全市208座教堂合并为22个礼拜堂。于是，上海灵工团沪西神召会耶稣堂与锡安堂、乌鲁木齐北路聚会所成为长宁区三所联合礼拜场所，并改名为沪西礼拜堂。1960



新泾堂

年，锡安堂和乌鲁木齐北路聚会所均被划入静安区，沪西礼拜堂成为长宁区唯一的基督教联合礼拜地点。

“文革”期间，上海所有的教堂全都停止了宗教活动，教职人员一律参加生产劳动，沪西礼拜堂也被旭光造漆厂（即上海涂料研究所的前身）占用。直到1982年12月19日，沪西礼拜堂才正式举行复堂典礼，由原虹口灵工团守真堂负责人姜蒙光作为复堂后的首任牧师主持日常事务。由于教堂长期被企业占用，部分设施遭到破坏，加上建筑年久失修，已无法满足沪西地区广大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需求。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沪西礼拜堂开始重新建堂。1989年12月，沪西礼拜堂新堂在长宁路1465号原址落成竣工，这是“文革”之后上海基督徒在市区新造的第一所礼拜堂。新堂占地两亩，建筑面积645平方米，主楼为两层混凝土框架结构，外墙采用咖啡色面砖装饰，大厅内可容千余人同时做礼拜。主楼之后，竖有41米高的十字架钟楼，庄重肃穆，气势恢宏。2002年，沪西礼拜堂又进行了全面大修，修缮后建筑面积扩大到

1 762.79 平方米，实用面积达 1 539.38 平方米。如今，沪西礼拜堂每年举办两次慕道班和两次受浸受洗礼，目前注册信众有 6 000 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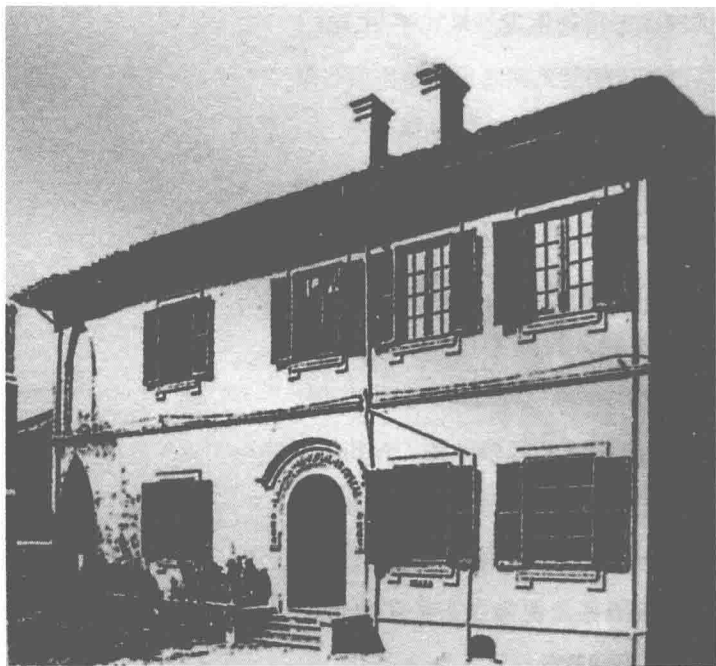
沪西礼拜堂最早是由北新泾布道所发展而来，因此北新泾地区的信众基础一直比较好。1991 年，沪西礼拜堂在北新泾建立聚会点，有信徒近 400 人。1993 年以后，北新泾地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逐年增加。1998 年 5 月，购得苏州河畔北翟路 74 号原新泾电磁线拉丝厂一栋四层楼厂房建筑，作为沪西礼拜堂的分堂，并命名为新泾堂。经过改建之后，新泾堂面积达 3 000 多平方米，每层楼面面积均有 600 多平方米，甚至超过了沪西礼拜堂的规模。2000 年 3 月 24 日，新泾堂举行了献堂感恩礼拜暨新堂落成典礼。鉴于当地及附近地区韩国侨民较多，经上海市民族宗教委员会报市政府同意，于同年 6 月开设韩语礼拜专场。从此，2 000 多名在沪韩侨基督徒开始在新泾堂参加礼拜。

从沪西堂实行联合礼拜，到新泾堂向韩侨开放，都是在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一切完全符合倪桂珍当年不分宗派捐款造堂的初衷和美好愿望。

天安堂与仁济医院

宋庆龄的外祖父倪蕴山早年曾在英租界盆汤弄摆摊修鞋，经亲友介绍到伦敦会传教士家中当烧中国菜的厨师。1858年经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施洗加入基督教，后成为常驻天安堂的华籍牧师，并在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地巡回传教。1889年4月，倪蕴山病逝，长子倪锡令承袭圣职，一度执掌天安堂。1896年，倪锡令去崇明传道，在吴淞蕹藻浜遭遇风浪，不幸沉船身亡，年仅33岁。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在中国大陆特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天主教不同，基督教是随着列强的枪炮传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租赁房屋、设立教堂传教，以及兴办学校和医院等特权。基督教主要以差会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差会是教会的一种宣教组织，负责管理在异地传教的牧师，承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是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差会，也是早期差会中最为重要的团体之一。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原本是一个超宗派的传教组织，主要成员是除英国国教会之外的几个宗派，其中以公理会和长老会势力最大。1843年12月，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来到上海。次年2月，两人在县城大东门附近租借民房开设诊所，10月迁至南门外一处比较宽敞的四合院，扩充为专门给中国人治病的Chinese Hospital，是为沪上首家西医医院。雒魏林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医生，



1846年迁至山东路
麦家圈的仁济医馆

早年曾在广州、澳门一带开设诊所。来到上海后，雒魏林的华人医院治好了许多传统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并大力推广西医种痘法以抵御“听天由命”的天花病毒，因此求医者与日俱增。1845年，中外人士共同捐资，在北门外今福建中路与山东路之间购买了五亩半土地，筹建新的华人医院。1846年7月，新院落成，取仁术济世之义，定名仁济医馆。

当然，施医给药并不是传教士的主业，为民众治病也只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一种手段。就在仁济建造新院的同时，雒魏林和麦都思也为伦敦会购买了三亩土地。1864年，伦敦会在仁济医馆毗邻处建造了天安堂，首任牧师即为麦都思。其实，天安堂是一座不分教派和国籍的基督教堂，许多牧师就在仁济医馆的中国病人中传教，不少中国信徒也到天安堂做礼拜。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还是位中国通，曾独立编撰多种中文书籍，为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早在1843年，麦都思就在山东路创办了墨海书馆，与仁济医馆、天安堂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麦都思本人也住在这里。因此，老百姓称山东路、福建路、福州路一带为“麦家圈”，仁济医馆也被称为麦家圈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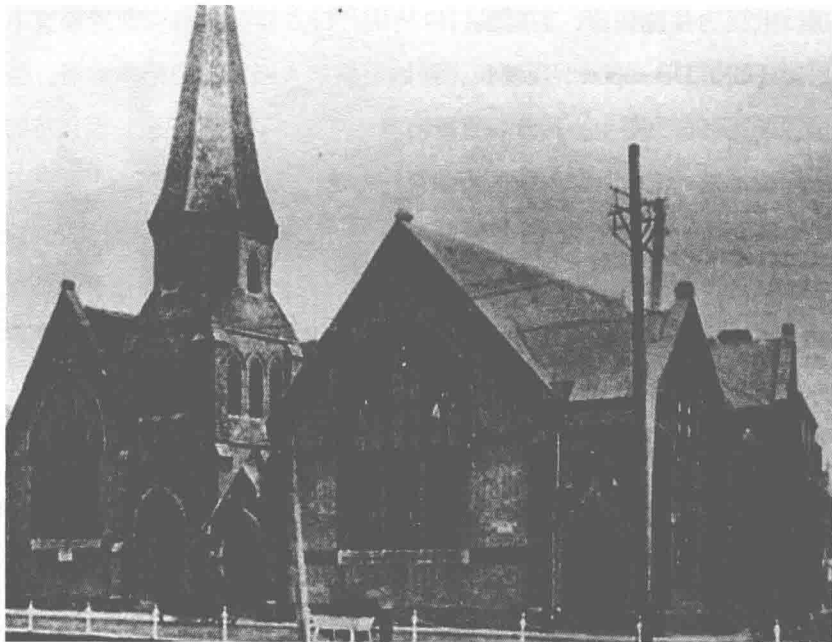
仁济医馆早期实行免费医疗，经费来源完全靠社会捐助，因此医馆的扩展是缓慢的。1861年，医馆将旧址出售，向伦敦会购买毗邻之地，另筹5000两白银重建新院。1874年，筹资6000两建成西式二层楼

房，上层为住院病房，下层供门诊使用。1905年，伦敦会派遣谈文卜医师（C. J. Devenport）任院长，开始根据病人经济能力酌收诊费，医馆逐渐能够自力更生。尽管一直扮演着“贫民医院”的角色，但仁济的医疗技术是一流的，深受中国籍基督徒的信任。据说，宋家的小女儿宋美龄就出生在仁济医馆。1919年，宋庆龄的表兄，中国第一代西医师牛惠霖从英国学成归来，就任仁济医馆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他引进了麻醉、消毒等一系列新技术，开展了四肢创伤等新手术，大大促进了仁济外科的发展。

1864年，仁济建造新楼，由英籍建筑师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设计，这位旅沪侨民富商一直是医院积极的赞助者和支持者。1926年5月，雷士德病故，他生前曾留下遗嘱，将白银100万两及房

建于1997年的仁济医院综合楼





位于苏州河南岸
的新天安堂

地产4处馈赠给仁济，作为医馆的扩建基金。1932年，用这笔巨款建造的六层新大楼落成，医院的英文名称相应改为 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中文正式名称为仁济医院。因雷士德生前设立的公司为德和洋行，仁济医院又被叫作德和医院。著名的雷士德医药研究所即设在仁济新大楼的五楼，它不仅承担了对仁济医院的技术指导，后又接办医院化验部，并帮助开展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生物组织、基础代谢、心动电流记录等多方面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随着仁济医院就医人数不断增加，前往天安堂礼拜的中国信徒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外国侨民。于是，外籍传教士决定在苏州河边靠近英国领事馆的地方另外建造一所新的教堂。1899年，一座专供外侨礼拜的基督教联合礼拜堂落成开放，英文名 Union Church。它是由天安堂发展过来的，因此又叫新天安堂。山东路原天安堂也同时取英文名字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只对中国信徒开放。1908年，天安堂宣布脱

离差会，实行经济自养，改称中华基督教天安堂。1916年，天安堂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后由华人募集款项在原址翻造新堂，为纪念倪蕴山、倪锡令父子，改名思倪堂。

1952年11月，仁济医院由华东卫生部接管，后移交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交通大学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天安堂逐渐停止宗教活动，划归仁济医院作门诊部。“文革”期间，医院先后改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工农兵医院和附属第三人民医院，1984年12月恢复仁济医院原名。20世纪80年代末，仁济医院建造新门诊大楼，有着百年历史的天安堂被拆除。

附

倪牧师蕴山公纪念碑碑文

环球无无教之国，即环球无不信教之人。我国夙以崇尚道德著称，虽未显立国教，然儒、释、道三教，大化弥纶，流传罔替。洎乎互市，外来传教者接踵而兴。其仪式、信条，容与我国习尚微有不同，而与人为善之心固无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先大夫云峰府君早年崇奉耶稣教，每所阐发，乡人咸目为有道君子。而倪蕴山先生实为先大夫挚友，前清戊午受洗于慕维廉牧师，旋被任为天安堂牧师，在会达三十二年。立身行事与先大夫志同道合，且持躬正直，秉性慈祥，尤以扶危济困，引为己任。惜局于一隅，未竟其志，良可慨矣！今距先生之歿，已卅有五年，令嗣锡纯会长嘱为诔次崖略，勒诸贞珉。徵祥不文，且久历外邦，于先生之嘉言懿行亲炙（应为“炙”字之误）日浅，未能道其万一，辄举其荦荦大者以诒当世，并垂不朽云。先生讳嘉珍，江苏川沙人，生于清道光丙申十二月初八日，歿于光绪己丑三月初九日，春秋五十有四。

基督降世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十一月，世愚侄上海陆徵祥撰，泾县包希简书丹。

——原碑现藏于上海市宋庆龄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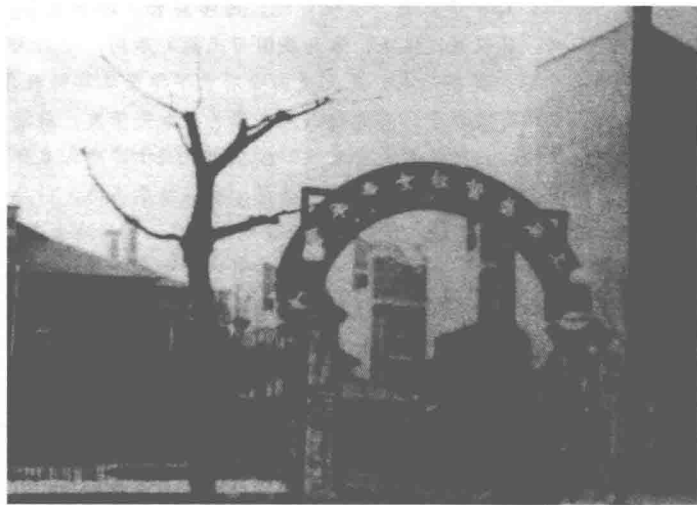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1917年夏，宋美龄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7月随兄长宋子文回到上海。回国之后，宋美龄的第一份职业是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每星期授课两天，同时还参加一些由女青年会组织的慈善和社交活动。1923年，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推动下，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童工委委员会，藉以改善童工的处境，宋美龄被聘为童工委委员会委员。

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1855年创立于英国伦敦，是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活动组织。创办初期，其主要目的是组织青年妇女参加宗教活动，为离家自立的职业妇女提

供住处，以团体的力量救济贫困妇孺。后来，基督教女青年会逐渐发展成为培养妇女德行、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服务机构。1894年，英国、美国、挪威、瑞典四国发起成立具有宗教性质的国际组织——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190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宣告成立，

位于戈登路（今江宁路）上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年轻时的宋美龄与美国友人合影

成为全国女青年会所属的第一个城市女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鼓励各界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1933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圆明园路133号新建办公大楼，由沪上华籍著名建筑师李锦沛主持设计。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坐西朝东，为九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890平方米，建筑面积5834平方米。建筑外貌带有装饰艺术派风格，装饰纹样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立面勒脚为石刻莲瓣须弥座，窗裙和压顶饰假石回纹，入口门楣为石刻勾头滴水批担。室内饰有藻井式天花及仿和玺彩画，十分精致。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长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最初设在海宁路6号，1923年迁往靶子路（今武进路），后来又迁往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北四川路、圆明园路等地，还一度借驻南京路上海女子银行楼上办公。直到1936年初迁至静安寺999号，以及1946年迁往江宁路495号会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办公条件才稍觉宽敞。1959年，上海基督教女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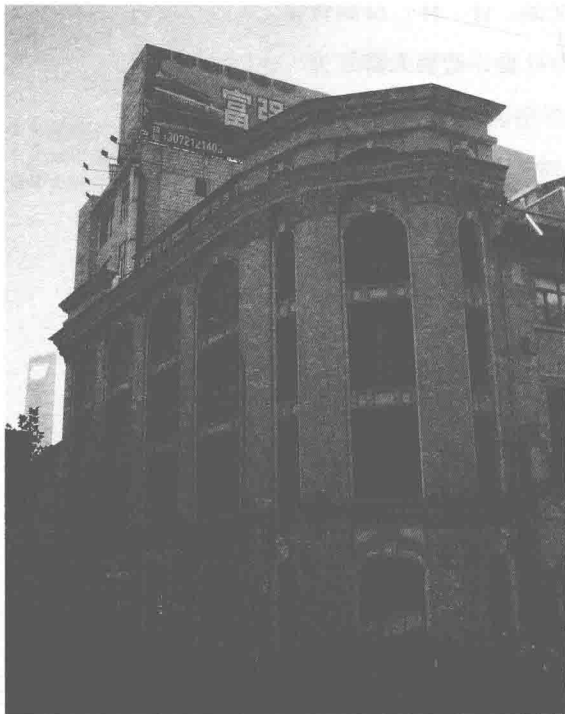
年会迁入西藏南路 123 号青年会大楼，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办公。改革开放后，青年会大楼部分楼面改建为商悦青年会大酒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迁往延安东路 29 号，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活动场所。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早期的活动往往与全国总会共同举行，在创办初期以举办圣经班、祈祷会等宗教事务为主，也随着社会潮流提倡天足运动和宣传女子教育的权利。以后，逐渐以“改良家庭，造就模范主妇”为中心，并结合妇女的特点开设俱乐部、婴儿保健会等。1927 年，开始为妇女开办中文、英文、美容、商业常识、商业簿记、打字等职业培训班，并通过演讲宣传指导青年妇女谋职。上海青年会尤其注重普通女工的文化教育问题，曾在闸北开设了两个平民女工教育班，还在沪西小沙渡、曹家渡等女工集中处开办夜校。基督教女青年会积极开展劳工

教育活动，目的在于“给女工一把钥匙”，培训生活生产技能，客观上也提高了女工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在她们中间涌现出了不少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40 年底，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创办第一所职业妇女托儿所，以后又办了劳工托儿所、幼儿园和保育员训练班，托儿工作引领当时风气之先，成绩斐然。另外，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还是中国女子体育运动最早的倡导者，1911 年设立体育会鼓励女性参加体育活动，1915 年又在荆州路创办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女子体育专业人才的学校。

1949 年全国妇联成立时，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创始单位之一。同一年，全国青联成立，基

如今位于延安东路上的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督教女青年会又是青联的团体会员。此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也相应成为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市青联的团体会员。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要以中上层家庭妇女和知识妇女、教会妇女为对象，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教娱乐活动，积极引导会员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时期，与其他宗教团体一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被迫停止活动。

1980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恢复活动，由荣漱仁女士任复会后的首任会长。新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特殊的非盈利机构，坚持“尔识真理、真理释尔”，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以提高妇女的素质、丰富妇女的业余生活为主要活动内容。如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共有会员4 000多人，其中不乏教育界、科技届、文艺界的女知识分子，广大会员为上海的发展献计献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附

在世界女青年会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节选）

宋美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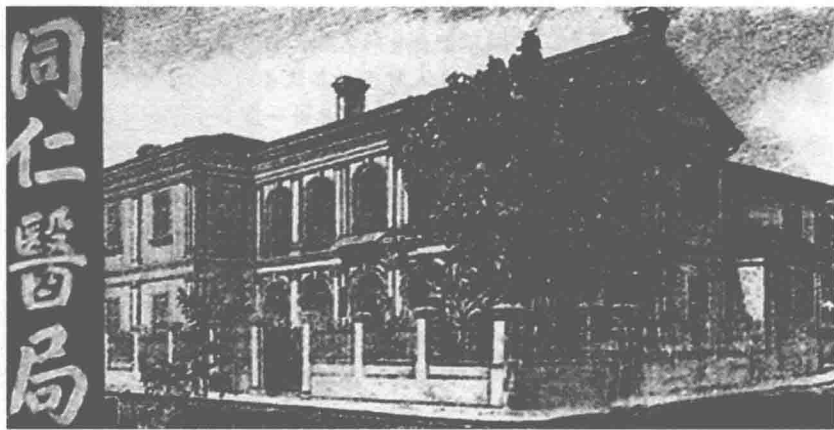
当我接到贵会请柬时，我原想应该由一位与中国女青年会日常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致欢迎辞。但是在我国，女青年会的广大是远胜于会员的人数。它代表着一种深深感动中国妇女界的精神和社会力量。本人对于世界改善的工作，也就是女青年会所努力的，是殷切地注意的。……我要讲一讲女青年会对我本人的意义。多年以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时我方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很荣幸地与上海女青年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那时，我是女青年会劳工委员会的义务委员，这是我一生中，很有启发意义的一种经验。我对于社会问题一向是有兴趣的，但我对于童工及女工问题的特殊注意，却是从那时间开始的。我很光荣地说，上海工部局设立童工委员会，其部分的原因，乃是受女青年会劳工委员会的影响。本人也是委员之一。中国现行工厂法，也深受该会工作的影响。这就是女青年会在行动中，对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实例。

——刊载于《女青》1947年第11、12月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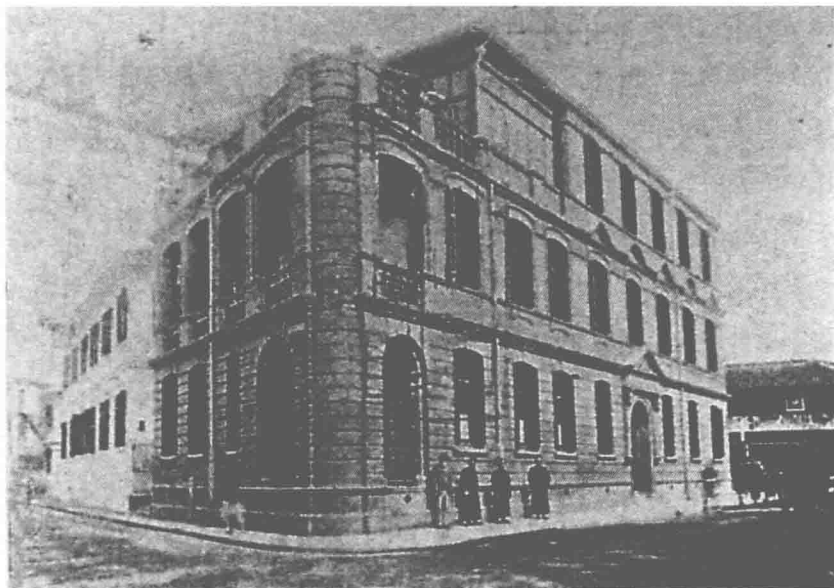
同仁医院

宋庆龄生于1893年1月27日还是2月14日？出生在虹口？在浦东川沙？抑或是南市老城厢？学界为此争得不亦乐乎，至今没有定论。而宋家的长子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出生于同仁医院，时间和地点基本为大家所认可。当然，那个时候的同仁医院既不在愚园路上，也不在圣约翰大学旁，而是位于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公共租界，离宋家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老宅不远。

1866年，美国圣公会牧师汤蔼礼（E. H. Thomson）与华人牧师吴虹玉共同创办同仁医局，大致位置在文监师路百老汇路（今塘沽路大名路）转角处，这是虹口地区最早设立的西医诊所。次年，诊所扩大规模，改称同仁医馆，俗称虹口医院。1880年，圣公会牧师文惠廉（W.



1866年成立的
同仁医局



搬迁至熙华德路文监
师路口的同仁医院

J. Boone) 之子文恒理 (H. W. Boone) 接手同仁医馆, 将之迁至熙华德路文监师路 (今长治路塘沽路) 口, 英文名字定为 St. Luke's Hospital。接手之后, 文恒理在院内开办医疗助理训练班, 学生毕业后留在本院, 充任医师助手。因求学人数逐年增多, 训练班规模不断扩大, 便改为医科学校, 是沪上最早的西医教育机构。1882 年, 文理恒又在同仁医馆试办护士训练班, 此为培养中国医疗护理人员的最早记载。

1896 年, 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书院设立医学部, 文恒理受聘担任主任, 将同仁医校并入, 同仁医院相应成为附属教学医院。1906 年, 圣约翰书院改组为大学, 医学系学制改为七年, 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47 年, 圣约翰大学医学系升格为医学院。由于圣约翰大学医学系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同仁医院也随之成名。作为教学医院, 凡医学系学生必须在同仁医院实习。因此, 校方和院方为之配备了最好的诊疗设备和专业人才, 许多驻院医师都是医学系兼职教授。1882 年, 同仁医院成功实施第一例眼科手术和卵

巢切除术。1886年，发起创立中华博医学会，设立全国首家医学博物馆和中华病理学博物馆。1904年，医院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现代化手术室。1909年，引进当时国内第一辆救护车，开创了中国近代急救医学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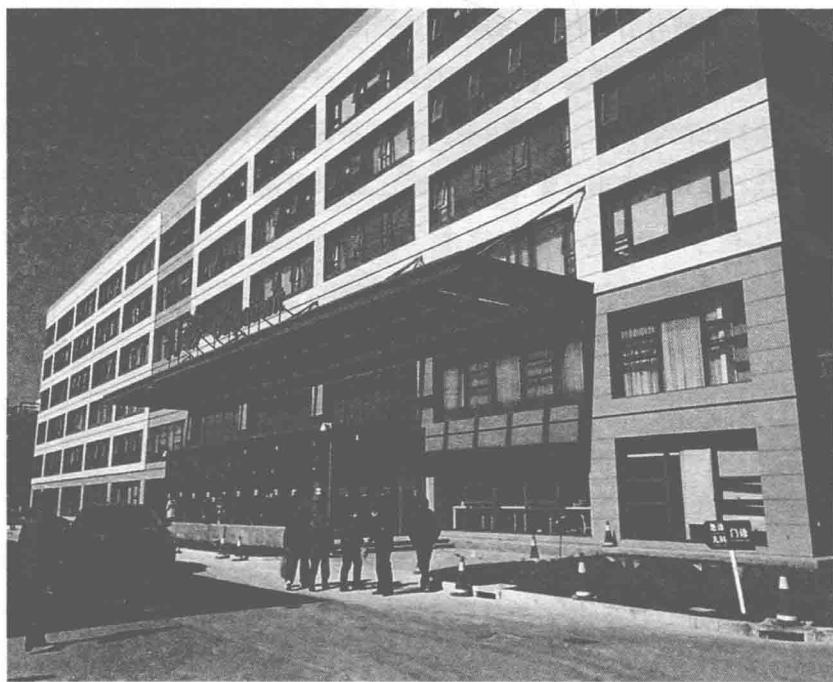
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医院，同仁医院院址却几经搬迁，这在整个上海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20世纪初，同仁医院从熙华德路搬到了虬江路，抗战前夕又一度迁至公共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425号圣公会女校，也就是今天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那幢白色大楼。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医院再迁至愚园路、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口。此时，大量难民拥入租界，就医人数骤增，医院挂起了“同仁难民医院”的牌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租界，英美侨民被关入集中营。原教会学校、医院，作为“敌产”管制或直接占用。同仁医院一部分迁往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广仁医院合并；另一部分得到百乐门舞厅老板的帮助，暂借大西路、忆定盘路（今延安西路、江苏路）口一幢洋房作为院址，改名同仁第二医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划出校门东边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1575号一块土地给同仁医院作为新址。同时，将学校医务室的一幢楼作为医院的门诊室和手术室，学校传达室临时充作急诊室，并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调拨的铁皮材料搭建简易病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撤销建制，同仁医院成为独立的医疗机构。1952年，应张福星院长的邀请，宋庆龄来医院视察。在她的关怀下，同仁医院获得政府拨款，建造了一幢妇科病房。1955年，同仁医院由政府卫生部门接管，简陋铁皮房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二层住院楼。“文革”时期，医院一度改名东风医院。1977年迁至愚园路738号，1979年恢复同仁医院原名。

愚园路738号，原为738弄，弄内大多为花园洋房，据说汪精卫、



位于虹口区长治路塘沽路口的同仁医院旧址



2015年新落成的同仁医院大楼

陈璧君夫妇曾居住于此。隔壁愚园路 754 号也是同仁医院的产权，外文名 Roseberry Court，1931 年由英籍犹太人 Roseberry 建造。这是一幢二层平屋顶砖混结构建筑，门厅、大厅、会客室、起居室、餐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还配有车库、锅炉间等辅助用房。因建筑造型丰富，高低错落有致，Roseberry Court 于 1994 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1987 年，同仁医院沿愚园路建造八层病房大楼，738 号院内的洋房陆续拆除。2000 年，因江苏路拓宽工程，犹太人别墅移建于 750 弄内，并由原来的南北朝向改为东西朝向。

1996 年，同仁医院挂牌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学医院”。2013 年 12 月 8 日，同仁医院与长宁区中心医院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新的同仁医院，分仙霞路、愚园路两个院区，占地面积 61 亩，建筑面积 8.91 万平方米，核定床位 1 200 张，服务范围辐射整个长宁区以及周边区县。通过两所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医院拥有消化内科、普外科、影像介入科三个上海市重点专科，逐步形成了以消化道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肿瘤性疾病诊疗为特色的学科群。如今，同仁医院将逐步建设成为设施完善、管理现代、服务一流的三级综合性医院，这所百年老院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霖生医院

1936年12月12日，为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蒋介石在仓皇逃跑的途中不慎摔了一跤，扭伤了腰。后来，还是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把他背下山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到上海休养了一段时间。宋美龄的表兄牛惠霖、牛惠生是享誉全国的骨伤科专家，兄弟俩开设的霖生医院离蒋介石私人别墅“爱庐”不远。因此，休养之际，蒋介石也常常前往位于祁齐路（今岳阳路）190号的霖生医院，请牛惠生医师诊治腰伤。

牛惠霖、牛惠生兄弟的父亲牛尚周，字文卿，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出生于1862年。幼年时即作为中国首批30名官费学生之一，赴美国学习。而牛氏兄弟的姨夫温秉忠，字苾臣，祖籍广东新宁，1862年出生于上海，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在异国他乡求学期间，两位来自上海的同龄人成了好朋友。1878年，牛、温二人在波士顿偶遇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宋耀如。当时，宋耀如正在养父开设的丝茶铺中当学徒，在牛尚周和温秉忠的影响下，宋耀如走上了弃商求学的道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881年，由于原定的十五年学习计划因故中断，留美幼童相继回国。牛尚周先是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后在江南制造局任帮办。温秉忠曾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工作，后成为清政府的教育顾问。回国后，两人先后娶了川沙城厢倪蕴山家的小姐倪桂金和倪秀珍。一次偶然的机



霖生医院主楼

尚周和温秉忠在上海街头又遇见了当年波士顿丝茶铺的小学徒宋耀如。如今的宋耀如，早已是美国监理公会的神职人员，奉命在上海、昆山一带巡回传教。牛、温见宋耀如孑然一身，在上海举目无亲，就把小姨倪桂珍介绍给了这位昔日的好友。

迎娶倪桂珍之后，宋耀如所演绎的一段显赫家史，世人皆知，此处不再赘述。回到牛家，1889年牛惠霖出生，1892年牛惠生出生，后来又有了两个妹妹牛惠珠和牛惠珍。牛尚周留美出身，对子女的教育自然不会含糊。老大牛惠霖，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领有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开业证书。1919年归国，历任仁济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上海时疫医院（今红光医院）院长等职。老二牛惠生，

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多所医院任职，临床经验丰富。1918年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次年返沪，自行开业行医，兼任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博习医院、杭州广济医院骨科医师。后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外科主任、中山医院院长等职。兄弟两人都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相继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牛氏兄弟均为当时名医，在国际上卓有声誉。牛惠霖一专多能，擅长外科，并精通内科、肺科、妇产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方面医术。

牛惠生为骨科专家，是美国医学会及骨科医师协会会员。1920年，兄弟两人在法租界祁齐路创设霖生医院，对面就是表弟宋子文的寓所（今岳阳路145号）。医院开张后不久，英国方面邀请牛惠霖赴香港为港督治病。名医出手，药到病除，消息传到上海，霖生医院声名鹊起，求诊者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病人就医，牛氏兄弟又在爱多亚路成都路（今延安中路成都北路）口设立诊所，并在南京路开设利济药房。1927年10月的一天，陈赓同志因在南昌起义中腿部受伤，由党组织安排住进了霖生医院爱多亚路诊所。一开始，牛惠霖以为陈赓是中了枪伤的江洋大盗，不愿意为他诊治。后来，陈赓亮出身份，据实相告，彼此消除了误会。宋庆龄闻讯后，特意叮嘱表兄一定要治好陈赓的腿伤。

霖生医院旧址





牛惠生



牛惠霖

由于伤情严重，通常情况下只好截肢，牛惠霖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了陈赓的腿，使他又能重回战场。1932年，陈赓再次负伤，仍请牛氏兄弟帮忙诊治，他们成了好朋友。事过多年，陈赓仍念念不忘牛氏兄弟的高超医术和对革命的同情。

牛惠霖和牛惠生，不仅医术精湛，心地也很善良，常常为贫苦百姓免费治病。“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牛氏兄弟与宋庆龄、何凝香等积极组织救护工作，牛惠霖还担任了上海市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可惜兄弟两人都不长寿，均于1937年病逝，一个48岁，一个才45岁。

祁齐路霖生医院为三层砖混结构建筑，略呈英国乡村式住宅的特征。平面中部凹进呈L形，北面入口出挑半圆形雨篷，灰色水泥檐板，下有牛腿支撑。顶层采用陡峭的双坡屋顶，并设置了多处老虎窗，坡屋顶的形体变化丰富。墙身及开窗形式简洁，装饰集中于各个入口门廊部位，且各处门廊的挑檐形式各异。局部露木结构，黄色粉刷墙面。抗战初期，这里成为难民医院，1944年起改名为私立上海医院。1958年9月，该院并入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改革开放后至今，为单位使用办公场所。如今的岳阳路190号，霖生医院旧址属于徐汇区不可移动文物。虽然使用单位几经变迁，建筑依然基本保持着1920年建造时的样子。

附

牛惠霖为陈赓治疗腿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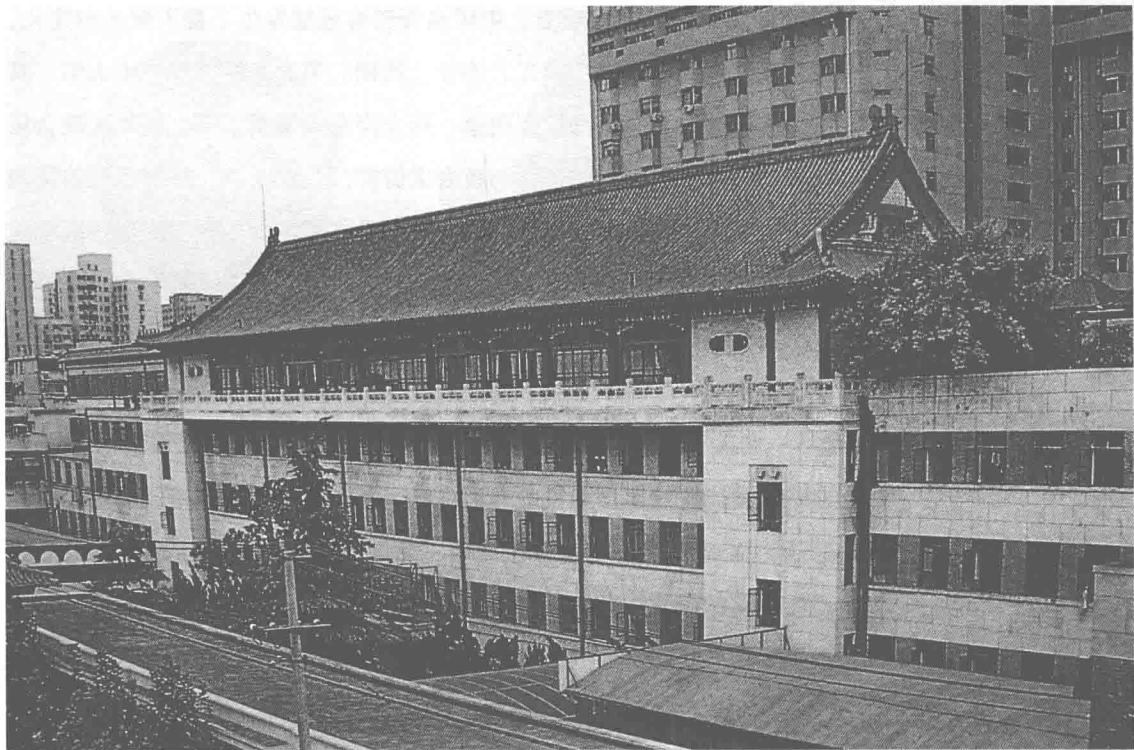
党帮助他住进上海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腿伤。经几个月的治疗，才把左腿上的伤口治好，将折断的腿骨接起来。牛惠霖曾经留学英国，和他弟弟牛惠生（曾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政治思想倾向进步。因为他们的医术高超，在上海很有名望，许多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治病，也时常有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在这里进进出出。陈赓同志初进去的时候，这位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腿是在盗窃的时候摔坏的，不很乐意医治。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够解除对方的猜疑。当时陈赓同志觉得，与其被怀疑作强盗，还是承认本来面目的好；又见医生为人比较正直忠厚，便把自己的真情告诉了他。医生听完陈赓的叙述，深受感动，对他非常友好。这位大夫还问陈赓为什么不早说？原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先生的亲表兄弟，一向同情革命。陈赓同志谈过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后，牛惠霖大夫马上告诉了宋庆龄先生。宋庆龄在广州的时候就认识陈赓，她又是南昌起义时候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如今得知陈赓同志在南昌起义中负伤并已来到上海治疗，非常关切，就向牛氏兄弟嘱咐，一定要把陈赓同志的腿给治好，也要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的伤病员同志。从此牛惠霖大夫对他就更加热情，非常认真地给他治疗，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

——转引自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中山医院

1937年2月，宋庆龄的表弟牛惠生受聘为上海中山医院院长，每日到院处理要务，但不支薪金。接任之后，牛惠生大力推进院务革新，事无巨细，必亲检阅。5月4日，因操劳过度，引起旧疾复发而不幸病逝。幼妹牛惠珍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逼迫他终止改革，并辞去中山医院院长之职，否则即以手枪对付等语。此事牛惠生未向任何人提及，却曾对家人说：“如医院内部而无合作与忠诚之精神，惟以外表与名利，是将与屠场无殊，余能为公而死，死无憾焉！”

中山医院位于肇嘉浜枫林桥（原名丰林桥）南堍，要回顾其历史，还得从宋氏家族的世交颜家说起。宋耀如早年上海传教之际，与圣公会华人牧师颜永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颜永京祖籍山东，后移居沪上，受洗入教。1854年被圣公会送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度担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公共租界工部局通事。颜永京膝下有四子一女，其中次子颜惠庆是著名政治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及代理国务总理，国民政府时期也多次出任驻外使节；幼子颜德庆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川汉、粤汉、沪宁三大干线都倾注了他的心血，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还代表中国收回了胶济铁路的主权。颜惠庆、颜德庆与堂弟颜福庆，并称“颜氏三杰”。若是从家世渊源而言，颜家的风光并不输于同时代的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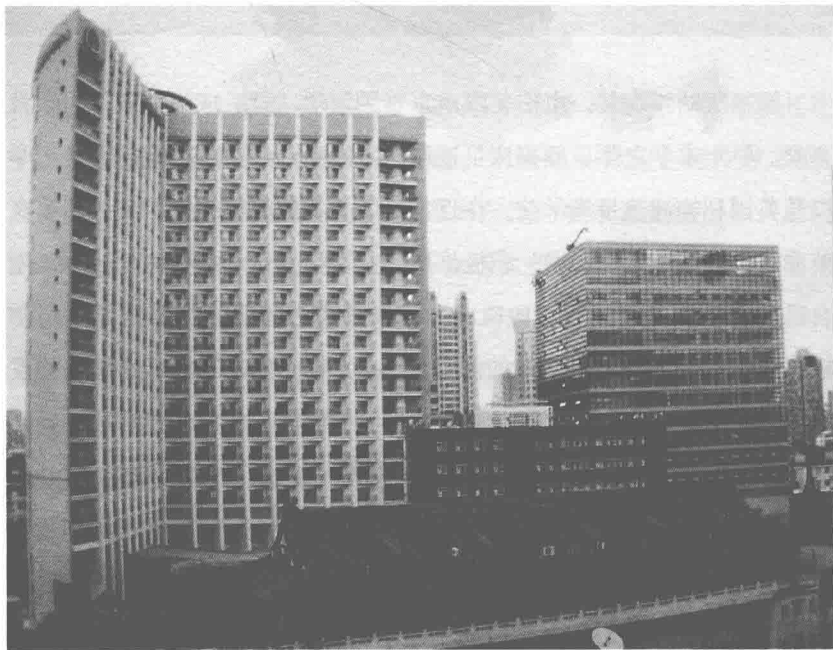
中山医院

颜福庆幼年丧父，由伯父颜永京资助留学，日后成为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早年求学之际，颜福庆足迹遍布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以及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在近代医学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甚久。辛亥革命后，颜福庆留在中国，积极推广公共卫生知识和各种医疗技术，用自己的所学服务于同胞。1914年，他一手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1915年，他与医界泰斗伍连德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并当选为首任会长。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颜福庆还曾担任过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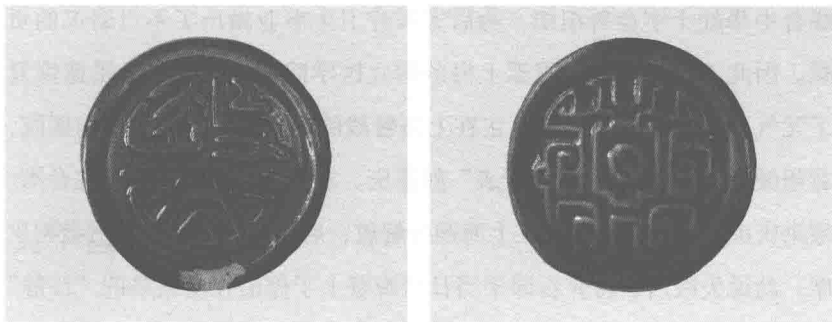
当时，国人自办的医科院校为数不多，无论是仪器设备还是师资力量远比不上外籍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校。颜福庆深感发展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决心创办一所属于中国“自主品牌”的一流医科院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相继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5所国立中山大学。其中，第四中山大学总部设在南京，即今南京大学的前身。颜福庆联合乐文照、赵运文等医界同仁，与政府主管部门几经交涉，最终争取将第四中山大学附设的八大学院之一的医学院设在了上海，颜福庆出任医学院首任院长。

医学院最初选址宝山原国立政治大学旧址（今吴淞中学校园），因校区面积狭小，器材设备无法安置，极大地限制了招生规模。1932年“一·二八”事变，校舍又遭到日军炮火的严重破坏。1931年，颜福庆即响应国民政府要员孙科的号召，组织沪上名流如陈光甫、杜月笙、闻兰亭，以及部分党政高官孔祥熙、吴铁城、褚民谊等，开始集资筹建一所全新的国有医院。1934年在肇嘉浜南岸枫林桥畔购得土地四十亩，次年6月开始动工建造，于1936年12月竣工。新落成的医学院大楼为



中山医院综合
住院大楼



中山医院大楼屋檐上的瓦当

钢筋混凝土多层建筑，外表为传统中式风格，中间是十一开间的歇山顶主体，两侧翼顶端各有一四角攒尖方亭，与主体之间以廊道连接。大楼屋脊之上吻兽、脊兽一应俱全，黄色琉璃瓦，红色清水砖墙，雕梁画栋，气势非凡。此时，第四中山大学早已改名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校门口填筑的那条小路也相应命名为医学院路。学院附属医院在毗邻新校区东首的空地上同时落成，并于1937年4月1日举行开业典礼，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亲自到场祝贺。这是一幢与医学院具有同样民族风格的中西合璧大屋顶建筑。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也为了延续原第四中山大学的传承，医院命名为中山医院。上海中山医院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并自主管理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

上海医学院新校舍落成和中山医院开业后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学校和医院先后西迁昆明、重庆。虽然教学与医疗条件愈发困难，但两所单位的综合实力不减反增。中山医院在王霖生、吴绍青等几任院长领导下，

中山医院内孙中山先生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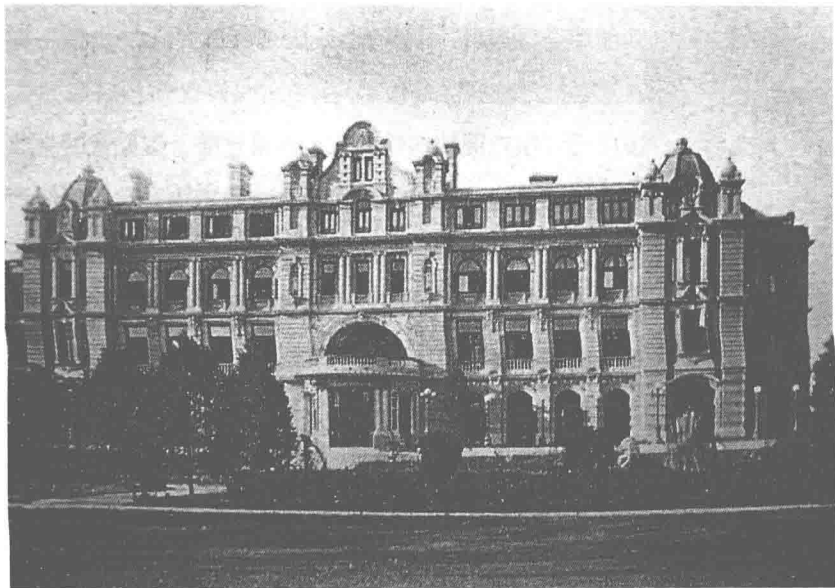
联合中华红十字会等组织，为后方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的国立医学院和中山医院，迅速恢复了元气。1949年5月6日，正在上海督战的蒋介石专程来到中山医院，看望颜福庆的堂兄、“民意代表”颜惠庆，实际上是劝颜随他前往台湾。颜惠庆虚与委蛇，借故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劝说失败后，蒋介石即于当日傍晚登上了停泊在复兴岛的“江静”轮，7日清晨离开上海驶向舟山。专程前往探望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这在蒋介石留沪最后十天内，还是唯一的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上海医学院一度改名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为学校附属第二医院，1956年恢复中山医院名称。2000年4月，随着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两校合并，又成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该院现为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是卫生部、教育部部属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

大华饭店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大华饭店举行婚宴。这一天，饭店大厅内挤满了1300多位宾客，汪精卫、陈果夫、孔祥熙等党国政要，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和英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驻沪领事，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高层官员出席了宴会。由此可见大华饭店当年在上海滩的规模和档次。

大华饭店是上海早期著名的饭店之一，位于今南京西路之北，江宁路与南汇路之间。这里最初是清政府上海道署洋务局所在地，民国后转



大华饭店外景



大华饭店大堂及舞厅

卖给了法租界公董局总董麦边，因此也被称为“麦边花园”。1922年，花园售予英商香港大华公司，新业主在60余亩的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起坐北朝南的多功能综合性饭店，取名Majestic Hotel。“majestic”一词意为雄伟、宏丽，于是被译作“大华饭店”。

新建的大华饭店是一座砖混结构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三段式的古典主义立面，中间有爱奥尼式双柱廊，主要入口在建筑中央，台阶拾级而上，平台上有大型半圆拱门。屋顶正中间有巴洛克曲线装饰，形成豪华庄重的中轴线构图。底层为大堂和舞厅，中央装有大理石喷水池，四周是大理石爱奥尼亚柱式的回廊，中段设置半圆形音乐台一座，平顶中央圆穹装饰十分华丽。在东西两端的屋顶上，装饰有圆形小穹顶，与中央圆穹相呼应。建筑的周围则是宽广平整的大草坪。饭店一经开张，即以其豪华的设施傲视沪上，成为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娱乐场所。旁边的一条小路，也因饭店而得名为大华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汇路。

大华饭店利用底层宽敞的大厅作为舞池，是当时上海第一家对社会开放的公共舞厅。受驻沪外侨的影响，加上女性放足和天足成为引领时尚的主流，交谊舞逐渐成为一种高尚的娱乐活动而受到上海青年男女的喜爱，商业性舞厅也开始大量出现。据1928年版《上海指南》中记载：“跳舞场为市上新兴游艺，向者外国酒楼旅馆始有之，现已传染普遍，凡大旅馆酒楼皆有之。亦有特设舞厅以供翩跹起舞，雇用舞女为招徕，如偕舞伴往舞亦可，门券一二元，亦有不须买票者。舞券四角，若开香槟，与报效舞女，一宵之费，未能限量，诚销金之窟。青年壮志，坠落于此者，岂可胜数！”在大华饭店舞厅内，还活跃着一支著名的叶尔莫拉耶夫俄罗斯爵士乐队（Russkii Orkestr—Dzhass S. Ermolaeva）。该乐队由爵士音乐家俄侨叶尔莫拉耶夫于1929年组建，人数在8~15人之间，由长号、小号、大号、管钟、爵士鼓、吉他、低音萨克斯、中音萨克斯、次中音萨克斯等乐手组成，被誉为当时远东最优秀的爵士乐队。

大华饭店舞厅就是叶尔莫拉耶夫乐队的演出基地之一，此外他们还在百乐门舞厅，以及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西人俱乐部及饭店演出。叶尔莫拉耶夫乐队还曾应邀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并为福斯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的有声电影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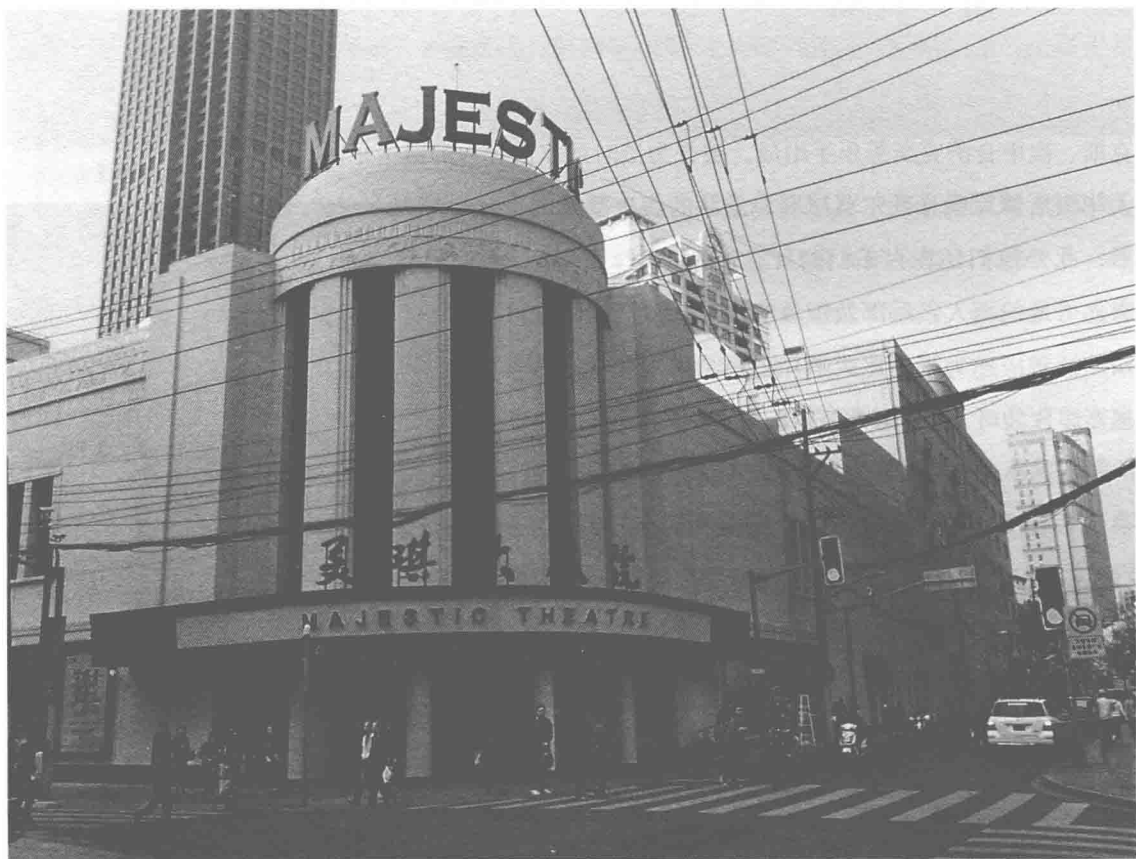
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926年访问上海，曾经慕名入住大华饭店。他在《上海见闻录》中写道：“经三井银行的土屋君介绍，为得到些许聊天的资本，也曾去东洋第一，而且据说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旅店‘大华饭店’住了两三天。”不过，这个“设备精良、极其豪奢”的饭店，似乎并不令谷崎润一郎满意，他批评饭店虽然“房钱一天最低25元，最高达75元”，但是没什么好的葡萄酒，“饭菜也绝对

蒋介石和宋美龄
结婚照



称不上美味可口”。其实，大华饭店并不以美酒佳肴著称，而更像是一处时尚场所。1931年6月，大华饭店举办时装表演，男女模特儿穿着时装缓步而出，其种类有男子西服、女子长旗袍、晨服、晚服、婚礼服等九大类，场面盛极一时。当时的上海，已是全中国的时装之都，“时装表演”是扩大影响的一种时髦手段。另外，大华饭店内的意大利花园，曾经是名噪一时的露天电影放映点。自电影传入之后，各种放映形式均已在上海落地生根，露天放映就是在每年夏季6月至8月，借用花园或大厦的屋顶放映电影，兼顾娱乐与消暑。大华露天影戏园始建于1925年，早期是上海大戏院的夏季分院，1927年至1928年成为夏令配

建于大华饭店原址
上的美琪大戏院



克的夏季分院，1931年又成为光陆的夏季分院，是专供上流人士聚会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所。

1931年秋，大华饭店发生火灾，主体建筑焚烧殆尽。1941年，原大华饭店地块被上海亚洲影院公司租用并兴建影院，由中国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馥记营造厂承建。该影院占地2592平方米，建筑面积3357平方米，共有1597个座位，设施之先进被海内外人士誉为“亚洲第一”。亚洲影院公司原想沿用“大华”的名称，但“大华大戏院”已经被其他公司使用，只能依照“majestic”译音定名为“美琪大戏院”，取其寓意“美轮美奂，琪玉无瑕”，英文名字仍为Majestic Theatre。1941年10月15日，美琪戏院开幕，特意将美国福克斯公司出品的五彩歌舞片《美月琪花》作为首场公演。此后，美琪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上海放映西片的首轮影院。1945年12月28日，蓄须明志拒绝为日寇演出的梅兰芳选择在美琪正式复出，轰动一时，观者如潮。新中国成立后，美琪大戏院曾改名北京影剧院，世界著名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莅临演出了经典剧目。美琪大戏院还一度成为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1954年5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就在此召开。

我们的今日

蒋介石

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申报》，1927年12月1日第14版

百乐门舞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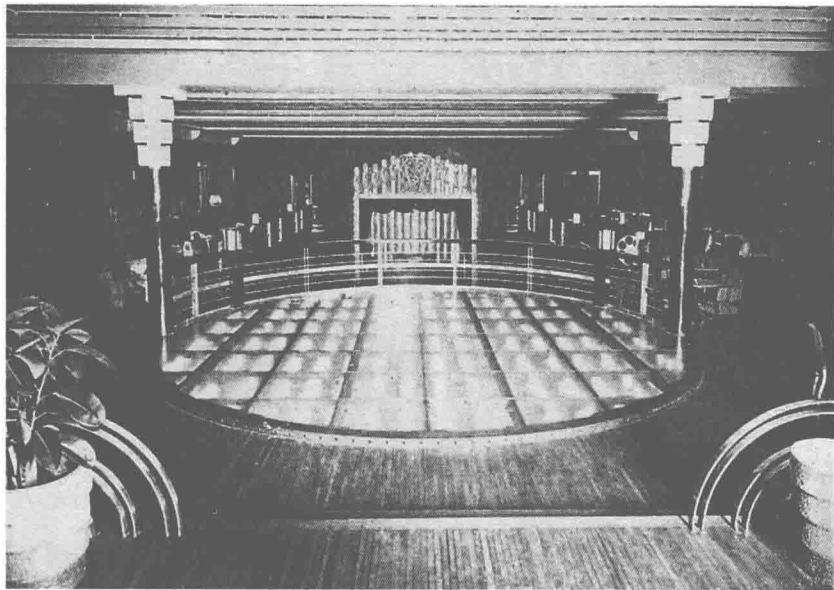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各项事务之余，党政军要员常常涉足娱乐场所。一些著名的舞厅、饭店也是重要社交场所，一场场历史活剧在这里上演。百乐门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为出名的销金窟，孙宋孔

百乐门舞厅外景



蒋家族时常出入其间。1934 年 2 月 6 日晚 9 点半，中华慈幼协会在百乐门举办慈善舞会，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以及宋子良、孔令侃特地赶来捧场。1935 年 11 月 2 日下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百乐门舞厅召开茶会，欢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约翰·加纳，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陪同出席。

很难想象，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海，一旦缺少霓虹灯闪烁、交谊舞蹁跹、爵士乐鼓荡，以及空气中弥散着各种暧昧香味的一家家既妖娆又浪漫的舞厅，上海是否会因此失却许多春风荡漾的亮色？其实，舞厅既呈现着舞者的姿态，也折射着社会生活一角，以及由这种姿态和折射所张扬开来的疯狂热情和眩晕感觉。百乐门甫一出现，确

百乐门舞厅内的
弹簧舞池

实让人眼前一亮。它是一个名叫顾联承的投资商花 70 万两白银，购下毗邻静安寺的一块地，然后由一位姓杨的中国建筑师设计、陆根记营造厂承建。顾联承的营造理念便是 Paramount Hall（最高的、最卓越的建筑），并取其谐音命名“百乐门”。百乐门楼高共三层，建筑面积 2 550 平方米，底层为饭店和管理处，二楼三楼为舞厅，最大的舞池有 500 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踩上去富有弹性，故人称弹簧地板。三楼有可供少量舞伴跳舞的小型玻璃舞池，那显然是为一些需要避开他人耳目的男女舞伴特设的。百乐门建筑造型为美国近代式，转角顶部耸立有 9 米高的圆柱形玻璃钢塔，每当夜幕降临，繁星闪烁，人在遥远处，一眼便可看到百乐门钢塔顶上熠熠闪亮的灯光。这钢塔、这光亮，也成了百乐门的一个抢眼的标志。

1933 年 12 月 14 日，百乐门正式对外营业，热闹非凡。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携夫人大驾光临，并亲自为百乐门“开门”，成为一大亮点。百乐门很快就成了上海滩的重要地标之一，成了上流社会主要的娱乐场所之



翩翩起舞的人群

一。像百乐门这样的舞厅，当然少不得会有达官显贵、名媛淑女、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影视明星等各色身影的人出入，有的还来自遥远的异国。

电影皇后胡蝶就经常出入百乐门，并会带来轰动效应。在胡蝶被电影界评为“电影皇后”时，与百乐门同处十里洋场、以做女式时装闻名的鸿翔时装公司向胡蝶赠送一套由特级技师精心制作的高级礼服，上面缀满了许多缎制的、翩翩欲飞的彩色蝴蝶，并诚邀她穿上这套礼服，参加鸿翔时装公司假座百乐门舞厅举办的时装表演会。据当年《申报》记载，那次盛况空前的活动轰动了整个上海，百乐门周边一带，一时车水马龙、人满为患，以致租界巡捕房不得不出动马队来维持秩序。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几年中，凡到上海，常来此跳舞，还曾在百乐门的旅馆里会见过重要的客人。他在法租界的高乃依路（今皋兰路）有花园洋房，但是为了便于跳舞，在善钟路、霞飞路（今常熟路、淮海中路）也租了房子。据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张学良之所以选在百乐门会见和招待他的重要客人，是为了避人耳目。英国著名

影星、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先生 1936 年来沪时，也曾慕名到此跳过舞，当时的报刊上还刊出过他跳舞时的照片。百乐门也是一个会发生各种故事的地方，有的或许还不乏凶险，百乐门最负艳名的舞女陈曼丽遭枪杀，至今仍是个谜。

百乐门在抗战期间举办过两次大型的慈善舞会，舞会收入全部捐给灾区，顾联承还把梅兰芳给请来了。百乐门还是大户人家举行婚礼的佳选，起码有三次非常轰动。一次是盛宣怀的孙子盛毓卹结婚，娶了李鸿章的老部下任道镛的曾孙女、大美人任芷芳，各路来宾，人潮汹涌，静安寺一带不得不出动很多警察维持秩序；一次是中国邮票大王周今觉的七小姐周稚芙结婚；另外一次是无锡蠡园的主人、荣家最早的合作者、荣家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王禹卿先生结婚，亦是宾客如潮，热闹非凡。

在老上海们看来，百乐门也堪称上海爵士乐的发源地。1947 年，百乐门组织了一班全华人乐手的乐队。那是上海第一次让一个全华人的爵士乐队在高级舞厅演出。有了这支足可与外国乐队 PK 的“百乐门爵士乐队”，百乐门从此更加声名远播……

百乐门的爵士乐，有许多中国民歌，其中像《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香格里拉》等歌曲，流传至今，都是十分经典的爵士乐曲。

百乐门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曾熠熠生辉，光彩夺目，让人们回味无穷，浮想联翩。然而，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它也难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1954 年以后，上海所有营业性舞厅都不许营业了，百乐门主建筑改为

大都会舞厅和百乐门舞厅发行的联合代价券



红都戏院，后来又改为红都影剧院，放电影，也演话剧、沪剧、越剧，其他辅助建筑改为商场。

改革开放以后，百乐门终于迎来了凤凰涅槃的良机！1994年红都影剧院易名为百乐门夜总会。2001年10月，台湾著名商人赵世崇出于对老百乐门的敬仰，投巨资对总建筑面积为3500平方米的旧建筑进行改建。新的百乐门舞厅在2002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不仅恢复了其昔日“远东第一乐府”的卓越风采，也使之成为新上海娱乐业的一颗新星。

附

《申报》登载孙宋孔蒋家族人士造访百乐门舞厅简表

姓名	身份	时间	事由
孙科	立法院院长	1934年2月6日21时半	中华慈幼协会慈善舞会
		1936年12月31日夜	迎接新年舞会
孔令侃	孔祥熙之子	1934年2月6日21时半	中华慈幼协会慈善舞会
宋子良	金融界人士	1934年2月6日21时半	中华慈幼协会慈善舞会
孔祥熙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935年11月2日下午	孔祥熙招待美国副总统茶会
		1936年3月6日晚	中波跳舞游艺大会
宋子文	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5年11月2日下午	孔祥熙招待美国副总统茶会
	行政院院长	1945年12月24日晚	招待在沪盟军高级将领圣诞联欢
宋蔼龄	孔祥熙夫人	1936年3月6日晚	中波跳舞游艺大会
张乐怡	宋子文夫人	1945年12月24日晚	招待在沪盟军高级将领圣诞联欢

孙科别墅与卫乐公寓

大家都知道，番禺路60号原是立法院长孙科的住宅。其实，孙科在上海还有几处鲜为人知的房产，其豪华程度并不在番禺路住宅之下。湖南路105号，就是抗战期间孙科购买的一栋欧式花园洋房。

这幢高三层的白色别墅，最早是南浔富商张石铭第七子张叔驯的住宅。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痴迷于火车模型的英国洋行老板，在霞飞路、居尔典路（今淮海中路、湖南路）一带买下一块土地，建造了一座带有小火车轨道的花园，用来收藏他心爱的火车模型。1931年，这位英国老板要回国了，就把花园卖给了张叔驯。张叔驯也热衷于收藏，尤

孙科

其是中国古钱币，与天津方药雨、四川罗伯昭并称“南张北方巴蜀罗”。因此，他对这些火车模型很有兴趣，希望能与花园一起买下，为中国收藏界留下一段佳话。但那位英国商人实在舍不得这些花毕生心血收集的宝贝，最后还是想办法把火车模型运回了国内。转手之后，园子成了南浔张家名下的产业，于是当地百姓就把这里叫作“张家花园”。提起上海西南角居尔典路上的张家花园，时髦的老克勒们都有印象，占地近三十亩很大的一个园子，前门开在霞飞路，后门开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平时，花园大门紧锁，深宅高墙，很难窥见园中的景象。到



了周末，这里常常是车水马龙，宾客如流，张家花园是上海滩公子名媛社交聚会的场所。

既然火车模型没有了，留着这么大的园子也没什么用处，于是张叔驯拆去了花园中的小火车轨道，并将南面沿霞飞路的一大片空地都转卖给了别人。接着，他又请外国朋友在花园北面设计建造了两栋不同风格的洋房。东面的一栋由张叔驯自己居住，西面的一栋归他的侄子著名书画鉴赏家张葱玉所有。两栋房子中间有一座西式喷泉，楼前是宽阔的大草坪，也是天然的草地网球场，可同时安排四组对手挥拍竞技。夏天，张家常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打球，其中既有政界、商界的名流，更多的是收藏界的圈内好友。据说，当时全国最好的网球选手邱飞海和林葆华也常常来张家花园练习球技。

后来，张叔驯、张葱玉叔侄二人将园子从中隔开，分成两户人家。西面的宅院大门开在福开森路上，即今天的武康路 117 弄 1 号。东面的



位于番禺路 60 号
的孙科故居



位于湖南路 105 号的
孙科别墅

宅院大门开在居尔典路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路 105 号。张葱玉痴迷于书画鉴赏，出手阔绰，常常人不敷出，于是就把房子卖给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叔驯打算移居美国，也决定把房子卖掉。几经转手，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买下了这座房子，送给了他的二夫人蓝妮。据说，孙科还曾经敲过隔壁邻居周作民一大笔竹杠。1945 年 8 月 16 日，一位所谓的重庆政府地下特工人员手持证件闯入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办公室。他带来一封由孙科亲笔书写的信件，向周作民借款两亿元法币，时值一千两黄金。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坊间传说中央将派“大员”来上海接收“敌伪产业”，一旦被控有“汉奸嫌疑”，不仅财产没收充公，弄不好还会坐牢杀头，搭上全部身家性命。尽管周作民一直在大后方，但他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属于那种既不积极抗日也不公开附逆的“灰色银行家”。而且他也不敢得罪权势显赫的孙大公子，只得乖乖拿出一笔巨款，且当是破产消灾吧！后来，这笔借

款一拖再拖，周作民不敢催讨，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其实，随着国民经济的崩溃，法币不断贬值，即使孙科按照借款合同归还，两亿法币也只是一堆废纸了。

从湖南路 105 号往东不到 1 000 米处，还有一处孙科的产业，那就是靠近乌鲁木齐路口的复兴西路 34 号卫乐公寓。卫乐是英语“Willow（柳树）”一词的音译，因此卫乐公寓又被称作柳树精舍。公寓建于 1934 年，由法商赉安洋行设计，上海川沙籍营造师顾梦良任总监工。

位于复兴西路 34 号
的卫乐公寓



该大楼属于现代点式高层建筑，为十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内设电梯。立面强调竖向线条，中轴设一串挑出的半圆形阳台，屋顶中部高起，向两边层层跌落。建筑外墙为水泥砂浆，立面中部竖线条及凸出的半圆形阳台为暗红色粉刷，其余部分为浅黄色粉刷，具有强烈的装饰派艺术风格。大楼建成之后，居住在此的大多为外国洋行大班和高级职员。抗战爆发，外侨纷纷离沪回国，卫乐公寓被孙科乘机低价购买，成为他名下的一处产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孙科别墅和卫乐公寓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复兴西路 34 号公寓住进了一批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其中有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娘子军连歌》的作曲家黄准、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西彦、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等。湖南路 105 号孙科别墅则成了上海交响乐团的所在地。从这个院落中，走出了朱践耳、曹鹏、陈燮阳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音乐大师。

玫瑰別墅

在上海西南的复兴西路上，离淮海中路不远，有一条宽阔的弄堂，里面坐落着7幢造型典雅、风格迥异的三层小洋楼，名为玫瑰別墅。它们建造于1940年，建筑外观为欧式风格，既有传统的斜屋面，又有现代派的平屋面，外墙立面采用螺旋式。洋楼室内各房间功能完全西化，均按外侨生活习惯设置。每幢洋楼都带有独立的花园，虽然面积不大，但草木繁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玫瑰別墅的主人，就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二夫人蓝妮。

孙科与蓝妮

据说，蓝妮是云南苗王的公主，因美貌出众而被小报誉为“赛西施”。其实，蓝妮的父亲蓝世勋曾是黄兴麾下的参谋长，母亲方淑贞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蓝妮的祖先的确是云南很有势力的苗族土司，祖父蓝和光与军阀龙济光是表兄弟，因此误传成了“苗王的公主”。后来，蓝妮随父母迁居上海，就读于智仁勇女中。1929年，由父母做主，18岁的蓝妮嫁给了原财政部次长李调生的二儿子李定国。嫁到李家后，尽管生了三个孩子，但夫妻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封建大家庭的清规戒律更是让她难以忍受。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吵，1933年蓝妮与李定国正式离婚。

离婚之后，蓝妮想好好享受生活，开始频繁出入于社交场所。这时的蓝妮，年仅23岁，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风



韵，举手投足间显示出高雅的气质，很快就成了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在一次私人舞会中，她结识了孙中山的独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两人立即坠入了爱河。虽然孙科早有妻室儿女，但爱情是不理智的，孙科沉迷于蓝妮的美貌，蓝妮也被孙科不凡的风度和学识所倾倒。1935年起，蓝妮以立法院长私人秘书的身份伴随在孙科左右。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但两人并未办理法律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孙科只摆了几桌酒席，宴请立法院的同事，显得十分低调。

抗战期间，蓝妮只身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周旋于上流社会。虽然衣食无忧，但她还要接济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蓝妮是一个要强的

女人，不愿意在经济上依靠别人。沦陷时期的上海，因周边人口大量涌入，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房荒。蓝妮决定利用人脉关系做点生意，于是在地产大王杨润身的帮助下开始投资房地产。她看中了法租界白仲塞路（今复兴西路）闹中取静的环境，这里离霞飞路不远，交通非常便利，周围又都是高档住宅区。经过奚福泉、黄大猷、赵涤、陈植4位建筑大师的精心设计，蓝妮亲自督工建造，7幢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拔地而起，外墙分别用了7种不同的颜色，显得十分醒目别致。建成之后，蓝妮自己住在1号，父母兄弟住在5号，其他洋楼对外出租，收取租金。不久，蓝妮又将马路口的两幢洋楼也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

抗战胜利后，由于蓝妮曾与汪伪头面人物有所往来，一度被军统以汉奸嫌疑逮捕关押。出狱之后，部分房客以租期未到为由，坚决不肯搬迁，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一时之间，流言四起，风传立法院长挪用

孙科给蓝妮
立下的字据

我祇有原配夫人陳氏
此外決無第三人持此
立証交藍妮英宜二太太收
孫科

公款金屋藏娇，蓝妮倚仗权势强行逼迁，最终影响了孙科的仕途，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不过，蓝妮晚年一直强调，玫瑰别墅是用自己的积蓄建造的，与孙科毫无关系。

正当房产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之际，玫瑰别墅内又发生了一件扑朔迷离的绑架案。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孙科与蓝妮的女儿孙穗芬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电话，让女佣翠英带着小穗芬去老正兴菜馆见妈妈的一个朋友。不久，一辆小汽车停在了玫瑰别墅弄堂口，主仆两人高高兴兴地上了车子，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到了南京路，司机打发女佣先行回家，然后带着小穗芬悄悄住进了大沪饭店。没过多久，勒索电话打到了玫瑰别墅，一开口就要价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赎金最终讲定为10万美金。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孙科和蓝妮没有选择报警，他们将玫瑰别墅抵押给了金城银行，换出一张10万美金的支票。在弟弟蓝业申的陪同下，蓝妮按照约定交付赎金，又根据绑匪的指示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领回了已失踪好几天的女儿。70年过去了，这件离奇的绑架案至今仍有许多疑问，绑架案的主谋是谁？是否内外勾结作案？巨额赎金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些都已成了难解之谜。

1948年底蓝妮去了香港，1962年与女儿孙穗芬一起移居美国。1986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蓝妮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纪念活动。事后，有关部门安排蓝妮住进了上海锦江饭店，并设法帮她解决玫瑰别墅房产问题。最终，政府决定将复兴西路44弄玫瑰别墅中的一幢归还给她。1990年3月18日，蓝妮搬进了她以前居住的那幢三层楼花园洋房。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



孙科与蓝妮的女儿孙穗芬



玫瑰别墅

户。她居住的那幢花园洋房，墙上终年爬满翠绿的常春藤。客厅面南向阳，布置十分简单，显得很空旷，北墙上是女儿孙穗芬的肖像照，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孙科的合影。透过客厅窗户，就能看到楼下花木葱郁的花园。除了偶尔打几圈麻将，蓝妮最喜欢到花园散步，养养花弄弄草，以寄托对生活的热爱。1996年9月28日，85岁高龄的蓝妮在上海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2011年元旦，孙穗芬在台北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于1月29日下午辞世，享年74岁。

爱庐

在上海繁华却又清幽的衡山路一带，星罗棋布般坐落着为数众多的花园洋房。其中，东平路（原贾尔业爱路）9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住所——“爱庐”，隔壁的7号和11号分别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别墅。旧时所谓的“四大家族”中，孔、宋两家富可敌国，而蒋家虽然权倾一时，却并没有多少私产。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曾经居住过的“美龄宫”，正式名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一度还是前往中山陵谒陵的高级官员休息室，属于公家产业。因过于奢华，经费大大超支，“美龄宫”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作为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名下唯一的房产，只有上海“爱庐”一处，而且这还是婚后哥哥宋子文补赠给她的陪嫁。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大华饭店举行婚礼。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并没有自己的产业，只能借金兰兄弟吴忠信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11号的房子作为婚房。虽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名义上是平民百姓，但毕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况且，这次下野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依然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为了小妹的终身幸福，宋家兄弟姐妹奔波多时，不惜人力财力，总算是风风光光地操办了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婚礼。但新婚夫妇没有婚房，实在太不像样，长期借居他处也不是长久之计。1928年，宋子文通过中介买下了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别墅，作为给小妹宋美龄的陪嫁礼物。

东平路9号爱庐



贾尔业爱路9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花园住宅，始建于1916年，业主是义记洋行大班康福特（E. J. Cornfoot）。义记洋行英文名称为 Cecil Hollidy & Co.，是一家资格很老的英国进出口商行，早在上海开埠之初即进驻外滩商区，大致位于今和平饭店所在之处，后迁至九江路18号。抗战爆发后，义记洋行才宣告歇业，从事对华贸易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房屋易主之后，宋子文委托美商普益公司进行装修，并增建了一些供随从和侍卫使用的辅助楼房。于是，蒋宋夫妇从浙江莫干山度完蜜月回来，即入住贾尔业爱路9号。蒋介石特别喜欢这幢房子，它不仅是蒋宋新婚燕尔的爱巢，其风格又与莫利爱路（今香山路）中山故居非常相似。他将这座房子题名为“爱庐”，与庐山的“美庐”、杭州的“澄庐”列为在大陆最喜爱的三处住所。

作为“党国领袖”，蒋介石公务繁忙，无暇享受私人时光，来“爱庐”居住的日子不多。因在西安事变中不小心摔伤了腰，蒋介石于

1937年在“爱庐”休养了一段时间，由牛惠霖、牛惠生兄弟负责治疗。平时“爱庐”由副官蒋富寿看管，随从和侍卫的生活待遇也颇为优厚。宋美龄常常来此小住，有时还把母亲倪太夫人接来团聚。1932年，宋美龄委托思九生洋行再次对“爱庐”进行扩建。根据宋美龄的要求，不能破坏房屋原有风貌。因此，东面加建的部分与原建筑浑然一体，若不参照图纸根本看不出破绽。可见“爱庐”的女主人宋美龄对于建筑艺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

经过扩建，“爱庐”建筑面积增至660平方米，高两层，由主楼和东西两侧副楼组成。主楼坐北朝南，由造型不一的东、西、中三个单元组成，中间的券门最大，有内廊，布局庄重沉稳。外墙嵌着或黑或白或黄的五彩鹅卵石，屋面是孟沙坡面式的，上面铺着红色的平板瓦，二层的阳台弧度很小，显示了优雅收敛的贵族气质。东部楼下是大客厅兼小影院，可以容纳40余人，宋美龄经常与亲朋好友一起在此欣赏美国电



东平路11号
宋子文别墅

东平路7号
孔祥熙别墅



影，有时还会叫上隔壁孔家的孩子。客厅的布置也比较雅致，柚木的地板，墙上的古画，舒适的沙发，色调也很统一。主楼东侧二楼原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卧室，卧室内用小柚木条拼嵌地板，墙上挂饰十分精致，特别是春、夏、秋、冬四楹花鸟条幅，意境逼真。副楼位于主楼两侧，分别是侍从人员、警卫人员的住所及工作室。主楼南面是一块30余亩的大草坪，刻意散乱铺成的鹅卵石小径尽头就是一泓碧水，与那株高四五丈的雪松遥遥相对，弥漫着幽幽的气息。树丛后玲珑的太湖石假山上，镌刻着蒋介石亲笔所题的“爱庐”二字，历经岁月沧桑，字迹已有些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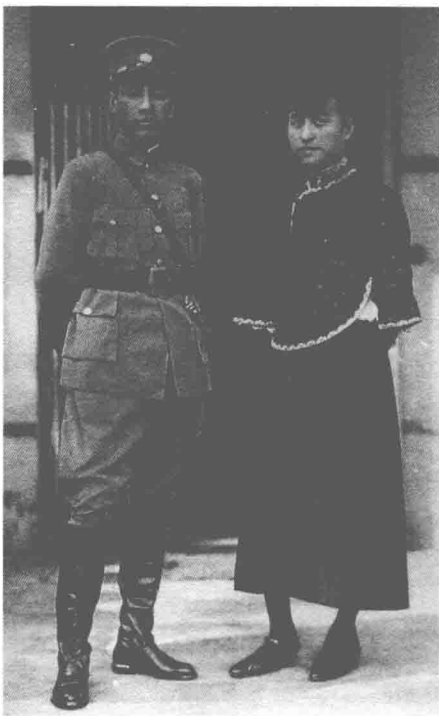
蒋宋夫妇入住后不久，孔祥熙购买了原属于夏老臣公司赫劳森先生（H. Herlofen）的贾尔业爱路7号别墅。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又从特拉华联邦电报公司驻沪代表摩斯夫妇（B. Moss）手中购买了贾尔业爱

路 11 号别墅。郎舅三人成了邻居。当然，孔、宋在上海的产业众多，基本不住在这里，贾尔业爱路 7 号别墅一度还成为美国农业部官员、国民政府农业顾问 C. E. Christopherson 的寓所。新中国成立后，这三处房产作为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1958 年，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迁入东平路 7 号和 9 号。“爱庐”东侧副楼是学校的行政办公楼，主楼东侧二楼原蒋介石、宋美龄的卧室及卫生间，成了附中学生们的练琴房。如今，“爱庐”主楼已出租给公司使用。经历几十年风风雨雨，“爱庐”外观依旧。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幢近代优秀建筑，前几年进行整体修复工程时，全部拆除爬墙植物，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目睹“爱庐”的全貌了。

陈洁如寓所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在此之前9月的某一天，蒋的第二任夫人陈洁如与张静江的两个女儿一起登上了“杰克逊”号邮轮，前往大洋彼岸“考察深造”。陈洁如原名陈凤，系张静江夫人朱逸民闺中密友，后由蒋介石为其改名陈洁如。1921年12月5日，陈洁如与蒋介石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大东旅社举行婚礼，主婚人为

蒋介石与陈洁如



张静江，证婚人为戴季陶，经办者是上海滩著名大律师江一平。此后，陈洁如一直追随在蒋介石左右。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武汉、南昌，两人共同生活了6年，直到1927年陈洁如被迫赴美，才结束了这段婚姻。

在美国居住期间，陈洁如苦修英文，学习养蜂和园艺，终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直到1933年，陈洁如悄然回到上海，入住法租界吕班路巴黎新村，即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开始了不为人所知的隐居生活。巴黎新村属于新式里弄，占地面积6.7亩，有混合结构三层楼房31幢，分别建于1912年至1936年间，建筑面积总共5624平方米。在上海，达官贵人或大买办、民族资本家一般都住在偏远西郊的花园洋房，而那些下野政客、当红演员、文人墨客则更喜欢住在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新式里弄或条件较为优越的石库门住宅。一方面租金相

对便宜，生活环境更为便利，大隐于市也不显得那么招摇。陈洁如回国后，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因此选择了相对比较僻静的法租界巴黎新村。

抗战期间，一次尴尬的偶遇打破了陈洁如隐居生活的那份安宁。1941年12月中旬，陈洁如与弟媳庞定贞一同前往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不料在电梯中遇见了陈璧君与褚民谊。陈洁如与陈璧君在广州时常有往来，也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陈璧君当即请陈洁如去对面的汇中饭店叙旧，劝说她出任伪侨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洁如为了摆脱陈璧君的纠缠，秘密逃离上海，辗转前往重庆。据说，陈洁如在重庆期间一直住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公馆。因离蒋介石官邸不远，无聊媒体捕风捉影，谣言四起，一度还引发了所谓的“陈小姐事件”。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洁如回到上海巴黎新村，与女儿陈瑶光两人相依为命。早年在广州，何香凝在参观平民医院时收养了一名女婴。陈洁如和蒋介石婚后一直没有生养，她看到这名女婴长得圆脸大眼十分可爱，就恳请何香凝割爱相送。后来蒋介石为女孩起名蒋瑶光，蒋陈关系发生变化后，女孩跟随母姓改名陈瑶光。1946年，陈瑶光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陆久之结婚。其实，这位国民党少将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成了蒋介石的“驸马爷”，这重身份为其从事革命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陈洁如待人谦和，一向尊重蒋介石的结发妻子毛福梅，姐妹两人私交甚好。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上海万竹小学读书时就由陈洁如负责照顾，她还拿出私房积蓄资助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因此，蒋经国曾



陈洁如寓所

位于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寓所

多次与俄国妻子蒋方良一道来巴黎新村探望这位“上海姆妈”。

新中国成立后，陈洁如被推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没想到，陆久之受潘扬案的株连，于1955年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61年12月，陈洁如受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前往北京，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对于陈洁如一向颇为尊重，尊称其为师母。1962年6月，陆久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提前恢复自由，1980年撤销原判彻底平反。1962年，经周恩来总理特别批准，陈洁如赴香港定居。在蒋介石的影响下，陈洁如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定居香港期间，她有过撰写回忆录的念头，后在台湾当局的干涉下，陈洁如再次选择了沉默。1971年2月21日，陈洁如在香港百德新街寓所

位于上海青浦福寿园
的陈洁如墓



病逝，享年66岁。由于对往事守口如瓶，陈洁如在香港所结识的一些朋友，几乎无人知道她曾经是“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黄埔军校校长夫人。后来坊间流传的《陈洁如回忆录》，曾在海内外政界、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书中“蕴藏着很多外界不知的第一手史料”，即使“偶有小疵，然瑕不掩瑜”，价值很高。也有不少学者质疑此书，杨天石认为“其中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可能真实性大，而回忆政治大事部分可能真实性小”。各方人士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陈洁如回忆录》真伪与否已成难解之谜。

相传，1962年蒋介石私下委托戴季陶之子戴安国转交陈洁如一封亲笔信，称赞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风

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病逝之前，也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陈洁如赴港之后，女儿陈瑶光、女婿陆久之一直住在上海重庆南路169弄8号。陈洁如去世，陈瑶光被批准赴香港奔丧，从此定居海外。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上海病逝，享年106岁。2002年，陈瑶光为实现母亲叶落归根的夙愿，将陈洁如的骨灰从美国迁移至上海青浦福寿园安葬。

附

蒋中正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端此奉复。

——《申报》1927年9月28、29、30日

逸 村

1948年是上海人民苦难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庞大的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减。印钞机不停运转，法币迅速贬值，物价已是1937年上半年的600余万倍。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国民党政权决定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的比例兑换法币，并限期回收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汇。此次币制改革的目的是，只是为了彻底搜刮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和美钞，暂时缓解政府财政危机。为此，蒋介石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专员，蒋经国为副专员，以推动金圆券的发行工作。同时，蒋经国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即打击日益猖獗的贪腐、投机、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刑乱世，用重典”，必须“借人头祭旗”以化解民间的积怨。

1948年8月10日，蒋经国带着夫人蒋方良和儿子蒋孝文、女儿蒋孝章，入住林森中路逸村2号。逸村共有8幢独立的花园住宅，建于1942年，占地总面积4893.36平方米，建筑面积4267平方米。蒋经国居住的逸村2号，坐北朝南，总高三层。外墙系水泥砂浆，局部装饰为西班牙建筑风格，如连续的小拱券、门窗上铺设的筒瓦、弧形或直线形檐口、阳台栏杆处镂空绿釉花饰以及绞绳柱等。部分转角窗间的平行横条纹则体现了装饰艺术派的特征，屋顶平台和铸铁栏杆又受到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主楼门厅设计构思巧妙，精致紧凑，二楼朝南设置敞廊和阳台，特别适合上海温润潮湿的气候。宅后为辅助用房和汽车库，楼前小花园

内种有法国梧桐、香樟以及黄杨、龙柏、广玉兰等树木。底层客厅布置极其简单，中间一张长台餐桌，围有几只圆凳，南墙上悬挂着蒋介石全身肖像，一排半新不旧的沙发靠墙摆放。客厅东侧是随从人员的办公室。厨房和餐厅设在底层的后部，中部为楼梯间。二楼是蒋经国的卧室和书房，西侧一间是他的办公室。三楼则是员工的起居室和贮藏间。

蒋经国早年即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又常常在苏联留学工作，忧患和苦难长期陪伴着他。回国后，尽管贵为“太子”，但他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这在国民党官二代中极为罕见。派儿子来上海“打老虎”，既是蒋介石对直系亲属的信任，也与蒋经国的清廉形象有关。来到上海以后，蒋经国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早晨6点起床，适当锻炼后开始进餐，无非是稀饭、油条等简单的食品。8点钟，准时前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班。休息日，他也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逛逛公园，有时也在外面餐馆改善一下伙食。

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宣布冻结物价指数，任何商品一律不许涨价。同时，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配合军警查抄不法商贩，“打虎运动”逐渐拉开了序幕。此次“打虎”，蒋经国的矛头直接指向荣德生民族资本集团、杜月笙帮会集团和军统特务集团。民族资本一向是国民党政权压榨的对象，而帮会和军统组织相互勾结，大肆走私贩私，已严重危害到了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也是蒋经国重点打击的对象。9月24日，与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套取外汇被枪决，蒋经国首开杀戒。随后，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米商万墨林，甚至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纷纷被捕，上海工商界被抓者总共有60余人。



在上海“打老虎”期间的蒋经国



庭审杜维屏（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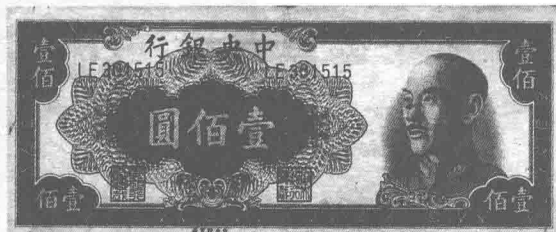
杜维屏以囤积纺织物资的罪名被捕入狱，彻底激怒了在上海滩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杜月笙。随着租界的收回，蒋介石对帮会上层人物逐渐冷落，甚至加大了对黑势力的打击力度。为了保护爱子，更为了出这一口恶气，杜月笙向政府部门揭发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破坏经济的不法行为，这使得蒋经国陷入了尴尬境地。孚中公司创办于1945年12月，由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和金城银行按照3：2：1的比例投资，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任总经理。孚中公司成立之后，取得美国伟力斯汽车公司、西屋电器公司等12家企业的商品独家经营权，大量进口吉普车、发电机和其他水电设备。扬子公司创办于1946年1月，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独资经营，垄断了海外10余家药厂、钢厂在华代理权。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利用权力，以国外分公司委托上海总公司代销售佣的办法，转移国内资金，偷税漏税，逃汇套汇，获取暴利。尽管蒋经国也查封了孔令侃的公司，但他不得不面对来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压力。孔令侃象征性地交了一笔罚款，然后经由香港转赴纽约，轻轻松松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王春哲挨了枪子，杜维屏暂受牢狱之灾，孔令侃却毫发未损，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很快被舆论讽刺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不久，政府宣布取消限价，物价犹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顿时成了一堆废纸。即便没有扬子公司案，所谓的“上海打虎”也会因币制改革的必然溃败而前功尽弃。1948年11月5日，蒋经国获准辞去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一职。11月29日，调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

主任委员，但他一直没有到任，而是陪着蒋介石从南京到溪口，再到上海、舟山，最后黯然离开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林森中路改名淮海中路，逸村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职工宿舍。1994年，逸村被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1997年春，一名台商买下了逸村2号，作为私人住宅。2003年8月18日，蒋经国旧居被徐汇区文化局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迅速贬值的金圆券



逸村

附

敬告市民书

蒋经国

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我决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同时也决不因遇着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上海往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今天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这里我并非想求得市民的原谅，而是表明自己对市民应负的责任心。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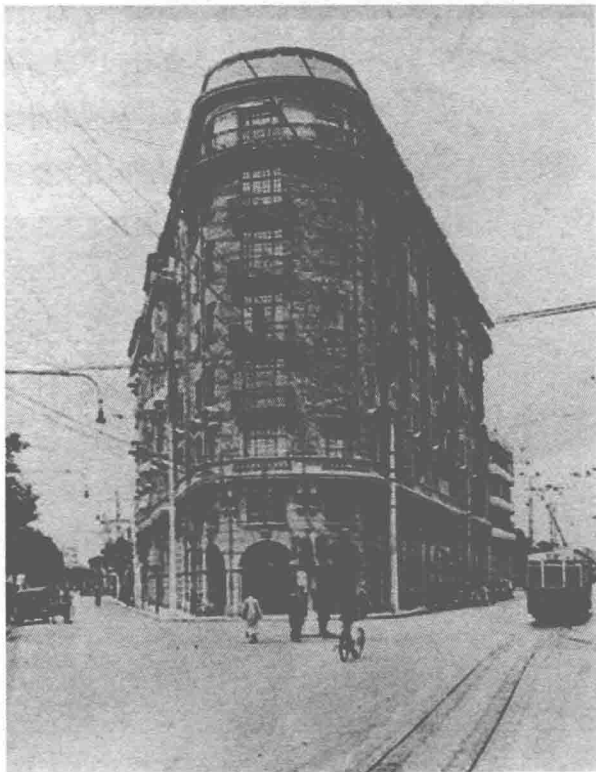
——《申报》1948年11月2日第5版

诺曼底公寓

孔家富可敌国，在上海拥有很多产业。据说，抗战胜利后孔令伟（又名孔令俊）斥巨资买下了上海西南角著名的诺曼底公寓，还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由于就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1803号宋庆龄寓所的对面，孔令伟抽空也会去探望二姨，有时不经通报径直就往楼上走。那么，诺曼底公寓真的是孔家名下的房产吗？声名显赫的孔二小姐是否真的就是诺曼底公寓的大房东？

诺曼底公寓原名I·S·S公寓，后改名东美特公寓，位于今淮海中路、武康路、余庆路、天平路、兴国路组成的六岔路口的东北角。早在20世纪初期，这里是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路面整洁，绿树成荫，一座座漂亮的小洋房点缀其间，显得格外幽静。当然，能够居住于此者非富即贵，都是有一定身份的外籍富商或官员。随着租界人口的迅速增长，那些一夜暴富发了财的外侨，以及在市政机构或贸易洋行里任职的高级雇员，也希望能住在远离市中心的西区，以摆脱城市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显然，带有私家

诺曼底公寓





孔二小姐孔令俊

花园的独栋别墅已无法满足外侨的居住需求，也不符合房地产商的利益。于是，外表豪华气派内部设施先进的公寓大楼逐渐成为住宅建筑的主流。

1924年，万国储蓄会下属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购入霞飞路、福开森路（今淮海中路、武康路）口一块土地，委托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由法商法华公司负责建造公寓住宅。霞飞路和福开森路交汇处呈 30° 锐角，于是邬达克因地制宜，将大楼的平面设计成三角形，并在大楼北面开了两个口子以解决采光和通风问题。整座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总共8层，高30米，占地1580平方米，建筑面积9275平方米。建筑立面为法国文艺复兴式样，又有点接近古典主义风格。公寓一、二层为水泥仿石墙面，使之成为大楼的基座。自三层起至七层，外立面改用咖啡色耐火面砖镶砌。最顶层的第八层仍然使用水泥仿石墙面，因此大楼呈现三个不同区段。在大楼的三层与顶层设有外廊式通道，四至五层纵向有几组外挑式阳台，强化了建筑的层次感。大楼底层为商铺用房，由于人行道不宽，特意将南面沿街处建成骑楼式连拱外廊，既节约了土地资源，又方便了行人的通行。大楼三层以上为标准公寓，户型组合灵活，有一室户、二室户、三室户、四室户等，总共63套居室，另有30多间佣人房，基本为朝南房间。每个单元的厨房和卫浴一般安排在北侧，卫生间内部设有专门的通风道。大楼内部设施先进，除回旋式楼梯以外，还有客用、货用电梯共三部。因雄踞马路一隅，大楼在视觉上显得更为宏伟气派，从西面望去，就像一艘昂首驶向前方的巨轮。

作为上海最早的一批现代化高层公寓，当时的住户一般都是中上层外侨。根据1937年字林洋行出版的《行名录》记载，当时居住于东美

特公寓的有嘉第火油物业公司销售总代理、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西门子上海公司经理等一大批外商洋行高级职员。为了满足更多外侨的入住需求，1930年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公寓东侧新建了一栋高五层的大楼，另在福开森路建造了公寓的汽车库和附属用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在沪企业被日军接管，侨民被关入集中营，不久又被分批遣送回国。东美特公寓三分之二以上的住房空置了，仅有一小部分被日伪当局分配给官员居住。抗战胜利以后，为纪念盟军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成功开辟第二战场，东美特公寓改名为诺曼底公寓。与此同时，万国储蓄会因战时遭受严重损失，已无力清偿以往欠下的债务。1946年，万国储蓄会宣告破产，其名下产业部分由上海市政府出资购买，其余对外公开拍卖。诺曼底公寓即属于政府出资购买的产业，大部分套房分配给公务员居住，也有一部分对外出租。当时上海的敌伪产业和政府产业，大多由属于“四行二局”系统的中央信托局管理。孔祥熙长期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其子女与“四行二局”关系密切，均可在这些单位发号施令。尤其是中央信托局



诺曼底公寓底楼大堂地上保存完好的徽标

运输处，孔二小姐简直就像“太上皇”，设有专门的办公室，可以任意调动数百辆卡车。有了这层关系，孔二小姐能够入住诺曼底公寓，又被误传为大楼的业主，也就不足为奇了。新中国成立后，诺曼底公寓作为官僚资本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更名为武康大楼。

1945年底，有“东方第一母亲”之誉的电影演员吴茵搬入公寓。此后，王人美、郑君里、应卫云、赵丹、秦怡等文化演艺界名流相继入住，武康大楼成了一座洋溢着浓厚文艺气息的“电影之家”。1968年，著名演员上官云珠从七楼走廊纵身跃下，上演了“文革”期间上海最为惨烈的一出悲剧。1977年，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与夫人王文娟一同住进了新武康大楼，即建于1930年的那栋五层高新大楼。据说，他们的寓所恰恰就是当年孔二小姐的闺房。

附

孔二小姐突然来访

陆天麟

夫人平时非常平易近人，对人很友好，坦诚相待。有一次，孔二小姐来探望夫人。平时有客人来，都是我事先通报的，那天我不知道来客是孔二小姐，她也不太礼貌，我请她在会客厅休息，她理也不理径直朝楼上走，我想她可能是夫人的亲戚。后来她下楼时，我想你不理我，我也没必要理你，要走就走吧！没想到她临走时主动对我说：“陆先生再见！”我心里觉得奇怪，想你怎么知道我姓陆？

过了几分钟，李妈下楼来了，李妈对我说：“陆先生今天有点委屈你了，不要不开心。”

我说：“怎么回事？”

李妈说：“刚才那位是孔二小姐，她上去后问楼下是谁？夫人告诉她，‘陆先生是我的朋友，你要客气点’。现在她知道了，因此对你也客气了。”

这种事虽小，却从中看出了夫人的为人，让人心里非常感动。

——转引自陆天麟等口述，王志鲜、段炼整理《品质高洁 唯菊与石——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代史资料》2009年第1期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窃取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此时的上海，人口已逾300万，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和最大的港口，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极为重要，但在行政建置上仍只是隶属于沪海道尹的一个县。7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1次会议修正通过了《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决定析上海县的19个市乡、宝山县的8个市乡、松江县的莘庄乡和南汇县的周浦市，组建上海特别市。南京国民政府还专门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宣布上海特别市直属中央，不入省、县行政范围，是为上海设市之始。

1927年7月7日上午，上海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首任市长黄郛宣誓就职。上海特别市政府在丰林桥原松沪护军使署办公，下设秘书处和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社会、土地、港务等局及市参事会。成立伊始，特别市政府立即接收了沪北工巡捐局、上海市公所、上海县清丈局、浦东塘工善后局等市政机构，一举解决了以往华界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局面。至1928年底，上海特别市实际接收沪南、漕泾、法华、蒲淞、闸北、引翔、殷行、吴淞、江湾、彭浦、真如、高桥、陆行、洋泾、塘桥、杨思、高行共17市乡，改为17个区，占地494.67平方公里，确立了市、区两级行政体制。



上海特别市政府旧址

上海设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上海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上海人民要求改造华界、振兴华界、赶超租界并最终收回租界的美好愿望。可是，由于原松沪护军使署场地狭小，只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古应芬等少数几位嘉宾应邀出席了市政府成立庆典。而且，护军使署没有礼堂，庆典仪式也只能在楼下露天庭院里举行。显然，继续以丰林桥地区作为上海的政治心脏，这与其中国“第二首都”的地位并不相称。有鉴于此，上海特别市成立伊始所制定的“大上海”建设计划，即把在江湾五角场建造新市府大厦放在首要地位。

提到丰林桥畔的松沪护军使署，还得从当年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皖系将领何丰林说起。何丰林，字茂如，山东平阴人。历任陆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第八旅旅长、淞江防守司令、浙江嘉湖镇守使。1919年，

皖系军阀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这一年，他在肇嘉浜南岸小木桥与东庙桥（今肇嘉浜路东安路口）之间，用低价强行购买西毛家宅民田 106 亩，兴建了淞沪护军使署。为了出行方便，何丰林在护军使署大门前修筑了一条署前路（今平江路），又在护军使署西面修筑了一条柏油马路，并于马路北端建造跨越肇嘉浜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以其名字命名为丰林路和丰林桥。1924 年，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败北下野，何丰林加入奉系，前往北方发展。此后，丰林桥畔的松沪护军使署逐渐成为沪海道尹兼上海通商交涉员公署的办公场所。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为消除旧军阀统治遗留的影响，肇嘉浜上的丰林桥于 1928 年改名为枫林桥，丰林路改名为枫林路。原淞沪护军使署门前那条署前路，也相应地改名为市政府路。1933 年 10 月，位于江湾“新上海”中心的市政府新厦落成。第二年元旦，上海市政府迁入新址办公。可惜好景不长，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当日市政府即迁回枫林桥原址，直至 11 月上海华

界全部沦陷。1943 年，英、美等国与国民政府签订协议，宣布废除在华特权，交还租界。这样一来，以赶超租界为目的的“大上海计划”已无太大意义，未来的上海市政府也没有必要设在偏远的江湾地区。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随即在汉口路江西路转角处的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办公。因此，加上 1927 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设在原县署（今蓬莱路 171 号）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解放前作过上海市政府的地方有四处。其中，唯有枫林桥畔的原松沪护军使署那栋小楼曾经两次成为国民党上



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

海市政府的办公场所，而且第一次从1927年到1933年底长达近七年之久。

1930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枫林桥设立发报台，担负国际电报业务。上海市政府迁往江湾新市府大厦后，原淞沪护军使署成为枫林桥发报台的办公楼。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枫林桥国际电台。1957年2月，上海市邮电管理局设立电信研究所，所址即设在平江路48号原淞沪护军使署那幢小楼内。1965年3月，上海电信研究所归属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领导，成为邮电部第一研究所。1998年，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组建信息产业部，该所更名为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



蒋介石（右）与黄郛在日本留学之际的合影

附

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27年7月7日)

今日，政府特派中正为代表，参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黄膺白同志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各同志以为未免大才小用。以黄市长之才识、学问、经验、资望论，诚不免为大才小用，但政府则不以为然。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因是，政府特请黄膺白同志担任市长，以负此重大责任。所以希望非普通的上海，将来经黄市长办理后，不仅成为中国各地之模范，并当依照总理《建国方略》之计划，一一实行之。总理曾有两大计划：一、海都；二、陆都。海都为南京，陆都为新疆。如照先总理之理想实行，由南京至新疆，应先造一长铁路，两旁另造汽车道。如是，则无论政治、经济，均须由上海建设起来，方可逐渐实行。但要达到目的，非非常有学问人所能做到。所以，一定要黄膺白先生担任，才有希望。并且总理生前，时时谈起黄市长之为人，称为吾党有数人物，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事事真知灼见。于此可见总理对于黄市长之期望甚大。但期望大，则责任亦重。今膺白先生屈就市长，政府切望黄市长能达到总理之远大规划，使上海成为各商埠之模范，以此根据地，为《建国方略》之发轫点。所以责望于黄市长者，可谓甚重甚远。黄市长定能依照政府希望，一一做到。上海特别市，中外观瞻所系，非有完善之建设不可。如照总理所说办理，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备。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且亦阻止不了。所以，上海市之成绩，关系内外至大。但此事非一二人材力所能办到。黄市长之学问、经验、资望，都很钦佩的，无庸多讲。但欲真正达到目的，必须市民、团体、机关，同心协力，帮同市政府，照预定计划做去。如是，则无论有何困难，自然不难制胜。如要使上海变为一个独立的完备的特别市商场，须得群众负起责任来。要知此非黄市长一人之事，乃全国之事，对于外交、财政、军事均有关系。并可以说，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不能不切望全体同志，联合起来，协助建设。黄市长一定能达到政府之希望，政府信之不疑。所以，关于上海特别市用人、行政，以及凡在上海特别市范围内之一切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凡百事项，政府均交由黄市长全权处理之。切望全体市民及各机关同志，了解此意，时时为黄市长之臂助，俾竟全功。

——《申报》1927年7月8日

虹桥高尔夫球场

孙、宋两家和中国的航空事业有着不解之缘。1917年2月17日，孙中山与宋庆龄来到江湾跑马场，观看美国女飞行员斯廷森所作的飞行表演。1923年初，广东革命政府设立航空局，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飞机制造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自行设计生产出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并以宋庆龄英文名字 Rosamonde 的译音命名为“洛士文号”。7月，“洛士文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试飞，孙中山和宋庆龄亲临现场，宋庆龄还亲自坐上飞机试飞，成为首位翱翔在蓝天的中国女性。试飞成功后，孙中山题写了“航空救国”四字以资鼓励。1932年，国民政府将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由蒋介石亲任委员长。1936年，宋美龄出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成为执掌中国空军的实权人物。

1929年，孙科以铁道部长的身份与美国飞机制造商柯蒂斯·赖特洽谈，合资成立中国航空公司，由孙科兼任公司董事长。孙科素有冒险精神，他曾亲自乘机从虹桥高尔夫球场起航，勘测由上海至南京的第一条航线。当时，执行勘测任务的都是小型飞机，连驾驶员在内，仅有两个座位，上面还没有篷盖，十分简陋。结果，这位“党国要人”不顾亲友和下属的反对，坚持乘坐这架小飞机，历经两个小时的飞行，一路艰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南京。经过此次勘测，是年7月8

中国航空公司的
圆形登机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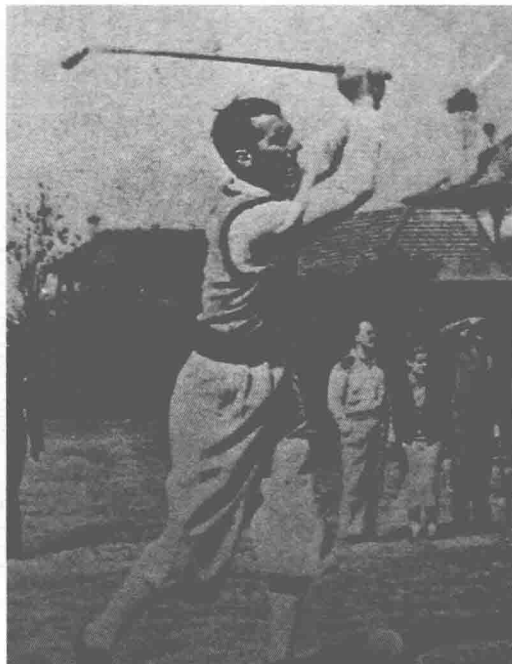


日，上海民用航空史上第一架正式航邮班机，从虹桥机场起飞首航南京。

虹桥机场离虹桥高尔夫球场不远，始建于1921年3月，是上海第一个民用机场。1920年，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拟定一项全国航空线计划，决定先行筹办京沪航空线。因此，航空事务处派员勘察了虹桥路西端上海县与青浦县交界处，圈地267亩，辟建民用机场。1921年6月，机场竣工，但京沪航空线的班机仅试航至山东济南，便无力展航上海，虹桥机场建成之后即成虚有其名的荒芜之地。此次孙科的南京之行，实为勘测航线的试飞，驾驶的又是小型飞机，因此没有必要在虹桥机场起航。而且，早期一般的小型飞机并不需要专门的机场，往往是在一些空旷的场

地上起降的。例如，1911年，法国人环龙携带三架苏姆式双翼飞机抵达上海，5月6日从江湾跑马场起飞，计划在上海跑马厅降落。可惜，因飞机发生故障，降落时不幸机毁人亡。1912年，曾在英国学习飞行的厉汝燕，驾驶爱特立克型单翼飞机在江湾跑马场作飞行表演，首创国人在上海的飞行纪录。虹桥高尔夫球场离虹桥机场不远，面积广阔，地势平整，完全可以起降小型飞机，因此被中国航空公司选为勘测试航之地。

虹桥高尔夫球场的前身是英侨于1900年在程家桥西侧辟建的老裕泰马房，占地面积20余亩。1914年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等8家英商购买了这块土地，1916年成立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用地扩展至约150亩，1930年又增至417亩。虹桥高尔夫球场设有9洞孔道，场内建有各种地面建筑，雇佣华工30余人。上海沦陷期间，球场由日军占用。抗战胜利后仍由虹桥高尔夫球俱乐部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收归国有，1953年英商业主自愿将俱乐部建筑物折价卖给人民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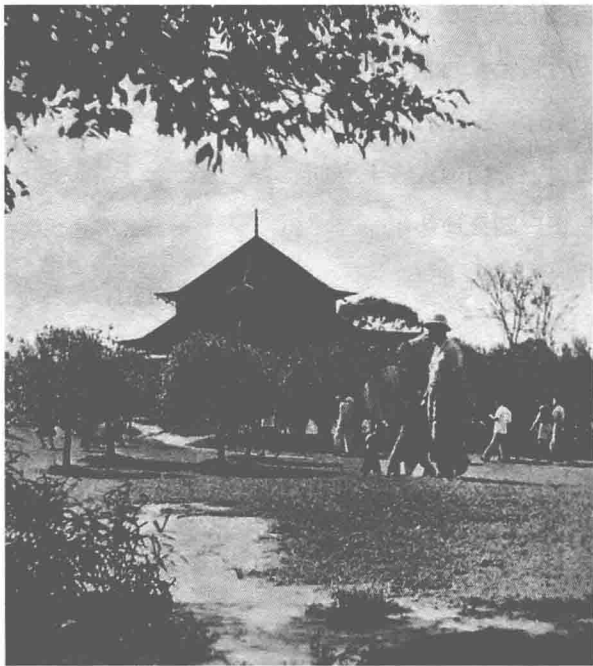
虹桥高尔夫球场

正在打高尔夫球的外侨

1954年5月25日，虹桥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公园，正式对外开放。6月，国务院准备将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献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头大象交给上海饲养展出，可当时上海还没有专门的动物园。8月，上海市工务局邀请在京的苏联莫斯科动物园主任等专家来沪指导工作，并选择上海动物园园址。苏联专家踏勘了西郊公园、龙华苗圃、华泾长桥镇三处，最终决定将西郊公园扩建为动物园。

上海动物园将展览、生产、科研、科普合为一体，规划总面积2000亩。后几经反复，实际园区面积为1055.7亩，建成了天鹅湖、狮虎山、熊猫岭、野牛山、鹿苑和百花厅等一系列动物馆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建国5周年，1959年上海动物园举办“百花齐放”展览会，初步形成了大型综合性动物园的面貌。此后，又陆续兴建了长颈鹿馆、海狮池、雉鸡园、小兽笼、斑马房、金鱼廊、鸣禽馆、企鹅房、鸵鸟房、猩猩馆、河马馆、袋鼠房、犀牛房等，笼舍建筑面积已超过一万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虹桥
高尔夫球场被改造为
西郊公园



鉴于早期建造的笼舍大多陈旧破损，上海动物园于1989年和2000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建。如今，动物园占地面积约74公顷，饲养展出各类稀有珍贵野生动物400余种。其中有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扬子鳄等我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还有大猩猩、非洲狮、北极熊、南美猯等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动物。园内种植树木近600种10万余株，尤其是约10万平方米开阔的草坪，基本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虹桥高尔夫球场的地形。上海动物园以其优美的环境和展出面貌、优良的服务吸引了大批游人，是沪上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今上海动物园大门

附

《八十述略》(节选)

孙 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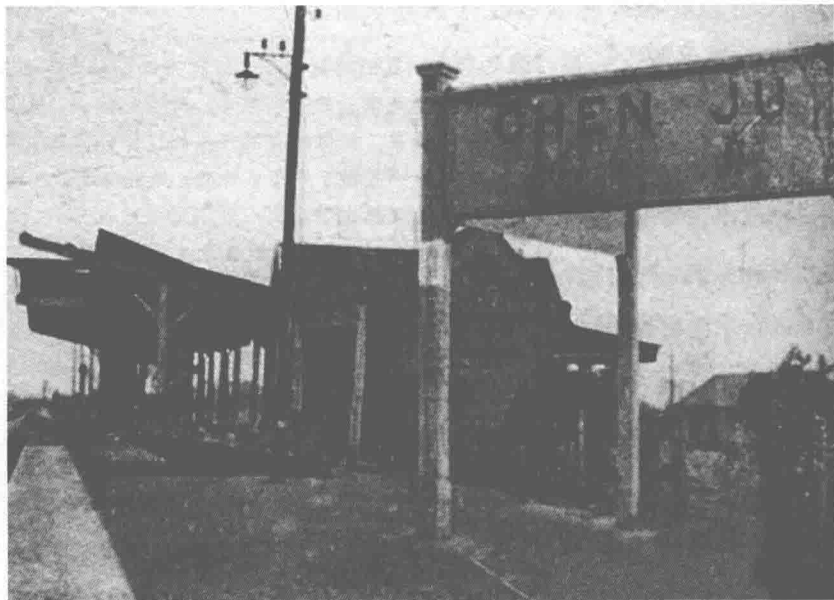
我们约好上午8时在上海虹桥的高尔夫球场起飞，除了一位机师，我算是唯一的一个乘客。开动的方法，是要机师自己到飞机前头去搅动螺旋桨，好像现在的汽车抛了锚，驾驶员拿铁棍在车子前面拨动引擎一样。一直搅了一个多钟头，还没有发动。这时内子和几个朋友都已赶到，认为飞机出了毛病，11月的天气又不好，冒这样的危险不值得，劝我作罢，我则坚持事情既已约定，不能半途而废。果然将近11点钟时，螺旋桨被搅动了，我和飞机师便爬上去，他前我后的坐定冉冉上升。

起飞以前，我问机师晓不晓得路线？他说没有去过。问他有没有带地图？他说只有一本简单的邮政地图；同时反问我往哪里走？循甚么路线走？我说下面这一条河就是长江，你最好沿江由东而西。他又说如果到了南京，请我告诉他，幸好这条路我很熟悉，不然，盲人瞎马，真不知会闹出甚么乱子来呢！我告诉他将到南京时，有一座高约一二千公尺的山，飞越这个山，可以看到一座大城市，就是南京。城东有一块空地——明故宫球场——可以降落。侥幸之幸，总算平安到达了目的地。

——转引自沈飞德：《民国第一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真如火车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党政军要员平时在南京办公，每逢周五即乘火车赶回上海，与家人一起享受周末的休闲时光。位于闸北的京沪铁路上海北站，客流量过多，安全问题堪忧。尤其是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北站遇刺事件发生后，政治形势更趋紧张，因此一些政要会在临近上海的小站提前下车。孔祥熙常常往来于京沪两地，一般都选择在西郊的真如火车站下车，然后换乘小汽车，沿着中山路过苏州河，回到位于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寓所。



民国时期的
真如火车站

真如为佛教术语，意为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成唯识论》卷九称：“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异。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元延祐七年（1320年），妙心和尚将原设于官场的真如院迁建于嘉定县依仁乡桃浦河畔，请额改名为真如寺。因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寺庙香火旺盛，周围渐成集市，遂以寺得名为真如镇。清雍正三年（1725年），真如镇改属宝山县。1927年，设立真如区，划归上海特别市管辖。

1898年，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准许英商出资承办上海至南京之间的铁路。1905年沪宁铁路开工，三年后全线竣工通车，较之借款合同缩短了两年工期。沪宁铁路从上海站到南京下关站全长311千米，均采用国际标准轨距，沿线设置37个车站。其中，真如车站位于真如镇北1.5千米处，是一座仅有两股轨线的四等客货小站，只有简易票房、候车室、站台等设施，孤零零地矗立在农田村宅之中，俗称“小炮台车站”。1907年农历九月九日，真如车站正式对外营运，上下旅客不多，但因地僻车少易于保安，重要专列停靠颇多。随着真如车站的开设，位于上海、嘉定、宝山交界处的真如地区更趋繁盛。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后，车站前又相继辟筑了连接真如镇街市及附近农村的车站路（今桃浦路）、三民路（今三源路），铁路沿线开始有工人居住。1935年起，上海北站与南翔站之间行驶柴油火车，俗称“小火车”，中设真如、江桥两站，每天对开6班，主要供铁路职工上下班之用。

1921年2月，暨南学校商科由南京迁至上海。校董会鉴于真如地区水陆交通便利，决定在沪宁铁路以北勘定200余亩土地兴建新校舍。暨南学校迁入后，不仅兴建了暨南新村，还修筑了暨南路（今新村路）、交通路、桃浦西路等马路，真如境北杨家桥一度形成较大集市。1927年暨南学校改名国立暨南大学，真如时期是这所著名华侨学府的鼎盛

20 世纪 60 年代
的真如火车站



期。1937 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暨南大学校舍被毁，学校内迁福建建阳。1938 年，侵华日军占据真如火车站，并将曹真路（今曹杨路）延伸至车站以南。1944 年，日军修筑真如站到上海西站的铁路支线，用以连接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真西支线与沪宁铁路交汇成“人”字形，贯穿真如镇区，真如车站货运业务更为繁忙。同一年，又自车站向南辟筑军用物资储藏和转运基地，真如车站范围进一步扩大，劳动力需求大增。此后，在真如车站东南一带，沿铁路来到上海的苏北籍贫民聚居于此，逐渐形成一个以简屋、棚户为主的住宅区。

新中国成立后，真如车站的物资转运功能日益增大。1953 年起车站先后铺设 9 条专用线和 3 条站线，1957 年后又在车站以北建造了较大规模的太平桥货场和石泉路货场，1958 年开始承办由上海东站转来的集装箱运输业务。随着货运量的增长，月台、雨棚、仓库等设施陆续增建，行吊、门吊、电吊等各种起重装卸设备齐全，真如车站逐渐成为上海铁路枢纽的主要货运站。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环绕车站形成了居

民密集、商肆较为集中的市集。自1984年10月起，部分简屋、平房拆迁，四周道路拓宽，并兴建了车站广场和车站新村，附近原有居民点亦增建新式工房，真如站周边面貌大为改观。

1981年，为减轻上海老北站的客运重负，真如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1982年升级为一等客货运站。1984年起，开始办理客车始发和终到业务，并建成全新的客运站屋。1989年1月，原铁路上海西站改名长宁站，真如站改名上海西站。由于地处沪杭铁路外环线和沪宁铁路交汇点，北上南下途经上海的旅客列车大部分要由上海西站折返，因此西站一度成为上海地区第二繁忙的铁路车站。但是，作为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火车站，上海西站已逐渐无法适应中国铁路大提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1987年12月28日，上海铁路新客站正式启用，日到发能力比老北站时期翻了一番。2006年7月1日，位于徐汇区老沪闵路的上海南站对外营业，作为沿沪杭线方向的旅客列车始发站，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南下客流，西站开始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直到2009年，总投资40亿元的真如铁路西站交通枢纽改造工程开工。2010年7月1日，沪宁高铁正式通车，上海西站重启客运业务，承担沪宁线方向部分普速列车、城际列车、高速列车的到发和停靠，每年客流量最高可达1亿人次。如今，西站已打造成为集合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和市内公交于一体的现代化交通枢纽，真如地区也早已成为上海西区的城市副中心。

如今的上海西站



中央运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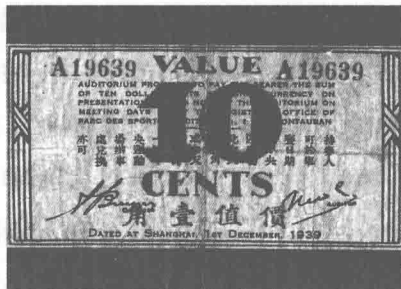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经济濒临崩溃。为摆脱困境，行政院于8月19日发布命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并在上海、天津、广州三地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处，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出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发动了一场“打老虎”运动。9月12日，蒋经国曾于上海市体育馆召开青年军联谊会大会，发表了《上海往何处去》的主旨演讲。那一天，馆内馆外人山人海，马路交通阻塞，上海广大市民对蒋经国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肃清贪腐，解除民众疾苦。



回力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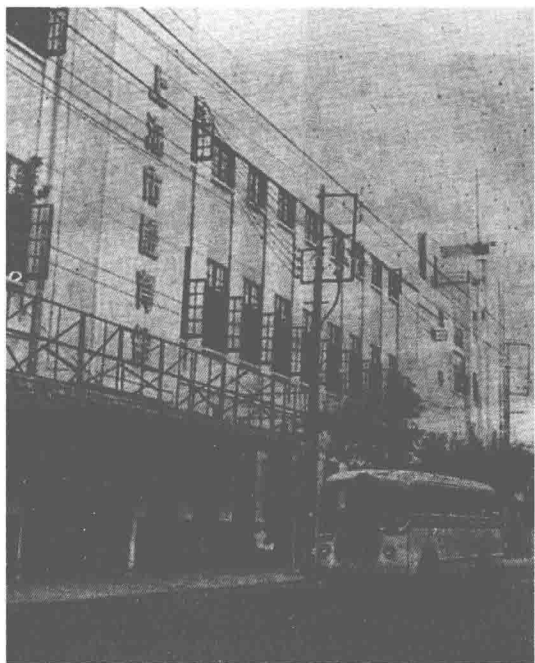
中央运动场发行的代价券正面



中央运动场发行的代价券反面

上海市体育馆，位于今陕西南路、淮海中路转角，原本是法租界赫赫有名的回力球场。回力球，也叫古巴斯克球，本来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山区人们玩的一种游戏，他们以峭壁为墙，向其掷球弹回对接。后来这种游戏逐渐流传到地中海沿岸国家，1928年传入上海，成为一种室内运动。1930年，回力球场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落成开放，并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中央运动场”。整个球场为长方形，长53.7米，宽12.2米。顶部装满照明灯，前、后和左面都是坚实的石墙，右面是高齐屋顶的大铁丝网，网外是观众的座席。比赛时，一般由两个球员对打，一方球员将球发向前墙，球落地后弹起，由另一方球员接住，还击前墙，失手即输一分。前墙和地面上划有界线，球员向前墙发球必须打在界内，球弹回落地也要在界内。回力球员如同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誉。中央运动场的回力球员大多来自埃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古巴等国家。

表面上看，中央运动场是一处打球的运动场所，但实际上却是上海滩最大的赌窟之一。开赛之前，有六个球员，分别穿着红蓝白黑黄绿彩衣，编成号码。观众自行下注，根据比赛结果，凭博赛票领取“彩金”。所谓“彩金”，是球场吸引观众上钩的诱饵。球场老板聚赌抽头，七折八扣，即或下注得中，彩金也是微乎其微的。据上海掌故专家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的记载：“在场中表现球艺的运动员，他们正如马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运动场一度成为上海体育馆

中的马一般，绝对要听主人的安排，不许有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每一场必须依照主人所预订的号码打出来，这就是他们发挥技巧之处。”自从球场经营者与球队订立合同后，对外往来均使用球队承包人海阿拉（Hai-Alai）的名义，因此 Hai-Alai 成了中央运动场的代称。而上海人出于对赌窟的憎恶，习惯把它叫作“害阿拉”。

回力球场每星期比赛时间安排如下：星期五晚上 9 时、星期六晚上 9 时、星期天下午 2 时半和晚上 9 时各赛一场，每赛 11 盘。开始时，球场生意清淡，因为上海人对这种赌博方式比较陌生。球员又都是外国人，薪水高，开支大，经营一度出现亏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

海租界成为有钱人的避难之所，法租界因空屋较多，一时间挤满了达官显贵、商豪富贾及公子小姐。这些“上流社会人士”哪能耐得住寂寞？于是，球场老板暗中疏通法租界当局，放任偏袒中央运动场的赌博活动，于是回力球场生意日见好转，曾创下一个月净收入黄金 2 770 两的纪录。那时去看球赛的男女观众大多如痴如狂，时而欢喜得蹦起来振臂狂呼，时而又懊丧得顿足捶胸。著名作家林徽因曾撰文对上海人沉迷于回力球赌博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地剖析：“看不到斗牛的，在上海的人每晚可以看到回力球，虽然它的刺激性不会及得上斗牛，回力球的确可以说是上海的最刺激的事件中的一件。它能使你狂喜，使你颓丧，使你心跳，使你出汗，使你忘了你的爱人的约，使你不顾你的太太在等着明天的开销，它甚至还能使你提前结束你的生命的进行。”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回力球员有的超龄改行，有的打道回国，赛事早已停止。中央运动场作为敌产由三青团组织和上海市教育局共同接收，

1946年3月改名为“上海市体育馆”，用作大中学生校际球类比赛，也是大型室内集会的场所。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过改造整修，上海市体育馆成为最早拥有冷气设备的体育场馆，凡重要的篮排球赛事和体操表演都在这里举行。1975年，漕溪北路上造起了可容纳万名观众的上海体育馆，这里降格为卢湾区体育馆。20世纪90年代，经土地批租，卢湾区体育馆拆除，建造巴黎春天百货大楼。如今的巴黎春天百货大楼，整体设计充满怀旧情调。外墙设有4座古典华贵极富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城堡，作为整幢大楼结构的主体，并配以象征现代主义风格的玻璃幕墙。店堂内部装潢华贵，卖的都是一流品牌服饰。由于地处轨道交通1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点，并拥有两个地铁出入口，巴黎春天百货大楼已成为淮海中路人流量最为集中的区域，与周边的百盛购物中心、环贸广场一起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商业风景线。

附

上海往何处去（节选）

蒋经国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汉奸，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护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乏华丽的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一天的。

……

许多人怀疑此次新经济政策是否能达到成功，这是奇怪的。因为过去有很多政策，都是失败了。但假使把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达到成功。我们认定这次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应该告诉人民，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要想将旧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代价是不能成功的。今日已经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第3版

江亚轮

蒋经国是位孝子，清明时节常常由上海乘船赴宁波，再转小船前往奉化，祭奠长眠于家乡溪口镇摩诃殿前的母亲毛福梅。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开往宁波的定期航班主要隶属于美商旗昌公司、英商太古洋行和国营轮船招商局，以及民营宁绍、三北、中兴、民生等轮船公司。其中，江亚轮是抗战胜利后轮船招商局从日商公司接收的一艘大型客运轮船，时常往来于沪甬两地，因此蒋经国也是江亚轮的常客。

上海与宁波隔杭州湾相望，自古以来航运不断，水上贸易十分繁

盛。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同时被辟为通商口岸，宁波籍士农工商来上海谋生者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来上海谋生的宁波人有6万人，1907年达到了40万人，1948年发展到了100万之众，占上海全市人口的1/5。背井离乡来上海谋生，割不断的是淡淡的乡愁。农历新春、冬至、清明，只要能力所及，旅沪宁波人都要回乡探亲、祭祖。至于平时，两地商贸交往，更是络绎不绝。

随着租界的开辟和外企机构的进驻，原先的木质帆船逐渐被蒸汽轮船替代。最早在

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其中4万元和6万元面额的图案是航行中的江亚轮



上海、宁波之间开辟定期客运业务的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接着英商太古洋行也加入申甬线营运。1873年，轮船招商局在宁波设立分局，开始参与申甬客运业务。1876年，招商局与太古公司商定，各自投入吨位较大的轮船，分享申甬线客运利益。此后，上海、宁波之间的客运业务逐渐被招商局和太古公司两家所垄断。为了挣回利权，并为同胞回乡提供便利，部分旅沪宁波籍富商出资开办客运公司。1908年，民营宁绍轮船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民营轮船公司第一次在申甬线开展定班航运业务。为了挤垮宁绍公司，英商太古公司将票价降至2角5分，另赠旅客毛巾1条。旅沪宁波同乡会支持宁绍公司，专门组织船票维持会，将票价减为3角，并由维持会贴补2角，使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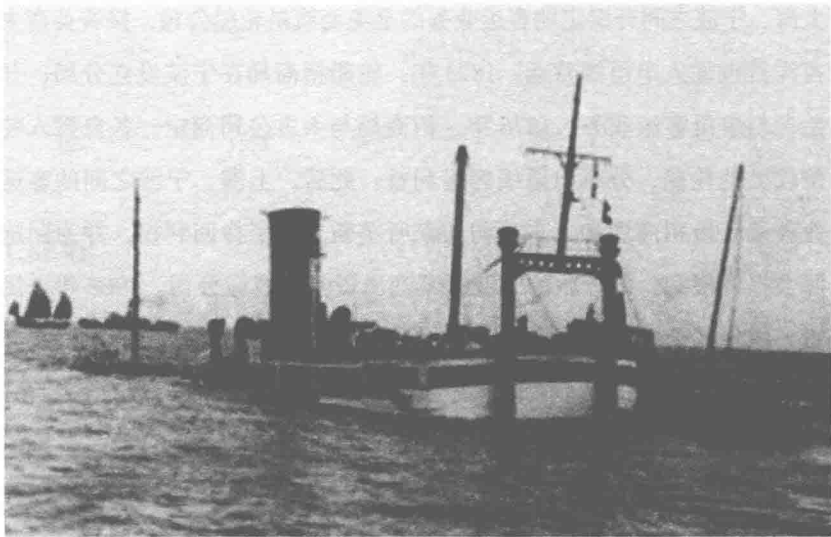
中国沿海航运业务，以上海至宁波的客运量为最大，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936年，招商局等几家轮船公司达成协议，严禁恶性竞争。其中，招商局新江天轮，每周二、四、六由上海开往宁波，一、三、五由宁波开往上海；宁绍公司新宁绍轮、达兴公司新鸿兴轮、太古公司新北京轮，每周一、三、五由上海开往宁波，二、四、六由宁波开往上海。星期天为“无船日”，各公司轮船全部停航。

1937年申甬航线被日军侵占。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营轮船招商局由重庆迁回上海，即刻恢复宁波分局，租赁舟山轮和江风轮恢复申甬线客运。同时，招商局还接收了日商亚海拖运株式会社的兴亚丸和宁波丸，改名江亚轮和江静轮，作为申甬线定班客货两用轮船。江亚轮是1939年由日本神户制钢播磨造船厂制造的轮船，长103米，阔15米，载重4000吨，后经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局核定载客数为2250人。

江亚轮上脚垫，现藏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正在沉没的江亚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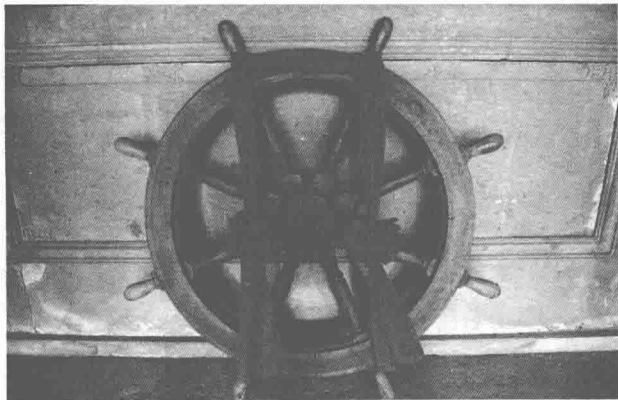
1946年5月，江亚轮首航宁波，与江静轮每日对开，上海16时30分开船，宁波15时开船，翌日黎明分别到达对方港口码头。

1948年12月3日晚7点，江亚轮像往常一样，缓缓驶出吴淞口。当船只驶近横沙西南里铜沙，也就是北纬 $31^{\circ}15'$ 、东经 $121^{\circ}47'$ 的长江江面，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机器停止转动，紧接着船体开始倾斜下沉。由于电台被毁，江亚轮无法发出求救信号，鸣笛声在漆黑的江面显得尤为凄厉。途经的船只，怕惹祸上身，大多置之不理，扬长而去。金源利、茂利、永洪等民营公司船只，侠肝义胆，参与救援。9时许，华孚号民营小轮代为发出求救电报，招商局闻讯立即派出济远轮、秋瑾轮、江静轮、海津轮前往救援。等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蒙蒙亮了，江亚轮早就沉入了江底。据事后统计，严重超载的江亚轮除了船长及船员179人，有购票乘客2607人，以及通过各种渠道混上船的无票乘客1000余人，还不包括水手、茶房的亲戚朋友，总人数应在4000人以上，仅有900余人获救。以死亡人数而言，江亚轮事件是世界航运史上最大的海难。

江亚轮沉没的原因，众说纷纭，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不过，当时曾一度盛传“黑帮刺蒋”的流言。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触动了经济金融界上层人士的利益，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儿子甚至被捕入狱。因此有人买通帮会分子，在江亚轮安放炸弹，企图炸死乘船返乡的蒋经国。据招商局高级船员郑守业回忆：“12月2日，蒋经国夫妇带着儿子、女儿乘坐江静轮赶赴宁波，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一天，由此躲过一劫。”黑帮安放炸弹也许是天方夜谭，却印证了蒋经国是江亚轮的常客。在处理善后事宜的同时，招商局调派江宁轮与江静轮对班开航，维持申甬线客运。尽管发生了海难事故，申甬线客流量不减反增，招商局又加派江平轮参与上海、宁波间的客运。1949年5月，江静轮被国民党海军征用，专载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逃往舟山。

1956年江亚轮被打捞出水，1958年改装为长江内河客货轮，往返于上海与武汉之间。1966年11月，江亚轮改名为“东方红8号”，直到1983年退役，闲置在武汉港月亮湾码头。2000年拆卸之际，不慎引发火灾，船体全部被烧毁。只有原江亚轮上木质舵轮幸存了下来，现由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珍藏。

江亚轮之舵，现藏于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



复兴岛

1949年4月26日，已宣布下野的蒋介石由浙江奉化乘“太康号”军舰悄然来沪，入住复兴岛上海浚浦局职工俱乐部——白庐。在复兴岛期间，蒋介石频频召见汤恩伯、陈大庆、毛人凤等上海党政军要人，部署上海防务和撤退物资工作。当解放大军逼近上海之际，他于5月7日凌晨急忙乘招商局“江静号”轮船逃出吴淞口驶向舟山，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他起步发迹的上海滩。

复兴岛是黄浦江下游一座弓状的内河小岛，南起定海桥，北迄虬江口，长3.42千米，平均宽度427米，中部最宽处550米，整个面积只有1.13平方千米，距离吴淞口约16千米。黄浦江河道曲曲弯弯，江岸凸出来的地方称“嘴”，凹下去的地方称“湾”。在原宝山县引翔乡五十一图周字圩处，江水由东折北，形成了周家嘴。当河流拐弯时，水的流速就会减缓，左岸泥沙逐渐沉积，经年累月形成了一块范围宽广的浅滩。滩地西侧为浅航道，无法通行，船只必须由东侧绕行，往来交通极为不便。黄浦江是近代上海的母亲河，水路不畅，交通受阻，必定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20世纪初，上海市政当局开始考虑对这块滩地加以改造，解决黄浦江航道淤塞的问题。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除了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内容之外，在附件中增加了《改良黄浦江水道之规程》的内容。1905年，上海道台袁树勋会同租界当局，组建浚浦工程总局，开始疏浚黄浦江航道，重点即是整治这片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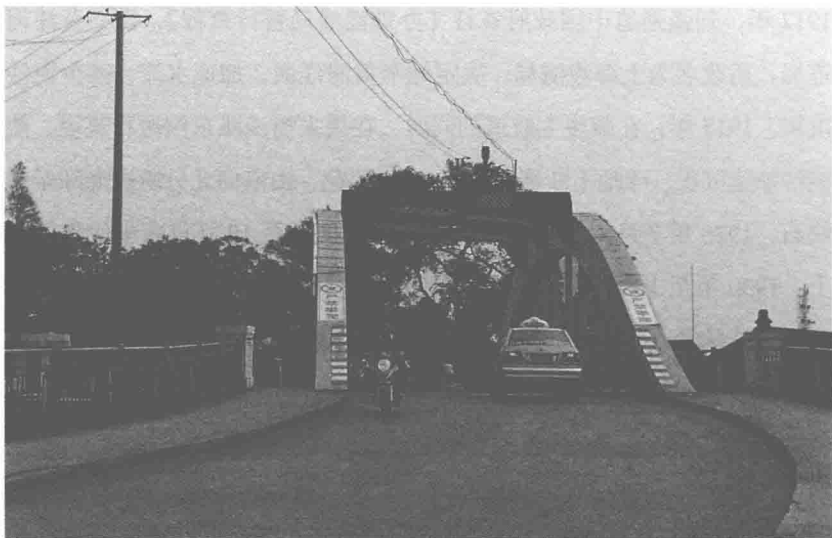
1912年，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办理浚浦局暂行章程》，设立黄浦河道局，后改名为上海浚浦局，决定缩窄黄浦江面，加速水流，减少泥沙沉积。1915年，在疏浚主航道的同时，在周家嘴浅滩东侧抛石筑堤，使淤沙加速沉积，滩地不断涨高。自1925年起，由南向北分阶段抛卸柴排块石，1926年7月南段率先填成陆地。1928年至1930年在中段吹填泥土，1930年至1934年又在北段吹泥围埝。原滩地西侧的浅航道，经疏浚加深成为长3620米、宽57至90米、深约2米的人工运河，可供两岸工厂、仓库装卸货物和停泊小型船只。整个疏浚填筑工程历时10年，位于黄浦江心的人工岛屿逐渐成形，定名为周家嘴岛。

在周家嘴岛填筑改造的同时，有关单位就已着手对该岛进行开发。1927年冬，上海浚浦局花费40万两白银买下了这块官有滩地，并在南端兴建定海路桥，这是当时陆地和滩地之间唯一的通道。后来，浚浦局

复兴岛鸟瞰



复兴岛南端的
定海路桥



又在岛上修筑了浚浦西路、浚浦东路两条马路，还在岛中央建造浚浦局体育会和职员俱乐部，供外籍员工休闲度假之用。此外，岛上还建有大中华造船厂、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美孚火油公司等大型工厂企业。1936年5月11日，上海市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上海鱼市场，原南市十六铺一带的鱼贩纷纷搬迁至此。得黄浦江交通之便利，当时停靠码头的渔船多达40余条，进场交易的鱼贩有4000多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强占周家嘴岛改名定海岛，1939年至1941年改为日本名字昭和岛。侵略者强行赶走岛上居民和工厂职工，在定海桥上布下铁丝网，并把大中华造船厂改为军械修理工厂，使该岛成为日军的补给基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管小岛，改名复兴岛，寓意“国土重光，民族复兴”。不久，复兴岛归还上海浚浦局，1948年10月在岛上竖立“复兴岛收回纪念碑”。此时的上海鱼市场早已迁往他处，岛上顿时冷清了许多。加上管理不善，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复兴岛人烟愈发稀少，一时成为荒僻之地。后来，这里又成了美军剩余物资储存站，上海街面上流行一时的舶来品，例如水壶、雨衣、挎

包、克宁奶粉等，均由此处运至市中心各大商场和地下黑市。

1949年上海解放后，复兴岛建有中华造船厂、上海鱼品厂、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上海渔轮厂、东海制药厂以及各种储运仓库，成为以工业、渔业为主的生产基地。位于小岛中部的浚浦局体育会花园由港务局接管，于1951年移交给上海市工务局，作为复兴岛公园对外开放。1958年，全市共青团员义务劳动，重修复兴岛浚浦西路，并将其改名为共青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那些工厂企业，复兴岛上多为部队用房，居民较少，只有北面有几家饮食杂货店和菜场、邮局、书店等生活配套设施。上海市民一般很少上岛，复兴岛几乎成了被喧嚣和繁华所遗忘的角落。

其实，复兴岛的交通非常便捷，主干道共青路南接定海路桥、北连海安路桥，可通往中心城区，577路公交车终点站即设在岛的中央，水路有定海桥轮渡连接浦东。作为上海市区唯一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复兴岛的建设规划已经亮相，它将打造成集商务会谈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岛。如今，轨道交通12号线专门在岛上辟有站点，周围的市政配套设施也已基本齐全，又一颗耀眼的明珠即将在黄浦江东外滩发展带上熠熠生辉。



位于复兴岛公园
内的白庐

复兴岛北端的
海安路桥



附

蒋总裁的近况（节选）

周宏涛

……蒋先生抵沪，这正是四月廿六日的中午。兵舰定泊在近郊江心，当即有地方军政方面人士登舰向蒋先生问候。舰上的小客厅便成为临时的会客室，坐着满满的一屋子客人。他们的情绪均是异常兴奋，并怀着满腔的热情，向蒋先生报告一般军政状况，犹如见到了久别的父兄一样。这一幕又紧张又亲切的会晤，我们在旁看了几乎热泪夺眶而出。第二天来访的客人更多了，于是蒋先生决定移居上海，以便与他的朋友及部属们接谈。我们也都带着简单的行李上岸，住在靠江的小房子里工作。本地晚报也有了蒋先生到沪的消息。有几位老同事也来看看我们，在彼此热烈握手之后，都说：“难得你们到上海来，我们感到心里非常安慰，今天的铺子里的生意较昨前好多了。”在这种情绪之下，一天复一天，不觉我们已住了五天。战事稳住，在昆山以西，上海逐日的慢慢恢复了原有的繁荣。在各方面挽留之下，蒋先生本人又舍不得离开上海的民众，我们真不晓得还要住多久。

……

五月一日午夜于上海旅次
——《申报》1949年5月9日

附录

上海地区的中山公园

—

1925年3月12日，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病逝。3月17日，新闻界著名人士陈冰伯先生在《申报》著文，倡议辟建中山公园，文中说：

中山先生为一代元良，万师之师，一旦殒丧，举国震惊。惟吾人虽尽哀于前，尤不可不纪念于后，庶先生不死，其道长存。查上海华洋杂处，人物荟萃，平日市民习于奢侈，随风而靡，久已丧失其至大至刚之气，偷闲于醉生梦死之中。吾人纪念孙中山之法，莫如于沪滨国土集资开中山公园、立中山遗像、镌中山遗言、高标三民主义，名其路曰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其性质略如宋园，宏大则过之，园成像立，以后春秋佳日，四方士女徘徊其下者，瞻仰伟迹，不免有人亡神存之感，而起悲昂奋发之思，即外人园游睹迹，亦知委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在也。廉顽立懦，咸系于兹，岂止纪念中山先生而已哉。惟最要者，园宜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者。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芻之见，幸各界垂察焉。如荷赞同，希即发起为幸。再此种主张，系属于上海一隅之纪念，与前日于秋穆君在宁建中山公园之主张毫无抵触，并希各界鉴察。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沪上各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的共鸣。但由于经费和其他原因，这一动议未被当局采纳。直到租界收回以后，汪伪上海市政府于1944年6月将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1860年，太平军第三次攻打上海，英国人霍格兄弟乘机以低价“永租”苏州河曹家渡以西吴家宅大片土地，建造专供自己郊游度假的兆丰花园。霍格兄弟是近代上海有名的大房地产商，花园之名即来自于兄弟俩合伙创办的“兆丰洋行”。1879年，花园北部84亩土地以6500两白银的价格，售予了美国圣公会开办圣约翰书院，霍格兄弟又狠赚了一笔。但好景不长，受橡皮股票风潮的影响，兆丰洋行倒闭，兆丰花园被拍卖抵债。1911年，圣约翰大学扩建校园，又以14万两白银的价格买下了相邻的72亩土地。

1914年初，租界公共娱乐场委员会和娱乐基金托管会向工部局建议，购买兆丰花园以及邻近土地，辟建供外侨休闲的公园。3月20日，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通过议案，决定授权工部局“以12.3万两规银的价格购得靠近极司菲尔路的一块123亩的土地”，改建为由租界工部局越界管理的Jessfield Park。因该处原为霍格兄弟的兆丰花园，所以中文名称为兆丰公园。又因近邻梵皇渡，也被称为梵皇渡公园。

公园的改建工程由工部局园场监督麦克利（Macgregor）主持，他将公园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大景区：由树林、草地、河流等组成的自然风景区；以中国所产树种为主体构成的植物标本园地；以园林小品如花坛、喷泉、雕塑、花卉园和动物部组成的观赏游览区。之后，原租界救火会大铜钟、原华人公园内“四不像”雕塑等陆续移入，点缀其中，与园林景色融为一体。公园其他附属设施也相继建成，例如儿童游乐园、极司菲尔动物园、中式建筑风格的茶室，以及可供上千人观赏表演的露天音乐台等。这些举措提升了园林的观赏价值，丰富了其游乐内容，完善了其服务体系，使得兆丰公园成为近代上海最为有名的公园。民国

《上海县志》介绍说：“极司菲尔公园位于沪西，为公共租界公园中之最优美者。园中布置，合东西洋美术之意味，冶于一炉，有吾国名园之幽邃，有日本名园之韵味，而园中大体格局，又莫不富于西方之情趣。”

对社会公众开放之后，兆丰公园又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改建。一次是1935年，在中国式凉亭原址上建造了一座西洋古典式大理石亭。公园凭借露天音乐台和大理石亭，成为上海租界当局举办消暑音乐晚会的主会场。盛夏季节，每逢周六、周日，工部局乐队即在此献艺演出。另一次改建是1939年，在公园东南一侧，以湖泥土方覆盖垃圾堆筑成带状假山，按照日本园林造景的风格，建成了富有和式庭园风格的新公园风景区。

中山公园大理石亭



建园之初，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游园规则，不许华人人内游览。直到1928年6月1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宣布公园及动物园以门票制度对华人开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方面“接管”兆丰公园。1944年6月23日，汪伪上海市政府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将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日寇投降，中山公园由国民党上海市工务局负责管理。1946年3月12日，曾于中山公园举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植树节典礼。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公园以综合性多功能的园林新貌成为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休闲中心。公园露天音乐台及大理石亭等处，曾多次举办过大型歌舞会演，以及各种游园活动和大型展览活动。2001年，为丰富公园的景观文化，园林部门专门组织了一次评比活动，评选出“银门叠翠”（公园南大门）、“花墅凝香”（牡丹园）、“水榭絮雨”（陈家池）、“绿茵晨晖”（大草坪）、“芳圃吟红”（月季园）、“双湖环碧”（鸳鸯湖）、“荷池清月”（荷花池）、“林苑耸秀”（山水园）、“独木傲霜”（大悬铃



中山公园大门

木)、“石亭夕照”(大理石亭)、“虹桥蒸雪”(大石桥)、“旧园遗韵”(后园门)为“中山公园十二景观”。2013年春节前夕,中山公园经过整体改造基本恢复了旧日盛景,如今的中山公园仍是上海市区最知名的大型综合性公共园林。

二

除了市区的中山公园之外,上海郊区也曾经有过几处中山公园:

青浦中山公园

即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的曲水园,位于青浦区青浦镇。自清乾隆十年(1745年)起,在青浦城隍庙东首开始修建觉堂、得月轩、歌熏楼、迎晖阁等建筑,供香客小坐休憩。后沿小溪流建早舫、夕阳红半楼、凝和堂等,又在得月轩东面浚池垒山,架水为梁,植以红莲,亘以



青浦曲水园

长堤，初具园林规模。因该园为城隍庙附属园林，故名“灵园”。按照旧俗，城隍庙享有“庙捐”，每年向县城居民捐募一文钱，或于地丁银项下加纳制钱一文，用作庙宇维修经费，所以该园又有“一文园”之称。嘉庆三年（1798年），江苏学使刘云房莅临青浦，应知县杨东屏之邀，在园中吟诗宴饮，借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典故，将园林易名为“曲水园”。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占领青浦，清军与华尔洋枪队联合攻城，曲水园毁于炮火。后经重建，庙、园相继恢复旧观，并增设了放生池和花神堂。宣统三年（1911年），由庙园改为公园。1927年，邑绅张景周捐款1200元，修假山，并建三层高台，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更名为“青浦中山公园”。抗战期间，公园大部分被日机炸毁。新中国成立后，不断修葺扩建，构成一组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全园有迎仙阁、迎曦亭、镜心庐、天光云影、恍对飞来、小濠梁、坡仙亭、二桥、濯锦肌、虬龙洞、玉宇亭、米拜亭、环碧楼、花神祠、冰壶、清虚静泰、喜雨桥、舟居非水、夕阳红半楼、得月轩、有觉堂、清簌山房、白云坞、凝和堂二十四景。1980年，恢复“曲水园”原名。

嘉定中山林公园

位于嘉定区黄渡镇西南，占地面积两亩余。1928年3月，为纪念孙中先生山逝世三周年，由黄渡乡绅盛俊才、夏琅云等发起，在银杏山庄旧址筹建中山林公园，当年建成开放。公园东南角建逸仙亭，亭西是月牙状荷花池，东北角有一个高约5米的土丘，上栽一株银杏树，土丘西是中山礼堂。嘉定中山林公园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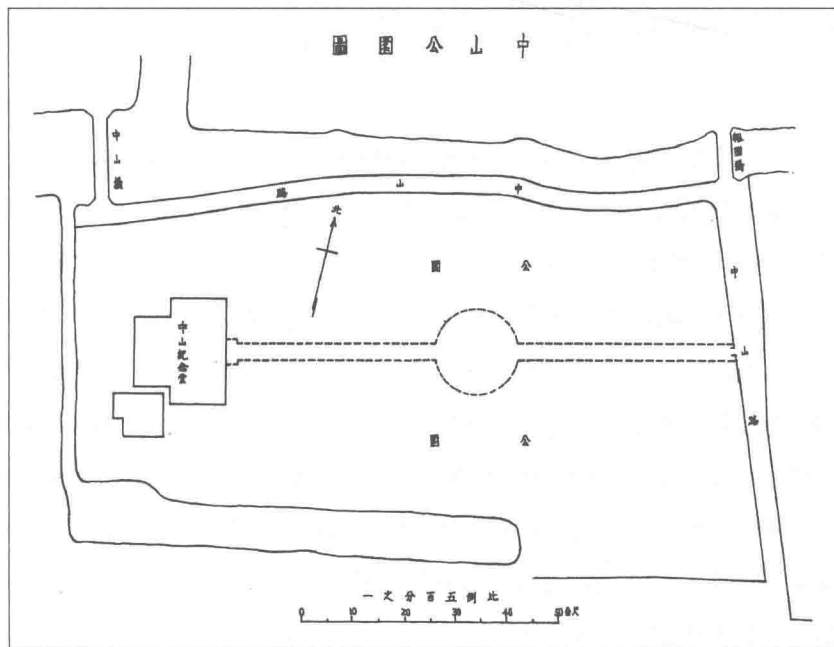
崇明中山公园

原址在崇明区北堡镇海滨厂东侧，占地面积30余亩。1929年由当地乡绅龚亚虞捐资辟建。该园三面临水，周边密植冬青。园内筑土为

山，占地两亩，高约7米。山顶建砖木结构八角亭，高4米。亭前置有石狮一对，蹲卧两旁。亭内悬匾，上书“安鳌山”三字，由当地名士王清穆题写。水泥地面刻有两尾鲤鱼，图案生动活泼。亭子四周有座，可容20余人驻足小憩。凭栏南眺长江，天水浩渺。土山东面六七米处有金鱼池，正南和东南方各有六角草亭一座。1938年日军侵占公园，修筑地下碉堡，改山亭为哨所，景观面目全非，公园遂废。

川沙中山公园

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城区西南部，占地面积十余亩，大约建于1931年。园东西呈长方形，坐西面东。园西中央建有“中山纪念堂”，堂前有通园东大门的大道。大道中部辟设圆形大花坛，道路两旁广植花木。公园于上海解放前夕废圯，新中国成立后房屋改作他用，余地建造住宅。



川沙县中山公园图

三

此外，上海还曾经有过一处鲜为人知的中山植物园。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迁至重庆，1941年由私立改为国立。自1938年起，学校陆续增设园艺学系、农艺学系、垦殖专修科、茶叶专修科等系科。1940年，在这些系科以及附属农场的基础上设立复旦大学农学院。1946年10月，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原校址，农学院成为上海第一所农业科学高等学府。1947年初，复旦大学致函上海市工务局，建议双方合作兴办植物园，以便利市民和学生观摩并研究植物学。经协商决定，由复旦大学农学院提供给农场一部分土地，并负责整体设计和养护工作，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负责供应各种苗木。至于办园经费，共需法币3 036.4万元，其中工务局出资300万元，复旦大学出资2 736.4万元。当年3月，双方商议经过以及合办植物园具体办法，上报上海市政府核准。建园工程随即开工，于1947年5月底竣工，定名为中山植物园。

中山植物园园址即在今邯郸路、国权路口，西界走马塘，南近政肃路，北沿邯郸路，占地面积大约36亩。植物园大门开在国权路上，以连皮杉木构建园门。园林四周以毛竹为柱，围以铁丝。园中有干道5条，宽4米，总长509米；支路2条，宽3米，全长170米。有水池2个，面积共199平方米。植物园分为标本、自然两区，标本区面积27亩，有127个树种；自然区面积近10亩，有33个树种。苗木由复旦大学农学院提供61个树种390株，工务局园场管理处提供113个树种629株，到天目山等地采集185个树种2 027株，以及浙江奉化几个农场赠送的木荷、杜鹃、碧桃、金钱松、鹅掌楸、紫禾等共21株。在天目山采集的树苗，因植树季节已过，且长途运输损伤较多，故成活率只



邯郸路国权路口，原
中山植物园所在地

有 65% 左右。

建成后的中山植物园不收门票，主要供大学生及植物爱好者参观，平时游人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开始进行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1952年，按照教育部“全国高等农业学校院系调整及专业设置方案”，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调至东北沈阳，与东北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组建沈阳农学院；1954年原农化系农产品加工组 11 名同学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茶叶专修科则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改为四年制茶叶系。随着复旦农学院的撤并，中山植物园逐渐荒废，园址今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学校基建处所在地。

景仰与缅怀

——上海市区孙中山纪念地名考录

在《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设有专章介绍孙中山纪念地。其中,上海地区的遗址、纪念建筑和道路,只有行馆、寓所、故居和中山路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中山公园和逸仙路则列入文后的简表。该志作为《广东省志》中的一卷,由当地方志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而成,对于广东省外的一些资料尚未完全掌握。以上海市孙中山纪念地名为例,除行馆、寓所、故居外,还有不少遗漏,有关中山路的表述也并不准确。本文即根据已出版的上海地区新编方志,重新增补考录如下:

中兴路

位于市区北部,横跨虹口、静安两区。东起横浜路,西至交通路,全长3196米。1912年填虬江筑西段,1921年填横浜筑东段,取名中兴路,含中华民族振兴之意。初为泥路,后铺弹石及煤屑路面。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中山路。1930年辟筑今中山北路,恢复中兴路原名。

中山路

由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中山南路、中山南一路、中山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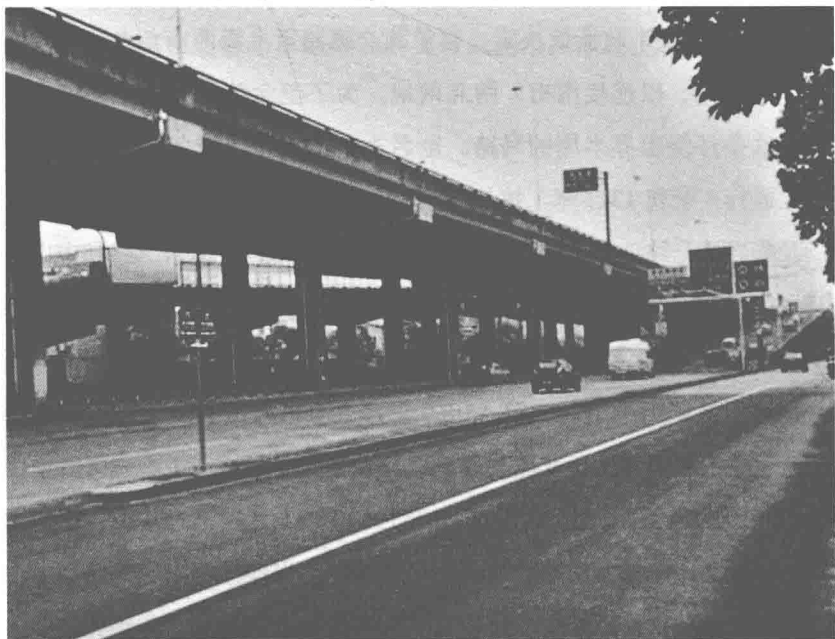
中山路内环高架

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中山北一路、中山北二路组成，环绕上海中心城区，全长 28.68 千米。1927 年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宣告成立，直隶南京中央政府。出于振兴华界经济、抑制租界扩张的目的，经市政府第 58 次市政会议决定，自沪北交通路至上海西南角龙华寺，辟筑一条马路，以连接南市、闸北两地。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功绩，这条环绕租界半周的马路，定名为中山路。1930 年 5 月，中山路竣工通行，全长 13 千米。抗战胜利后，原租界黄浦滩路、南黄浦滩路，以及华界里马路、康衢路相继改名为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和中山南路、中山南一路，中山路形成环路雏形。上海解放后，市政建设得以持续发展。1958 年，修筑了西南起俞泾浦东北至逸仙路的中山北一路，并扩建源林路为中山北二路。1959 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以中山南路、中山西路和中山北路为基础，连接拓宽为环绕市中心城区的中山环路。1959 年 10 月起分段施工，于 1960 年 11 月竣工。其中，瑞金南路至漕溪北路段的龙山路改名为中山南二路，以连接中山南一路和中山西路。至此，中山环路初步形成，全长 21 千米。直至 1987 年底，中山

南路的多稼路至新肇周路段辟通后，中山环路才得以全线贯通。如今，中山环路的大部分路段同时也是上海市内环高架路的一部分。

逸仙路

位于市区东北部，跨虹口、杨浦、宝山三区。南起邯郸路，北至吴淞大桥南堍，全长 8.9 千米。1919 年，修筑南张华浜至蕙藻浜段，名军工路。1931 年，修筑三民路（今三门路）至高境庙段，计划与原中山路连接，因此取名中山北路。1939 年，侵华日军修筑大八字（今大柏树）至三民路段和高境庙至军工路段，全路贯通，改名为畑路。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中山路辟通连接为环绕中心城区的环路，原先规划中的中山北路已无法纳入中山环路系统，因此取孙中山先生的字，更名为逸仙路。1999 年，全路上空架设高架路，成为连接上海中心城区与宝山吴淞地区的交通干道。



逸仙路高架

纪念路

在市区北部，跨杨浦、虹口两区。东起武川路，西至车站西路，全长1060米。修筑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因通往万国体育会会场（大致位于今上海市肺科医院旁），初名体育会路。1929年10月10日，江湾民众募集捐款，在劳动大学门前建造了“孙总理奉安纪念碑”。碑高三丈余，上有易培基“景行百代”、谭延闿“独有千秋”、蔡元培“俟圣不惑”题词。建碑同时，体育会路更名为体育会纪念路。1932年，纪念碑毁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1950年，体育会纪念路正式改名为纪念路。该路为江湾五角场通往市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

香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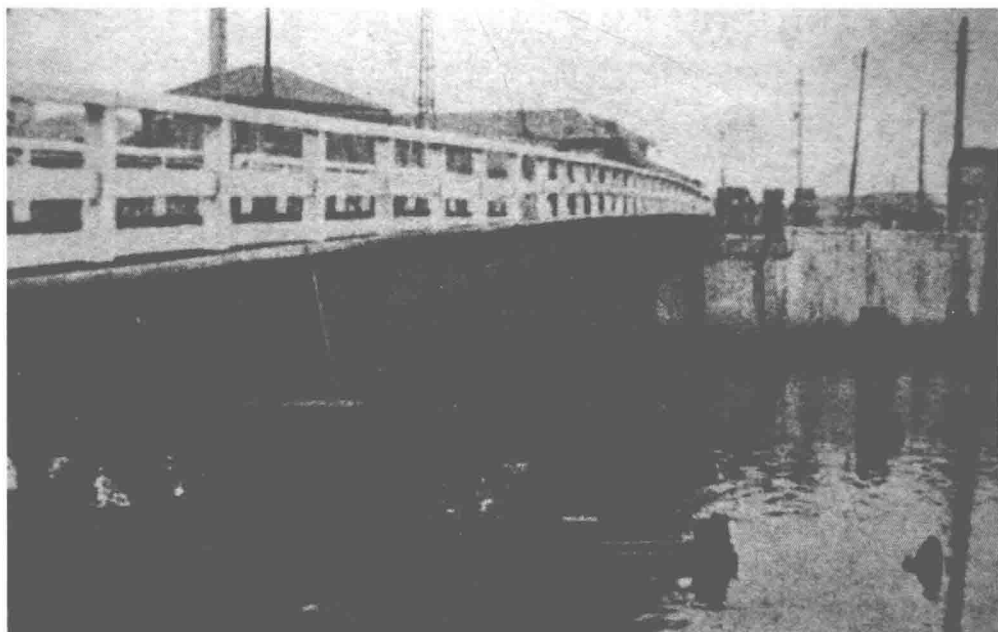
位于原卢湾区（今黄浦区）西北部。东起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全长328米。1914年修筑，以17世纪法国著名戏剧家莫里哀命名为Rue Moliere，当时译为莫利爱路。1943年租界收回以后，汪伪政府为“消除殖民影响”，大规模更改以西方国家人名等命名的道路。由于中山故居位于莫利爱路29号，而且孙中山先生辛亥之际居住的行馆（宝昌路408号）、早期的寓所（环龙路63号），以及中国国民党本部（环龙路44号）均在不远处，特意以先生的原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命名这条具有重要意义的马路。

中山桥

位于市区苏州河上，长87.5米，南接中山西路，北连中山北路。1930年辟筑中山路时所建，初为木结构车行桥，是中山路自南而北第三座桥梁，因此正式名称为中山路三号桥，习称中山桥。1937年毁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炮火。不久，侵华日军在原址建造军用桥，西侧另架一



被“一·二八”战火摧毁的上海国立劳动大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山桥

座人行桥。解放战争之际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于1949年底重新修复。1960年9月，中山环路拓宽改建，旧桥拆除，在西侧建成钢筋混凝土大型桥梁。中山桥为中山环路上的重要桥梁。桥北原有中山桥义务学校、曹家渡警察分局中山桥派出所，如今尚有中山桥居委会、中山桥幼儿园，均因该桥而得名。

中山医院

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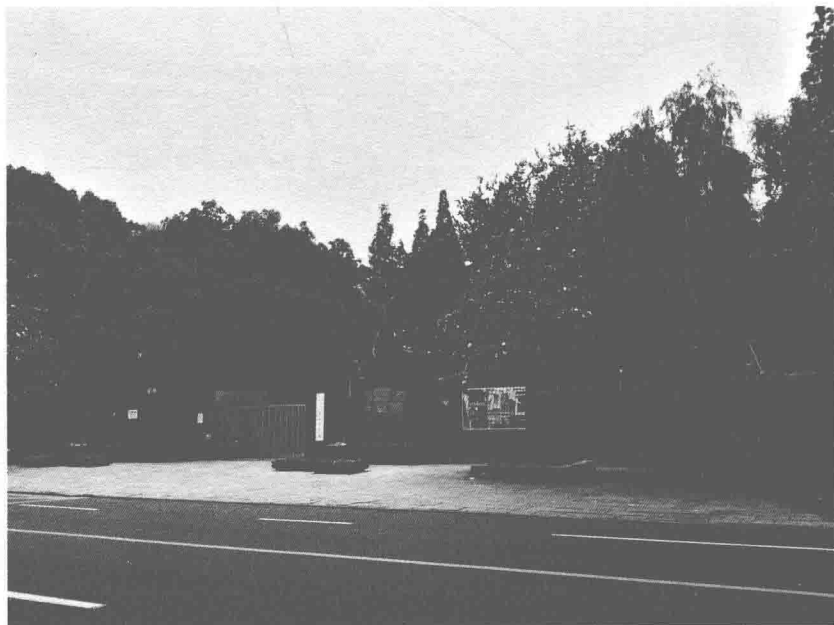
中山公园

略

从张虹路到宋园路

——宋庆龄陵园门前一条小路的变迁史

宋园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陵园门口的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北起虹桥路，南至吴中路，是位于长宁、徐汇、闵行三区交界处的一条交通要道。查找最权威的上海地名工具书《上海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有对“宋园路”的介绍：“在市区西部，跨长宁、徐汇、闵行3区。北起虹桥路，南至吴中路。长



大门开在宋园路
上的宋庆龄陵园

1 290 米，宽 6.0~24.0 米，车行道宽 6.0~14.0 米。民国 23 年（1934 年）由小路拓宽改建，以张家宅和虹桥首字命名张虹路。1984 年因宋庆龄陵园在该路西侧，改名陵园路。1994 年改今名。沿路为住宅。”该志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关于张虹路更改路名的权威文献：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张虹路改名为陵园路的通知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沪府办〔1984 年〕12 号）

市地名办公室：

沪地办〔84〕第 1 号文悉。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张虹路（北至虹桥路，南至吴中路）改名为陵园路。希即通知有关部门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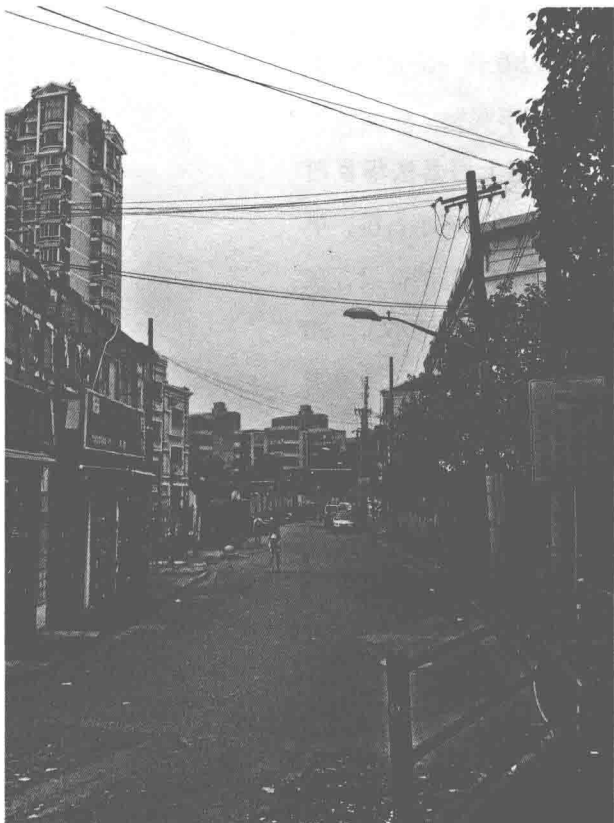
但是，从宋园路沿着古羊路往前走不远，就可以看到一条名为“张虹路”的小路，也可以通向吴中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7 年，因被沪杭甬铁路占用，万国公墓移至上海县法华乡西十八图“张虹桥”处。张虹桥原为虹桥路南侧后浜上的一座小石桥，早在清乾隆年间这里已成村落，村因桥而得名。随着万国公墓的辟设，在墓园东首逐渐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泥泞小道，仅能通行独轮小车。20 世纪 20 年代，民间已有“张虹路”的称呼。1934 年前后，小路改筑为煤屑路，取南端居民聚居地张家宅和北端虹桥路的首字，正式命名为张虹路，与原先的张虹桥也正相呼应。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万国公墓风光不再，张虹路依旧只是上海市郊一条默默无闻的小路。不过，一条铁路的修建，打破了张虹路的宁静。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接管并重新修缮了虹桥机场。当时，在机场安装了 7 个容量为 100 吨的立式储油罐，作为飞机航行的燃料库。为了便于油料运输装卸，军队有关部门与北新泾区人民政府，向上海铁路局提出，铺设一条直达虹桥机场的铁路专线。经上海铁

路局同意后，即从沪杭铁路徐家汇车站引出一条铁路岔道，经吴中路向西，一直通往虹桥机场，全长 8.7 千米，为单轨铁道。这一段铁路当时属于部队军管，命名为“617 专线”。由于 617 专线连接了铁路和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上海指导工作或途经上海，常常会借用这段鲜为人知的铁路。1960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 617 专线北侧的虹桥路上，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建造了一座“414 招待所”，即现在的西郊宾馆。因此，每当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他的专列即停靠在 617 专线虹桥机场东南一段长约 600 米的东西向分叉道上，这就是曾经披着神秘面纱的“101 车库”。1964 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通航协定，虹桥机场扩建升格为国际机场。1972 年，虹桥机场由军民合用机场转为民用机场。1977 年，

张虹路今景



617 专线改名沪杭铁路徐虹支线，仍然担负着为虹桥机场运输燃料、建筑材料及其他物资的重任。无论是 617 专线还是徐虹支线，运输任务都非常繁忙，每月大约有 300 车次。东西走向的铁路将张虹路一分为二，每当信号铃声响起，道口栏杆缓缓落下，来往的行人只能停下脚步，耐心等待列车奔驰而过。若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列，更要提前实行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其实，张虹路并不是一条南北向笔直的道路。在沪杭铁路徐虹支线以北，蜿蜒曲折，略微偏东北—西南走向。而在铁路支线以南，相对较直，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文革”初期，万国公墓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宋庆

龄父母合葬墓得以修复，万国公墓实行军管。直到1973年，为解决沪外国侨民的骨灰安葬问题，上海市民政局部门收回了包括宋氏家族墓地在内的30亩土地，恢复万国公墓建制。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同志病逝，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墓前。此后，这里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缅怀和纪念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重要场所，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公墓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陵园”。规划中的宋庆龄陵园，大门开在东首，门前的张虹路势必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造。按照规划，张虹路北段沿陵园围墙往南拉直，改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拓宽至24米。与此同时，陵园向南部扩展，张虹路部分路段并入墓园。记得20世纪90年代，在陵园内还可以看到标着“张虹路”的老式路牌。这样一来，张虹路成了两条平行的断头路，仅有沿陵园南围墙的一条小径相连（后定名为习水路），大致呈“H”形。

1984年，宋庆龄陵园落成开放，张虹路也正式改名为陵园路。为了配合陵园改扩建工程，虹桥路以南、沪杭铁路徐虹支线以北、姚虹东路沿陵园围墙至张虹路以东，原属上海县虹桥乡的这块土地，于1983年起划归长宁区管辖。1984年，为配合古北新区开发，包括虹桥机场、北新泾、程家桥等地区共计15.69平方千米土地全部划归长宁区。1984年9月，陵园路以东、沪杭铁路徐虹支线以南部分土地，由上海县划归徐汇区。于是，沪杭铁路徐虹支线和陵园路就成了上海县与长宁区、徐汇区的分界线。

按照市政府办公厅下达的通知，应该是张虹路的全路段改名为陵园路。但宋庆龄陵园以南的张虹路，地处长宁区、徐汇区、上海县（1992年与闵行区合并组建新闵行区）交界处，中间又有一条沪杭铁路徐虹支线，沿线由铁道部门管辖，属于典型的“三界四方”互不统属的格局。因此，陵园以南的陵园路，仍然保持宽7米的浇灌路面，甚至还保留着



拆除徐虹路支线铁轨后拓建的古羊路



儿童博物馆南墙外的习水路，现已拓宽为黄金城道

“张虹路”的门牌和路牌。周边居民索性将错就错，一直称之为“张虹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虹桥路宋庆龄陵园周围逐渐成为繁华区域。“陵园”属于泛称，“陵园路”难以凸显宋庆龄陵园的寓意，也不利于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于1994年9月经地名管理部门批准改名为“宋园路”，陵园以南至吴中路段恢复“张虹路”旧称。但此次更名，对于陵园以南的张虹路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从而造成了“采词下限一般截至1995年年底，重要事件记至1996年，地图资料截至1997年6月底”的1998年版《上海地名志》相关词条有所偏差。

1997年6月25日零时，沪杭铁路内环线包括徐虹支线停止列车运行。此后，路轨开始拆除，在沪杭铁路内环线和原淞沪铁路部分路基之上修筑了地铁3号线，在徐虹支线原址修筑了古羊路、老外街和延安西路西延伸段。1999年，宋园路向南拓展延伸至吴中路，与桂林路北延伸段相连，大大缓解了长宁区与徐汇区中西部之间交通拥堵的状况。宋庆龄陵园南墙外，即今上海儿童博物馆南墙外那条小径习水路，拓宽并向西延伸，辟建为黄金城道。

参考文献

地 方 志

- 《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
- 《上海烟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上海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上海铁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上海救捞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 《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 《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
- 《上海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 《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复旦大学百年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同济大学百年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工 具 书

-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 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乐德编著：《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学林出版社 2004 年版。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黄健敏编著：《孙眉年谱》，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周伟民、唐玲玲编著：《宋耀如年谱》，海南出版社 2011 年版。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东方出版中心 2013 年版。

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编：《虹口宋氏老宅及宋庆龄诞生地史料与研究》，2012 年内部印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编：《宋氏家族与内史第一——宋庆龄出生地研讨会史料汇编》，2014 年内部印行。

文史资料

《蒋介石史料》（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蒋介石家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38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蒋氏父子》（奉化文史资料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黄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浦区文史资料选辑》

南市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南市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市文史资料选辑》

卢湾区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卢湾史话》

虹口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苑》

静安区党史研究室、静安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静安文史》

长宁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宁文史资料》

徐汇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徐汇文史资料选辑》

普陀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普陀文史资料》

闸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闸北文史资料》

杨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杨浦文史资料》

宝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宝山史话》

川沙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川沙文史资料》

松江县政府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松江文史》

浦东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浦东新区文史丛书》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1 年版。

地情书籍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阮仁泽、高振依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忻福良、赵安东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卢湾区党史研究室编：《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许建中主编：《沪铁车站揽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暨南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上海航道局局史编写组编：《交通部上海航道局局史》，1997 年内部印行。

冯绍霆：《解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薛理勇：《外滩的历史和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化：《上海宗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宋路霞：《上海大饭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许洪新主编《上海老弄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房芸芳：《遗产与记忆——雷士德、雷士德工学院和他的学子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湖南社区（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编：《庭院深深——武康路一带老房子里的故事》，2008 年内部印行。

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浦东新区文史学会编：《人文浦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

长宁区地名委员会、长宁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编：《西区纪事——长宁地名寻踪》，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马联芳：《名校春秋》，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许国兴、祖建平主编：《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娄承浩、薛顺生编著：《上海百年建筑师和营造师》，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张长根：《海上遗韵——长宁旧事的记忆》，2011 年内部印行。

杨浦区党史研究室、杨浦区地方志办公室、杨浦区档案馆编：《走进杨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李明毅主编：《徐汇文脉》，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5 年版。

闸北区档案局、闸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闸北老建筑印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5 年版。

人物传记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王松、蒋仕民、饶方虎：《孔祥熙和宋蔼龄》，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石一流编：《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范运晰：《宋家两代人》，南海出版社 1996 年版。

沈飞德：《民国第一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伟忠：《宋氏家族在浦东》，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蒋经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黄瑾、毛胜编著：《孙中山一家人——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家族》，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弘之、李云霞：《沧桑：孙中山之女孙婉与王伯秋的生死恋情》，团结出版社 2006 年版。

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后 记

这本小书，从策划到最终完成，再到正式出版，可谓旷日弥久。2011年，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课题“孙中山宋庆龄上海史迹考”顺利完成，研究成果《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和《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与鼓励下，我们希望“顺藤摸瓜”并继续“扩大战果”，将与孙宋相关人物在上海的史迹也做一次脉络梳理。

交织于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背后的，是一张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浦东川沙倪家为源头，以宋氏家族为核心，进而到通过婚姻关系联结起来的孔家、孙家和蒋家，起始于晚清，兴盛于民国，一直绵延至新中国。这个庞大的家族集团，纵横捭阖，呼风唤雨，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川沙倪家到宋氏家族，上海是这个家族集团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舞台，梳理孙、宋、蒋、孔家族在上海的史事和史迹，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较之于“孙中山、宋庆龄上海史迹”，孙、宋、蒋、孔家族史迹要复杂得多。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样，以人物足迹为主线，这绝不是一本小册子所能容纳的，也未必具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想，还是把这几个家族在上海的主要活动落实到相应的载体，即具体的建筑或机构，再按照《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的体例一一呈

现。这样，既能保持本书的可读性，又能将原本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以较为清晰的面貌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孙宋相关人物史迹考”课题研究，自始至终得到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量、赵福祥、马玉成、匡成鸣、李竞业等几位主任的鼎力支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和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研究员，由两位资深学者担任学术顾问，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质量；本书编纂，得益于邹镭、黄亚平、宋时娟、任冉冉等诸位师友的不吝赐教与帮助；浦东新区中华职教社陈伟忠老师和浦东中学沈华老师，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校史材料；相关史迹现状风貌照片，均由孙宋管委会办公室陈娟女士精心拍摄，为本书增色不少；中福会出版社余岚老师，上海辞书出版社王圣良老师、杨丽萍编辑，对本书出版出力尤多。在此，谨向所有给予我们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学术水平所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以宽谅指正。

编 者

2017年2月5日